

C H I N A S P R I N G

# 中國之春

總第三期

一九八三年五月

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軍隊改革的一些內幕

我們的使館做了些什麼？

他為什麼要政治避難？（續）

推薦一九八三年的大陸民刊[野草]

歡迎大陸留日學生自辦刊物[春雷]誕生

上海知青鬧事記

大連水產學院罷課記

*Chinese  
good society  
(C.P.S.)*



# 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

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一口號，再次喚起了海內外同胞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及對祖國前途問題的關注。

結論已很明顯，中國的問題是社會制度問題，卅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共產黨建立並維護的中國現存政經體制是行不通的，民主制度必將代替專制制度，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那麼，爭取祖國美好的未來，需要創建一個什麼樣的政經體制呢？問題的答案，應由廣大民衆共同尋求。任何人都不是救世主，任何人都不可能閉門造車式地制訂出一個一攬子方案，我們希望做的，是集思廣議的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演講會、討論會和座談會，我們嘗試著把長期以來，海內外朋友們對中國未來政經體制的意見作了一些采集，采集的意見歸納為五項政治主張和五項經濟主張。

## 政治上的五項主張是：

第一、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人民有權根據憲法的結社自由，組織政治團體或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與執政黨競選。任何一個政黨，不能天經地義地永遠處於統治地位，他做得好，人民可以擁戴他，選舉他；做的不好，人民可以不選他。我們並不能同意某些人主張的消滅共產黨的偏激言論，因為消滅共產黨的思想是不民主的。如果有一天人民不選舉共產黨了，他還可以存在，重新整頓和新執政黨競選。建立多黨制，各政黨、政治團體及無黨派人士以自己的政綱和政策贏得選票、獲得政權，就可以結束「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即以流血方式改變政權的局面，從而終止中國長期以來一亂一治的惡性循環。

第二、黨、政、軍、法分離。執政黨不能在政府機構、軍隊及法律機關中設立黨組織並行使實際的領導權。朝野黨派可另有組織系統，只負責黨務。軍隊不應參政、干政，軍隊的職責在保衛國家。只有黨、政、軍、法分離，才能杜絕一黨專制。

第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國會代表由各地選出。司法及行政單位的幹部應通過國家考核，才能獲得錄用。立法、司法及行政機關的各級幹部與民衆一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而不是以專政維護社會正常秩序。

第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最高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民意代表大會是最立法機構。選舉時，執政黨要與非執政黨、政治團體和無黨派人士處於平等地位。堅決停止執政黨御用選舉的做法，實行競選。在目前共產黨不能容忍另一個政黨與之競選的情況下，要特別強調無黨派人士自荐候選人的重要性。一九八〇年大學生選舉風潮時，最主要的進展之一是出現了一批自荐候選人，公開與黨委指定的候選人競選，以嘗試突破中共卅多年來御用選舉的局面。

人民不但有權選舉自己的政府，而且有權監督選出的政府。各級民意代表機構可檢查同級政府的工作，直至彈劾那些違反民意之政府工作人員。人民應享有實際的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出版和新聞機構獨立於政府，出版物可批評政府甚至有反對政府的權利。沒有言論犯、思想犯和政治犯，只有刑事犯。

第五、實行聯邦制。制訂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地位的問題。

## 經濟上的五項主張是：

第一、終止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實行指導性市場經濟。中央建立經濟資料機構，掌握國際、國內市場情況，及時向工商界提供動態，以指導他們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國家鼓勵投資者及生產者投資、生產國內外急需產品，給予貸款、原材料供應和貿易諸方面的優惠。

第二、在工農、農業、商業及其他經濟領域，允許多種經濟體制同時存在並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競爭。如國家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及混合經濟體制（公私合營）。國營企業可以吸收集體或私人投資和股份，（包括外資），有些企業甚至可以轉售。連續虧損者，應予解散。

第三、制訂明確法律保障私人財產、私人投資和私人企業。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吸引外資，快速發展經濟。

第四、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的職工委員會管理。黨委不能領導職工委員會。根據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一下子完全解散現有的國有化工業體制是不現實，不可能的。問題在於，要把企業的領導權交給懂得企業管理，又代表工人利益的人手中，並使企業的生產適應

指導性市場經濟體制。為達此目的，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的職工委員會管理，工人組織獨立的工會以保護自身的權益。

第五、農民對土地有擁有權和使用權。人民公社時，農民對土地的擁有權和使用權均被剝奪。結果，農業搞得蕭條至極。現在，部分地區的農民對土地有了較多的使用權，農村經濟便有了些活氣。可是，土地所有權不在農民手裏，農民就不可能獲得完全的使用權，農民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農村經濟仍不能按其固有規律健康發展。為求農業的盡速發展，要做到還地於民，讓農民自己決定和選擇經營方

式，如個體經營或聯合經營等。

總之，多元化民主政治和指導性市場經濟是在總結大家意見的基礎上，提出的主要政經主張。這些主張，多還停留在初級的階段，其細節仍有待研討和制訂。

我們一再重申，中國的前途，須由海內外廣大的中國人民共同決定。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要做的，並不是一開始就閉門畫出一個既定的藍圖。這篇文章，其目的是拋磚引玉，大家來登上論壇。本刊將開闢「祖國的未來」專欄園地，願大家投稿，參加討論。■

## 推薦一九八三年的大陸民刊「野草」

這裏是兩期油印的民間刊物，最近從中國大陸裏出來的。刊物的名稱叫「野草」。封面上注明的是一九八三年一月出版和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是總第三期和第四期。

用的是劣等的帶黃色的白報紙，八開，沒有切邊（或許是出版製作太匆忙罷？或許是沒有切邊的工具？）油印工夫不太過關，有些地方印模糊重疊了。字體倒是清楚的，作為印刷品還略嫌潦草。然而刻鋼板是一種專門的技術，要找一個可靠字又刻得漂亮的人可不容易，只好自己動手。

身在海外是很難體會得到中國大陸的地下民刊在出版上的困難的。鉛字是國家機密一級的管制品，何況還有一個一九五〇年訂的舊出版法和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在，人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拿到印刷社去。用油印吧，質量好一點的印刷工具和紙張貴得可怕，熱心辦民刊的人的工資又低得可憐。肯捐錢捐物的人不少，可是捐也是一種罪，最高的罪名是「後台」，最低的也要問個「脅從」。

印刷地點自然是絕密。光線、空氣、設備條件也壞，有時就得翻起被子在床板上印。印時萬萬不得粗心大意，上油墨和刮版時要謹慎，手輕了印得模糊，手重了會刮破臘紙。印不了幾張，一個不小心弄錯了，前功盡廢。還得在遮着窗戶的黑房裏，一筆一劃地重頭再來。

二十世紀的人類，一方面把火箭飛船送上了太空，一方面還在箝銬言論自由，這真是中國人的可悲！

當然這也是中國人的驕傲。誰要說，中國

### 本刊評論員

人民天生的該受「專政」的統治呢？請他來看看這種民間刊物吧。誰還要說，中國人民現時還不應有民主呢？請他來看看這兩本「野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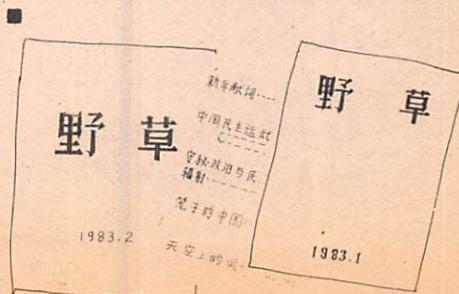
我們之所以向海內外讀者推薦「野草」，是因為它（和它們）代表了一種方向，民主的方向。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方向。

我們之所以向海內外讀者推薦「野草」，是因為它又一次證明了民主戰士並沒有屈服，無論在那裏，那種環境下。

「野草」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上的層次，口號的鮮明上，比西單民主牆又進了一步，對「××青天」們更少幻想。很值得民主人士和學者們研究。

手撫着擺在案前的「野草」，胸中激蕩着杜甫的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野草們已經長出來了，讓我們拍手歡迎它



總第三期

目 錄

社 論

- 大家描繪祖國的未來 ..... 封二

國內動態

- 1 中央湖南會議前後的一些議論 ..... 錦花 ..... 6頁

- 2 軍隊改革的一些內幕 ..... 柳平 ..... 8頁

- 3 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 本刊資料室 ..... 11頁

民刊園地

- 1 推荐一九八三年的大陸民刊「野草」 ..... 本刊評論員 ..... 3頁

- 2 歡迎中國大陸留日學生自辦刊物「春雷」的誕生 ..... 本刊評論員 ..... 12頁

- 3 英德縣的一宗迷信事件 ..... 周瘦 ..... 12頁

- 4 家醜不可外揚 ..... 曉鋒 ..... 13頁

5. 「蒼蠅」和「老虎」

——評趙紫陽在五屆五次人大會議上關於反貪污運動的通告 ..... 魯凡 ..... 14頁

6. 評北京市公安局的禁賭通告 ..... 周瘦 ..... 15頁

7. 我們的使館做了些什麼？ ..... 王超群 ..... 16頁

8. 臨行留言 ..... 卡林林 ..... 17頁

9. 新年獻詞 ..... 「野草」編輯部 ..... 18頁

10. 此地無銀三百兩

——評中共組織部副部長王照華的一段講話 ..... 辛迪 ..... 19頁

來信摘編

1. 申請歸隊 ..... (巴黎) 煥林 ..... 20頁

2. 我的看法 ..... (美國) 小健 ..... 20頁

3. 上海來鴻 ..... (上海) 宗北 ..... 22頁

4. 評中國之春的編輯工作 ..... (紐約) 奧斯卡 ..... 22頁

5. 要有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 (廣州) 一個記者 ..... 39頁

- 6.一位車衣女工的來信 ..... (台灣)林雪梅 ..... 16頁  
7.我們寄希望于今日的覺醒 ..... 「小草」編輯部 ..... 40頁

### 特 稿

- 新聞獨立是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之一 ..... (美國)姜敬寬 ..... 24頁  
專題報導

- 1 一九八〇年大連水產學院罷課記 ..... 張明 ..... 27頁  
2 新疆上海知青鬧事記 ..... 劍明 ..... 29頁

### 思想論壇

- 1 中國人的法治觀念 ..... (加拿大)蒲公英 ..... 32頁  
2 「私有制」是錯誤的嗎? ..... (廣州)谷山 ..... 35頁  
3 關於「四個堅持」的爭論 ..... (波士頓)士心 ..... 38頁  
4.「梁山」和「南山」 ..... (台灣)陳永崢 ..... 41頁  
5.大陸的知識分子能抬頭嗎? ..... 樹人 ..... 42頁  
6.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的比較(續完) ..... 關微宏 ..... 45頁

### 通 訊

- 1 芝加哥中國民主化座談會 ..... 良友 ..... 48頁  
2 中國大使館應對中國之春策略的轉變 ..... 金林森 ..... 49頁

### 文 藝

- 1 敬嘲北京諸公侯(詩) ..... 卜友蘭 ..... 11頁  
2 「中庸」(詩) ..... 小楓 ..... 34頁  
3 憂國是(詞) ..... 鄭保羅 ..... 山頁  
4.他為什麼要申請政治避難(續完) ..... 木木 ..... 53頁  
5.中國之春進行曲(歌曲) ..... (日本)黎音詞  
(新澤西)明樂曲 ..... 封底

### 資 料

- 名譽編輯簡介(續完) ..... 本刊資料室 ..... 封三

# 中央湖南會議前後的一些議論

•錦花•

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在湖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開得十分機密。會議前後，北京一些「機關」、「大院」出現了一些議論。筆者對這些議論進行了收集整理。

## •「歷史性」會議•

不少人認為中央湖南二月會議是一個「歷史性會議」。議論說，此會非常非常重要。一位朋友說：「有關此會內容，中共中央目前已發了十六個文件。涉及人事更動、軍隊改組、經濟政策等諸方面。還沒有任何一個會議能發這麼多的文件。第一個文件就是葉劍英辭職問題。文件說，葉劍英同志在會議上提出辭職。黨中央研究後一致同意，並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考慮。」文件下達後不久，報紙上即公佈了葉劍英給人大常委的信及人大常委的復信，算是就葉劍英問題對全國人民的一個交待。實際上，葉劍英辭職的手續，二月湖南會議上業已完成。

三月的一天，筆者在一位朋友家裏做客，聽到兩位幹部「席外閒談」。現抄幾段對話，以享讀者。

甲同志：「葉帥提出辭職了，有點像西方國家元首辭職的味道。不同的是，葉帥沒有什麼電視演說，而以公開信的形式。不管怎麼樣，現在有點樣子了，議會要有點獨立性了。」

乙同志：「你說人大常委會可能獨立於黨的領導？哪有的事？湖南二月會議第一號文件談的就是葉劍英的問題，黨內先決定好了，才叫人大常委會那麼幹的。但無論如何比處理鄧小平同志的方式強得多了。毛澤東叫政治局開除鄧小平的副總理職務，連人大常委會通知一下都沒有。」

甲同志：「我看人大常委會根本沒什麼用。」

乙同志：「人大常委員、政協、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當然要有，名堂多一點好。否則，我們這些人老了往哪兒去？」

」。

甲同志：「我聽說，二號和三號文件主要講一些人事更動和安排，重點是一些老同志交權問題。」

乙同志：「對。退居第二線的有：許世友、伍修權、吳克華、趙辛初、劉建章、王建委等一大批老同志。目前尚在職，但移交權力的有：梁必業、杜義德、李達、李聚奎等（筆者註：梁必業等現已被解職）。說是『歷史性會議』，僅這三個文件就夠得上了，因它們決定了權力。我們的『歷史性會議』也太多了。如八屆十一中全會、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十大』、『十一大』等，哪一個不是歷史性的？但又有哪一個經得住歷史的考驗？」。

## •鄧小平的上方寶劍•

北京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和湖南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筆者一直被這樣問題所困擾；鄧小平動這麼大的手術，最近手術又動到軍隊的頭上來了，他的權力越來越集中，他不擔心軍隊有人會反嗎？最近，筆者遇到一位軍隊幹部，他給了我一個「合理」的解答。

「你知道嗎？鄧小平手上拿著一把上方寶劍，這個寶劍就是周總理病重時對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叮囑。周總理病重時，接見了十大軍區司令，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可是說了些什麼，僅很少人知道，聽說連鄧大姐都不知道詳情。那時，鄧小平已被毛澤東、四人幫軟禁，對周恩來總理的叮囑更不得而知。鄧復出後，很著急索取周恩來的指示。這對鄧小平來說，是至關重大的事。道理很明顯；第一、馬列主義認為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毛澤東也反複強調這一點，鄧小平要幹什麼，必須取得軍方的支持和諒解；第二、周總理在群衆和老幹部中威信很高，甚至高於毛澤東，周總理的話，相信十大軍區司令會聽的。後來，鄧小平終於從劉伯承處領教到周總理對十大軍區司令的

談話。周總理當時強調的一點是：國家要安定，軍隊不要干政。鄧小平得到這一「指示」，心中好不歡喜，簡直如獲上方寶劍，於是就大刀闊斧幹起來了。」

「國家要安定，軍隊不要干政」，是一句多麼語重心長的話！

鄧小平手揮這一「上方寶劍」，暫時鎮住了那些草莽將軍，告訴他們要聽周總理的遺教，不要干預鄧胡的戰略部署。可是我反過來又在想，鄧小平以這個「上方寶劍」恐嚇別人時，自己不還穿著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嗎？他不是正在靠著楊尚昆、楊得志、秦基偉等軍人的支持和「干政」，來推行鄧、胡路線嗎？

中國果真有一天做到「軍隊不干政」，那將是我民族值得慶祝的日子。

#### ●劉伯承態度的轉變●

湖南二月會議時，北京城裏的議論特別多，大概是中央巨頭都雲集湖南，北京鬆了一口氣的緣故吧！一天，我去拜訪我父親的一位老戰友，某部隊的首長，我特地詢問了幾位老帥的近況。他首先告訴我，劉伯承最近心情不太好。這使我頗感興趣，於是談了起來。

問：「劉帥心情不好，因為什麼？」

答：「據說劉帥是因為小平同志的事。十二大期間，劉老帥說鄧小平最近做得不像話，表示不再支持鄧小平了。希望鄧小平能給予解釋和答覆，可一直沒有回音。」

問：「劉老帥不是一直支持鄧小平嗎？」

答：「是啊！葉帥不也會支持小平同志復出嗎？當然，四人幫垮台後，要求小平儘快出來工作最積極、最出力的算是劉帥了。」

問：「劉老帥說鄧小平做的不像話，指的是什麼？」

答：「葉帥去年三月份就公開指出鄧小平搞得過火了，從而矛盾表面化。劉帥一直沒說什麼，直到十二大期間才表了個態，隱晦地批評小平同志搞過了火。但到底指農村政策呢？還是精簡機構呢？還是對待主席的態度呢？還是對待老幹部的問題呢？我也不清楚。但據我的推測，可能多指對老幹部的處理問題，聽說不少人到劉帥那裏抱怨。」

我端起茶杯，細細思考著這番話。劉伯承、鄧小平是老搭檔了。劉鄧大軍的名字，刻印在每一個老軍人的心裏，對他們來說，劉鄧是分不開的。現在，劉帥居然要與鄧小平分道揚鑣，如果這一說法是可靠的話，就意味著問題相當嚴重了。是劉伯承腦筋頑固，看不慣鄧、

胡的改革呢？還是鄧小平處理問題不當，政策有偏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忽然問道：「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我聽到的回答和很多人的一樣：「我們都長了年紀，管不了那麼多。現在也沒什麼具體工作，當個三看顧問算了（三看：看報紙、看朋友、看醫生）。」

這些話，我早都聽膩了。有人曾說，世界上最擔風險的工作，是做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這種風險是否過去了呢？高層領導人互相殘害，下面幹部留下的恐懼，何時才能在人們的記憶中消除呢？



#### ●一席耐人尋味的議論●

湖南會議被某些人稱為「歷史性會議」，可是一般老百姓並不會聽說。我想不妨把這一重大消息告訴幾個夥伴，他們同和我下鄉，現在都是回城待業的青年。

三月初的一個周末晚上，我約了兩個夥伴開談。我把湖南會議的情況向他們講了，問他們的看法。

一位說：「什麼湖南會議，湖北會議，跟我有什麼關係？實話說，我們對任何『會議』都不感興趣，我們只對『貿易』感興趣。貿易是官場話，我們老百姓叫做買賣，或者叫做生意。實話說吧，我們現在和另外兩位搭夥，專門從遠郊區向市區販山貨等農副產品，每天能弄個三塊、五塊的。這年頭，往前看，沒希望，往後看，不留戀。過一天算一天吧！」接著他講了半天怎麼採購山貨，又怎樣運到市郊等等。

「你們過去不也對政治改革、對小道消息很感興趣嗎？而且經常抨擊官僚特權，聽到哪位局長、部長的又幹什麼了，總是找我發牢騷。」我挑戰似的問。

另一位答道：「是呵！以前我們發牢騷、好批評，反映了一種心態，那就是還希望掌權

# 軍隊改革的一些內幕

柳平

1982年12月中旬，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其後，又在今年年初在湖南舉行了會議，發了十六個文件之多。主要精神是整頓軍隊。目前，整軍運動正在全軍系統進行，目標是軍隊年輕化、現代化，提高戰鬥力。筆者走訪了一些朋友，談起了這兩次會議，現把談話要點，整理了一下：

## 葉劍英下台的真正原因

筆者：葉劍英最近辭職了，彭真以“代委員長”名義接替。葉給人大常委的信看來很誠懇，他是否真的從內心接受了“光榮退休”呢？

答：以前中共高層派系鬭爭，權力人物的下場從來是勝者成王；敗者成寇。毛澤東派勝了，劉少奇派成了階下囚；“四人幫”得了勝；鄧小平、胡耀邦遭軟禁；華國鋒、汪東興掌了權，“四人幫”進了監獄。現在中共高階層權力鬭爭，和以前不一樣，多了一條新出路，叫“光榮退休”，或進入“顧問委員會”，或乾脆到療養勝地“養起來”。如彭沖、陳永貴，還有現在的葉劍英，都走上了“光榮退休”的道路，這也算是鄧小平的一個“高招”，也可說是鄧小平汲取前領導人的教訓而獨創的一條路子。因為以前一失權就進牢房，此種做法太不得人心了。

筆者：葉劍英真的從內心接納了這條“光榮退休”的道路呢？此問題你還沒有回答。

答：“光榮退休”實質是“光榮交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了權就喪失了一切”。這是共產黨宣揚的“真理”，哪裏有自動交權的？

筆者：葉劍英是在什麼情況下被迫交權的，能否談具體一些？

答：這就要從1982年12月中旬軍委擴大會議談起了。鄧小平在12月20日軍委擴大會議上做了重要講話，提出軍隊“現代化”。“現代化”“年輕化”當然是好的，但實質上是加強鄧小平派的實力。在“現代化”“年輕化”的口號下，把“不懂現代軍事科學”的老化



(上接 7 頁)

的人改、希望黨能改。結果呢？改了沒有呢？改了多少呢？特權越搞越厲害。既然沒改多少，我們也就不抱希望了。既然不抱希望了，認為他沒有救，也就不管了。現在，也總算有了個混飯吃的路子，不用靠爹媽的錢養活了。以後有機會再談政治吧！我現在暫時是沒興趣，除非你真給我指出了一種希望。」

回家的路上，我回味著這兩位夥伴的話。無可否認，嚴酷的現實使一些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現實」了。這部分人不是向「前」看，而是向「錢」看。小農經濟的恢復，城市個體經

營的恢復，把一些青年人引導到這條「現實」的道路上來。這或許是鄧小平經濟政策最大的成功之一吧！可是，這種屈服「現實」，是否代表認同「現實」呢？從兩位夥伴的談話看是否定的。他們淡漠的態度是完全失望的反映。不過，不是還有一大批夥伴，加上最近又結識了一批新的朋友，在關心著湖南會議，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嗎？我看了看錶，已近十一點了，我要騎快一點，家中還約了一位朋友要和我討論湖南會議呢！■

一九八三年三月上旬於北京

軍人趕下了台，如在這次會議前後決定了讓許世友、梁必業、伍修權、李達、李聚奎、吳克華、肖勁光、杜義德、葉飛、韋國清等人退居二線，或“光榮退休”；架空了葉劍英。但這些人退位是否真正意味着“年輕化”呢？鄧小平重用的人，如楊尚昆、楊得志、張震等人，不都七十多歲了嗎？留用了這批老人說是做好“傳幫帶”，為什麼不讓葉帥的人去“傳幫帶”呢？年齡差不了幾歲嘛！

所以，葉帥退位的原因之一是軍委擴大會議把他架空了，形勢所迫。另一個原因是鄧小平、胡耀邦整了葉劍英的材料，抓住“辯子”，葉帥受不了，鬧不好要“身敗名裂”，倒不如“光榮”退出。

筆者：這個“辯子”指的是什麼？

答：“十二大”之前，胡耀邦奉鄧小平之命找過葉劍英，勸其進入“顧問委員會”，結果未成。之後，鄧胡指派他們在廣東的代理人（還有人說是胡耀邦親臨廣東）收集與葉劍英有關的資料，收獲良多。比如：(1) 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和女兒葉向真在與外商交易中，均有傾售“禁運”物資的腐化行爲；(2) 葉劍英在廣州貪污腐化的證據，特別是大搞八十大壽時私占國家財產，聽說還有別的。以前這些，北京早有傳聞，但未成材料，這次鄧胡親抓，落實了人證、物證。材料搞好後，鄧派人向葉劍英攤牌，或者“光榮退休”，或者“敗者爲寇而身敗名裂”。葉劍英權衡利弊，選擇了前者。葉劍英並未服輸，只是以退爲守罷了。他并以此法保住葉選平等，以便保存實力，東山再起。

所以，葉帥被迫交印，實際原因有二，一是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前後被架空；二是鄧胡握到了打葉帥的“鋼鞭”。

筆者：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爲何不召集些人向鄧反擊呢？

答：軍委擴大會議，妙就妙在“擴大”上。鄧小平是軍委主席，召集會議權在他手裏，中央軍委會議，理應只有軍委委員參加。但這些年，中央軍委編制未健全。動不動就開“擴大”會議，即不是軍委委員的人也可被指定參加。鄧小平以會議召集人的身份，想叫哪些人參加，就叫哪些人參加，想“擴大”到什麼人，就“擴大”到什麼人。所以，在人數上，鄧派占絕對優勢。另外，開會的時機也操在鄧派手裏，鄧小平等把材料搞全了，認爲時機成熟，便召集會議，葉劍英等當然措手不及了。

筆者：聽說鄧小平、胡耀邦逼華國鋒下台，也採取了同樣戰法。明招是批“凡事派”，批判違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教條主義；暗招是整華的私人材料，這種傳說有根據嗎？

答：無風不起浪，傳說總是有些來頭的。據我們所知，鄧胡至少掌握了兩條整倒華國鋒的鋼鞭。一是蘇振華問題，二是王申酉案件。蘇振華生活糜爛至極，已構成犯罪，思想又“左”得出奇。鄧小平早就想拿蘇振華開刀，但當時實力不夠。據說蘇振華探聽到鄧小平整他的意圖後，找華國鋒求助。華拍着蘇的肩膀說，有我老華在，你就倒不了。華當時還有些實力，一直保到蘇振華病死。蘇振華犯罪的材料及華國鋒保他的證據，鄧胡掌握得一清二楚。再說王申酉案，該案的真正罪魁是華國鋒。王申酉是上海青年，死時卅一歲，是一個很有思想的青年。“四人幫”時代，因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等被捕入獄。“四人幫”倒台後，彭沖、蘇振華接管上海。彭沖親自審查王申酉案，並匯報給華國鋒。像王申酉這樣有真知灼見的青年，理應樹爲思想解放的先鋒。可是，華國鋒指示道，像王申酉這種人就是該殺，不殺對不起毛主席。結果彭沖親自下令，處決了王申酉。槍殺時間是粉碎“四人幫”六個月之後，此事後來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應。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華國鋒。鄧胡把此案宣揚出來，目的就是整華，迫其下台。

筆者：那麼說，華國鋒是有血債的劊子手了。可是，想當年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整風反右辦公室主要負責人，不知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枉死了多少人。華國鋒怎麼不揪住鄧小平的這些“血債”呢？

答：那只有找華國鋒、鄧小平去尋答案了。

鄧胡手中的鞭華鋼鞭



## 解放軍改組的主要內容

筆者：現回到老話題吧，談談解放軍的改組。

答：剛才談的都和解放軍改組有關，華、葉的問題解決不了，解放軍改組也進行不了。解放軍改組的內容，軍委文件有詳細說明，我所記的主要精神有：

(1)軍隊年輕化：重點是處理年紀大的軍師級幹部。超齡（四十五歲以上）的師級幹部一般要轉業，分配工作，調離本部隊所在地區。軍級以上幹部的退位則根據情況予以適當照顧，統籌安排。退下來的軍以上幹部原則上離開首都“養起來”，如去北戴河療養院等。

(2)擴充軍費：以前軍費直接由國家經濟計劃中撥出，今後，除國家有限計劃撥出軍費外，軍隊要靠自力更生增加收入，擴充軍費。第一，軍工生產原先列入國民生產計劃，現歸軍隊收入，列入軍隊經費；第二，除保障正常生活外，軍隊的軍墾農場生產，也列入軍隊經費，軍墾農場亦以“三自一包”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實行獎勵措施；第三，軍隊服務於地方（如幫助基建等），地方要按勞付酬，給軍隊收入，而以前軍隊幫助地方都是義務性的，不取報酬。這樣做的總結果，是擴充了經費。以後，國家經費開支中，軍費的比例在名義上可能減少，實質上軍費不減少或增加，因軍工、軍墾生產可以強化。這樣做，也便於保密，外間難以估測實際的軍費開支數目。

(3)強化軍隊政工系統，軍隊政工人員由黨中央派遣。強調黨指揮槍。

(4)軍隊組織指揮系統改建。軍委所轄各兵種的直屬部隊，轉交各野戰軍直接指揮，有利於組成諸兵種混合的聯合兵團，提高戰鬥力。

(5)軍官的選拔和培養：今後的軍官，如無特殊資質，均由軍事院校培養。中央軍委和各大軍區要擴建軍校，現有未經軍校培養的在職軍官，一律進行短期培訓。

(6)兵源的改變：以前征兵主要在農村。今後，征兵重點在城市，招收高中畢業生。去年征兵重點地區是西南雲貴川地區。

(7)中央軍委自身及直屬機構的精簡工作要抓緊進行。

## 軍隊改組前景的預測

筆者：軍隊的整頓、改組已進行了一段時間，情況順利嗎？

答：軍隊改組的實質，是加強鄧胡系統對

軍隊的控制力，再說明白一點兒，是爲鄧小平百年之後，胡耀邦平穩接權做軍隊方面的鋪路工作。軍隊的改組目前正在進行，表面上是穩定的，但暗地裏就不一樣了，很多軍隊老將們發牢騷。他們指出，爲什麼一些年齡和他們相仿，但堅決支持鄧胡的人仍留在高位呢？依我個人所見，軍隊“年輕化”、“現代化”是完全必要的，說穿了，整頓軍隊就是確定各級領導權即軍官的人選問題。這也是軍隊“年輕化”、“現代化”的重要一步，不辨自明。問題在於，軍官的選拔，不應以擁護某人某派爲前提，更不應以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莫名其妙的條條的表態爲標準。而應該以是否對國家人民忠貞、是否能打仗、會打仗爲標準來選拔軍官。否則，軍隊的整頓難以收到預期效果。回顧一下歷史就知道了，林彪從彭德懷手中接過軍隊時，整頓過軍隊。林彪垮台後，“四人幫”掌權時，也整頓過軍隊，他們都是採取任人唯親的路線，任用一批親信，有的部隊（如空軍）還大換班。“年輕化”的問題，“四人幫”時也喊得震天價響，也提拔了一些非常年輕的幹部。但問題始終沒解決。希望這次鄧小平整軍不要重蹈覆轍。

另外，一些老將發牢騷的問題要解決，解決的最好辦法就是以身作則，凡老化的幹部，就算支持鄧胡路線的，也應退休，這樣就沒話說了。否則，仍不免“派系鬭爭”之嫌。別小看“發牢騷”，這是定時炸彈，不解決會引爆的。

筆者：鄧小平等是否注意到這一問題，而採取相應措施呢？

答：鄧小平還是聰明的，他應該了解這些情況，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是把在軍隊中目前任職的高幹子女，都集中到軍事院校學習去了。高幹子女被統統調離部隊，集中到軍校是很高的一招。名義上是受訓，提高理論水平，實則統一管理，以防閹事。因爲不少高幹子女現在擔任團、營級領導工作，老子一解職、發牢騷，免不了影響子女，他們受了影響，又有一些軍權，當然是一個不穩定因素。

筆者：但願老天爺保佑，希望國家真有民主那一天，免於派系鬭爭的擾亂。

答：這正是大家所希望的。

——完——

1983.3月於北京



# 鄧小平

#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日

，發揚延安精神，在完成各項戰鬥任務下，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把我軍需要的國防開支補回來。國家爲了保證國民經濟的發展，少撥軍費開支是十分必要的，要告訴戰士，國家有困難，軍委有困難，要我們全軍指戰員共同負擔。軍委相信，有高度覺悟的人民解放軍一定能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戰鬥任務。

過去一年，我軍在國防現代化中邁出了一大步。未來的一年，全軍要進一步學習十二大文件，堅持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掛帥。各部隊要迅速掌握現有的現代化武器和提高現代戰爭的作戰能力，各指揮員尤其要提高在現代戰爭中的指揮能力。國防科研單位和軍隊領導幹部，要經常互通情報，樹立一盤棋思想，注意研究外國軍隊和現代武器裝備。一旦可能，希望輸入外國的先進科技和裝備。國防企業的廠礦單位，要繼續進行清倉查庫工作，挖掘潛力。

全軍要把考試測驗當作一個制度。要通過經常性考核衡量幹部的指揮能力，要以考核作為提職的依據。戰士在加強集訓的同時，也要進行嚴格測驗，建立獎評制度。這個制度不單使戰士們得到榮譽，而且還要得到一定的金錢鼓勵。

軍隊在學習新科技的時候，要接受技術幹部的指導和訓練。

中央軍委發了「取消一九六六（4）號軍委命令，全軍恢復駐地地方的治安保衛工作」的通知，這個通知很重要。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野戰部隊各級黨委、各級機關直接參加駐地地方的治安領導和管理，對保衛「四化」建設起着重要作用。■

敬嘗北京諸公侯

卜友蘭

生時不登天安門，

死後方葬八寶山。

政潮起伏全無定。

「平反，改葬」又何難？

# 歡迎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自辦刊物「春雷」的誕生

本刊評論員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在日本又出版了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自辦刊物，名字叫「春雷」。

日本是一個工業先進的國家，民主思想一直很活躍。日本又鄰近中國，一衣隔水，民族背景和文化，都和中國息息相關。因此，中國的革命先驅，很多都曾經留學日本，章太炎、魯迅……不勝枚舉。

今天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看到了今天的日本，在民主思想和中國革命的傳統薰陶下，萌發出一股強烈的希望改革中國現狀的革命熱情，這是很自然的，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們歡迎「春雷」的誕生，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的民運戰士，在日本一定會大有作為。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民主改革史上，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

我們歡迎「春雷」的誕生，是因為我們看到，在日本的中國大陸公費和自費留學生們新的覺醒，他們敢於在比北美更複雜的內外環境中衝殺出來，出版了刊物。這種為人民為民主的自我犧牲精神，更值得鼓掌。

我們歡迎「春雷」的誕生，還有一個很主要的想法，就是，在「中國之春」前後，中國大陸學生在海內外的民主刊物和組織，如雨後春筍，不斷在冒頭。「追尋」、「新中會」、「野草」、「小草」、「春雷」……，以後還會更多。這些民主人士，終將會團結起來，匯成一個廣泛的民運統一陣線。一切至今還在罵民主運動的人們可以聽一聽了，這是歷史的脚步聲。

「中國之春」從一成立開始，就意識到，中國的問題，大而複雜。要解決中國的問題，絕不是一、兩個組織或政黨的事。更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事。中國的問題，是海內外億萬炎黃子孫的事。大家來關心，大家來做，才能做得好。

我們認為，未來的中國，一定會是多元化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同時我們也認為，民主運動的內部，也是多元化的。承認這種多元化，推動這種多元化，正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地方。也正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人士不同於國共兩黨的地方。

基於上述，我們歡迎海內外一切真正熱心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和刊物的出現，我們將竭盡自己的一切所能去支持和幫助它們的發展和壯大。

有堅定的方向，有廣泛的聯合，一個新的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潮，就即將出現。■



## 英德縣一宗迷信事件

• • • • • • • • • 周爽 • •

最近，廣東省英德縣九龍公社的一宗封建迷信事件，是農民從現代迷信中還原成封建迷信的典型事例。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們的信仰作如此移向是驚人的。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地一個六十多歲的許亞俊，去年他散佈

「孫昌公」托夢，要群衆在農曆十月打大醮，否則翌年就會「難星」多。於是九龍公社六個大隊，十五姓共五千多群衆參加。捐款二千元現金，大米二千五百餘斤。設有「總理」、「理事」職務，組織佩戴「九甲安全」的袖章的警衛六十多人和武打隊百餘人，搭起兩座大草棚。設壇調神。從十一月廿六日至卅日，每天前往祭拜及看戲多則萬餘人，少則四、五千人。十一月卅日晚，當公社書記帶領幹警及縣工作隊前往制止這一迷信活動時，幾百人投擲

石塊，把貨車、摩托車砸爛、吉普車放火燒毀。而書記及兩名幹警被亂石打傷。

場面與六十年代廣州車站事件、七十年代北京天安門事件相似。不過這不是發生在大城市而是在窮鄉僻壤，目的亦不是直接的政治性，但從農民對迷信的狂熱，反映出來人們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冷淡。從人們對上級幹部的激烈行動，亦可以看出人們對「官府」的信任程度已降至負點。

這種在共產主義國家裏不可思議的大規模封建迷信活動，不但在英德縣發生，且在全國各地亦不時有這種傳聞。一九七四年廣州市重陽節白雲山的登高事件，被列為反革命事件。當時由於參加者達到廿萬，為防打擊面太大，而不敢隨便列為反革命案件。南海縣的西樵山，每年亦有較大規模的迷信活動。僅局限於一村一鄉的小規模事件則不可勝數，只是在信息流通受阻條件下，鮮為人們所知而已。

過去，在一般人受著濃厚的現代宗教迷信

之下，在共產主義思想還有相當的欺騙性，政治宣傳還有一定效力下，狹小的精神自留地對於麻木的人並不感到有什麼欠缺。但自從文革摧毁了人們幻想中的共產主義理想迷夢後，純真幼稚的人變得世故和成熟了。麻木的人變得覺醒了。於是全民性的精神危機發生了。這是信仰危機、信心危機和信任危機。

這兩年的補救性措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學雷鋒運動等都在危機的崩潰面前無能為力。在中國這封建背景下，人民精神苦悶的解脫唯有從「後門」找尋。農村農民從共產宗教的殿堂走出而鑽入佛教的神廟。市鎮居民從政治學習的麻木和沉默中，變到向賭博中尋找刺激和發財機會。這與蘇聯人民從伏特加酒中尋求快樂和安慰只是不同的民族形式而已。但這卻是社會主義陣營內人民共有的現象。■

(轉載自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二月份第四期)

# ■ 家醜不可外揚 ■

也談戴枕事件

晚報

原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戴枕，因「多年利用職權竊取國家機密，售予港刊『爭鳴』雜誌」，最近被判處十二年徒刑。泄密在今天的開放時代已成了一個流行的罪名，取代了全面專政和封閉時代的現行反革命罪名位置。因為戴枕事件不是唯一的例子，而是「南有戴枕，北有李光詒」。李光詒是「中國財貿報」前負責人，因泄露「情報」給外國人而判罪入獄。除了幹部外，魏京生的第一項罪名也是出賣國家機密，而且是向外國人提供我國「軍事情報」。這說明鄧小平改良派的新政之一——開放政策並不是真正打破閉關自守而面向世界，只不過是掀開多重黑幕之中的最外和最薄的一層而已。而保密則是這多重黑幕中的一幅無形的黑幕。

黑幕之所以是無形的，就是因為人們並不知道什麼是秘密的界線。雖然一九五一年便有了保護國家機密的法例。這也可見共產黨政權是多麼的脆弱，一開始便要纏上多重保護層，保密則是其中之一。在這法例中，有一條極為廣泛的包羅萬有的廣義機密定義：「所有沒有公開的國家事務都屬機密。」但如嚴格執行，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犯泄密罪，這相當於宗教的原罪。而近年頒佈的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條並清楚列明了泄露機密的刑罰。但所有這些廣義的機密定義都使人們無所適從。不但軍事、外交、上層政治鬥爭、科技和經濟情報當然機密或絕密。有連天氣、文化、日常生活用品價格和票據也是機密。在文革時所產生的冤案中，就是有些僅僅因為給海外的親人寫信說些家常，信中有時不免會談到某些生活用品的價格，因此而被扣上泄漏國家經濟情報而被判罪的。至於科技情報，有個幹部神秘地告訴我說：「大部份科技情報之所以保密，並不是因為自己的先進而怕外國竊取，恰恰相反乃是因為落後而怕被人恥笑。」其他的一切情報多是如此。

與外國保密的目的完全相反，中國所需保密的不是先進的東西而是落後的東西，即專制的政治，落後的經濟、文化和科技，這是俗語所講的「臭屎密蓋」，也是中國的政治格言「家醜不可外揚」。■

(轉載自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三期)

# 「蒼蠅」和「老虎」

## 評趙紫陽在五屆五次人大會議上 關於反貪污運動的講話

• 魯凡

去年在全國開展的打擊經濟領域裏的犯罪活動，現已接近收場。人民群衆的反映是：「這場運動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趙紫陽在五屆五次人大會議所作的關於六五計劃的報告，本能地作出了反駁：「……在他們看來似乎只有從高級領導幹部中抓出一批經濟犯罪份子才叫做「打老虎」。今年打擊經濟犯罪的大量實踐證明，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不正確的。目前已揭露出來的十幾萬經濟犯罪案件中，有極少數或多或少牽涉到個別高級幹部。比如有的因官僚主義太重而受了犯罪份子的欺騙；有的對子女管教不嚴以致他們墮落為犯罪份子；有的本人也有某些不正之風，等等。」

這裏為維護高級幹部的利益在遣詞方面可謂用心良苦，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高級幹部有經濟犯罪行為，但却特地使用了多個限定詞，如「極少數」、「或多或少」、「個別」等，儘量縮小範圍，以致把此「偶然個別」現象，當作「四舍五入」而忽略不計。另外對那些明顯犯罪的「個別」高級幹部也以「受犯罪份子的欺騙」、「受子女拖累」、和「不正之風」等字眼為其減輕罪責。趙紫陽最後下了一個定性的結論：「至今還沒有發現高級幹部本人有嚴重經濟問題。」作為此結論的推論便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核心是可以信賴的」。因而人民應該把更多的權力交給這些「父母官」去安排我們的命運。

無奈這番辯護詞，不但人民無法接受，就是基本上由官方欽定的「人民代表」，亦有異意。如法律界的李文杰，中央黨校顧問范若愚、北大副校長季羨林等。

最近，最高法院在天津召開的「經濟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座談會」，為全運動作了總結。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十省市、自治區的高級法院正、副院長，軍事法院和鐵路運輸高級法院的正、副院長以及刑事審判庭的負責人。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在座談會上講話透露：「全國地方各級法院，從去年十月底開始受理各類經濟

犯罪案件共二萬七千多宗，已經審決結了二萬五千多宗，判處各種刑罰犯罪共二萬九千多人。」這些數字與趙紫陽在人大會議上所宣稱的「十多萬經濟案件」大有出入。這便是中央領導人的「精密數字觀念」。江華又說：「剩下待結的二千多宗案件多是大案要案，對幹部中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份子必須依法從嚴懲處。」這種「嚴重犯罪」論與趙紫陽「無嚴重犯罪」論又有矛盾，「從嚴懲處」與「嚴肅處理」也有不同。這些涉及高級幹部及子女的大案、要案所以仍未了結，是由於背後來自特權的阻力。

從最近廣東省判決王仲死刑的行動，便可以看出江華所說對幹部從嚴懲處的真正含義。王仲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原任汕頭地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並不是高級幹部。這個八十年代「打擊經濟犯罪」運動中所殺的第一個，與五十年代初「三反」運動所殺的第一批人——劉青山、張子善相比，在級別上，王仲比劉青山低。殺王仲的姿態並不表明中央對打「大老虎」的勇氣和與特權作鬥爭的決心。王仲之死是人民反官僚特權的輿論壓力結果，也是中央以棄車保帥維護最高特權的一種手法。人民對官僚特權的憎恨從文革開始，經過反「走後門」和反「不正之風」，現時可謂達到群情鼎沸的階段，中央面對這一民情，不得不開展肅貪運動。為了緩和人民的反對，也不得不以王仲這樣的中級幹部之處決來表現中央反特權的「決心」。希望以這樣的「決心」堵塞人民對高級幹部的特權行為的深入追究，以此作為運動的尾聲，拉下運動的帷幕，使那些有高級幹部及其子女牽涉其內的大案、要案永遠成為息案，並通過時間而消案。

王仲的處決還有着黨內派系之爭色彩，王仲當紅之時正是文革軍管時期，他身為一名軍人，正值軍人當權之際，掌握一個縣的權力，奉行極左政策。他當然從本派系既得利益出發，不會支持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事實上，這次打擊經濟犯罪運動也是鄧小平改良派打擊反對派的手段之一。

化工部副部長楊義邦的事件，北京市科技局大騙案都牽涉到幾位前副總理。楊義邦事件只是黨內處理而不使用全國人民都適用的法律。對王仲却作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嚴的判決。這些都清楚顯示中國法治的真正實質。根據同一刑法可以判王仲十五年、無期徒刑和死刑。而死刑這一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的判決，只是高級領導人一句「製造政治氣勢」的話的需要。對「蒼蠅」王仲的判決，要舉行一萬七千多人的公審大會。單此一點，已看出政治人治的體現而非法治的體現。

一個被中央宣揚得如此大規模的運動，其收場爲了中央的體面和表現與特權劃清界線的決心，自然也得轟轟烈烈。而再沒有比大開殺戒的場面更能製造聲勢的了。所以廣東省也是全國第一個開了殺戒——判決了王仲之後，跟着又殺了一個「中國農業銀行吳川縣支行」的經理李竟芳。看來各省也會按預定的百分比選一兩個人頭作祭酒，以慶運動勝利地結束了。這與當年反右按百分比選右派是大同小異的做法。當今的大開殺戒，也與七〇年初由江青、林彪主持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大開殺戒相仿。

在中國，請不要忘記政治的需要（亦即當權領導人爲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而產生的個人意旨）永遠凌駕在法律之上。三十多年的欺騙仍未覺醒的人們，是在迷幻中猛醒的時候了。

（轉載自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二月第四期）

## 評北京市公安局的禁賭通告·周庚

全國賭博之風在大城市的盛行，由北京市公安局今年一月十五日的禁賭通告中得到來自官方的可靠證實。

近年來北京城內，不僅幹部職工在本單位內臨時性的聚賭，而且賭頭賭棍還設立地下賭場作專業性和永久性的賭業。中國法制報舉了大量實例：北京燕山石油化工總公司動力廠有個青工，因賭博輸了錢，上班精神不集中，誤拉電閘，造成一台六千瓩電機停轉一小時的事故。有的青年工人則因賭博弄到傾家蕩產，家庭不和、夫妻離婚、甚至賣兒賣女。更有甚者因賭博挺而走險，進行貪污、盜竊、詐騙、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北京造紙總廠汽車運輸

工人田端平，三年輸掉一千五百元，自己的一切物件賣光後，還把母親的千元存摺作抵押，最後，末路窮途，竟闖到一間食品店殺死兩名女值班員，最近被判處死刑。

不但北京賭風熾盛，其他各地也一樣，遼寧省遼化飯店黨支書馮亞先帶頭，在飯店內聚賭達幾百次，甚至辦公時間在經理室聚賭，湖南零陵縣楚紅街，一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小鎮近年來竟設有十幾家賭場，有的賭場每注賭金在五十元以上。要知道這是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額呵！

公安局在禁賭之餘卻很少想到賭風爲何如此之盛？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的自留地是如此之少，自然而然人們便會在這狹隘之地內作各種突破。如果被占據了的廣大「集體化」的生活園地任由人們自由馳騁，少了枯燥說教和不著邊際的宣傳，有著真正的文藝百花園而非政治的單調堂供人們欣賞，人們被壓抑的精神活動就會被吸引過去，而無需以專政手段去禁賭。公安局的老爺不明白，禁賭的通告與禁止西方流行音樂和鄧麗君之類時代曲的錄音帶是相互對立的。他們不明白這類怡情的音樂及其他西方文化傳播，人們的精神生活真空就不會被賭博所填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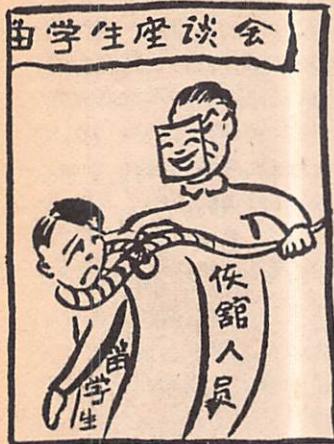
至於賭博背後的經濟原因，則非但公安局老爺，就是中央大員也不能理解了。集體化的經濟和近似平均的收入分配，扼殺了人們追求個人財富和幸福的無窮動力。一種強烈的衝動從無可奈何轉移在賭博的刺激中尋求一時的發洩。沒有正當的發財之路便使人追求僥倖的發財之路。僥倖的發財之路總比在平均主義窒息下永無發財機會而窮死好，這是一些賭徒的心理和選擇。亦是無可選擇的選擇。

至於賭博的心理因素，則更是共產黨人拒絕理解的被鐵定爲唯心邪說。賭博的心理源于生物所具有的競爭本性，人亦不能逃脫這競爭本性。因而西方在開放一切競爭場所——政治、經濟、文化和有限制的賭場。作爲競爭場所之一的有管制的賭場，並沒有引起所有人的沉淪和社會的敗落，它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是偶爾的娛樂形式之一。有更大吸引力的經濟競爭把大多數人的精力吸引過去。承認和尊重人的本性因而使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是民主自由社會與社會主義陣營根本不同之處。抹殺和踐踏人的本性，因而使人性得到歪曲的畸變，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可怕的現象。

迷信和賭博代表了否定現存社會一種負向的表現形式，這是精神危機的不恰當的宣洩，這是一個變革前夕的社會所特有的現象。

（轉載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二月份第四期）

# 我們的使館做了些什麼？



王超羣

來日本快三年了，去年暑假回國探了一次親，國內人看見我們，無不羨慕至極，都稱道我們這批人是天之驕子，是幸運兒，倍受國家厚待。我怕惹禍。硬是一字不提，又回到了東京。

其實我們公費生心裏都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名義上負有照料我們留學生生活，學習的使命，並派有專人負責，可是實際上却是監視留學活動的。來日時使館曾告誡我們，出外均要先請假，大小事一律要先匯報，不然的話，出了事由自己負責等。另外，他們在各個學校的學生中，安插了一些自己的「親信學生」，按時向使館的人逐個匯報各學生的情況，弄得學生人人自危，疑神疑鬼，惟恐稍有不慎，引來大禍無窮。

和我們一同回家的上海同學戴志堅，原是中國科技大學選派來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學習的優等生，在校各方面反映均不錯，在同學中也頗有威信，他到家渡完假，準備回日繼續求學之際，却遭到有關方面的拒絕，吊銷了他的護照，取消了他在日本的學籍，發還原校。學校對如此蠻不講理的處理大為不滿，多次向使館

瞭解真情，屢遭拒絕。這樣的事，不是一起二起了，難怪學生中流傳着這樣的話：別看使館的人笑嘻嘻的，他越客氣，你越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大阪市立大學有一學生名叫陸深，有一天突然接到領館通知：其家中有事，請他去一趟大阪領事館，陸去了後，就此被扣，在領館人員陪同下回去收拾了行李就押回國去了。和他在一起的同學也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聽說，他去打了ハチニコ，但誰都知道這是托詞而已。

中國上層官僚的作風在使館人的身上，反應得活龍活現。公費留學生都無事不敢登他三寶殿，其他私費留學生更不必提了。有時我們爲了報銷，不得不去時，常常要遭刁難，學生們無不怨聲載道，有時實在無法，只得暫時求助於他人。這批使館的官老爺們，每天只顧搞自己的「外交」，不是和大財閥拉關係就是和華僑交朋友，以謀私利。連有些日本人都說，他們是看見穿西裝的人點頭哈腰，看見自己國家的人扭頭橫眼，真不知道這批人還懂不懂「國耻」二字。

總之，這類事對我們國內出來的人來說是司空見慣，儘管如此，但做爲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做人的尊嚴，要有做一個人之起碼權利。我們呼籲各界的朋友們，能夠給予我們道義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勵，一起來正視中國大陸十億人民的人權問題，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這一天終會到來！

（轉載自大陸留日學生自辦刊物「春雷」創刊號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 一個車衣女工的話

王先生你們好：

我是台灣省籍的人，在成衣工廠工作，兩個孩子的母親，受過九年國民教育，所以認得

一點字。自從先生你們力行創舉「中國之春」書刊的消息經報紙披露後，我被深深的震撼，爲了你們那崇高莊嚴的人性美而感動得流淚。愛國愛民的口號喊多了，而今看到真正身體力行的人。

也許苦難使人成長，時下在幸福環境中的年輕人，都比你們開朗多了，但我假設這些年輕的朋友如再有點你們眉宇間憂國憂民的氣概

，相信這些年輕人不會再讓人有一種輕浮不濟事的感覺。更重要的是我盼望全國同胞能藉著你深受的壓力的啟示，領悟到：「社會上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有一種從大家庭中形成而來的性格，就是互相猜忌，凡事都將眼光像三稜鏡般的分析，唯恐吃了虧，以致像盤散沙，不能團結在一起。但願大家之間都有一點爽直和信任。讓全中國人類炎黃子孫都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力量。

中學時時常考一般默書，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蔽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先生你們當今的處境，也當如是自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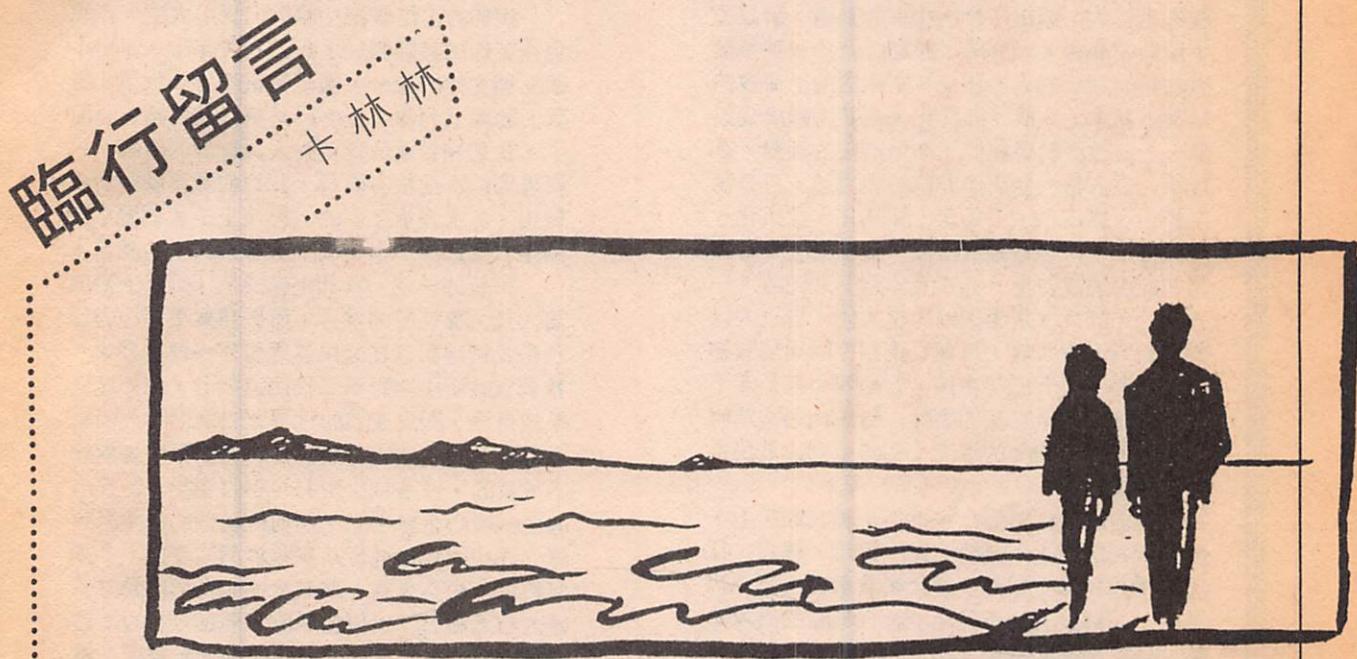
從你們公開接納支援時，我就時時要貢獻自己一份力量，更盼望整個社會能響應，或許

有些同胞還在分析觀察，只要你們的理想、行動真誠的為全體中國人的「自由」、「幸福」，事實勝於雄辯，大家都會支持的。我希望能捐出一點錢投入你們的行列，但目前暫時只能算做「心願」，為的是經濟的不景氣，工作量劇減，相對的酬勞也不多，更難過的是開源節流下來的一些錢被親戚倒掉了，原本錢財身外物，但看運用得宜，而今金錢不能發揮它最大的意義，真予我心痛！但是無論如何我一定訂一份「中國之春」，我相信這個運動是先為精神打地基，你們會更茁壯，更輝煌燦爛。在長遠的日子後（也許並不遠），這起點會讓大家都步入坦途！因為黑暗的盡頭就是光明。

感謝傳達我這份心意的有關人士。

謹此

林雪梅筆於台灣  
十二月八日晚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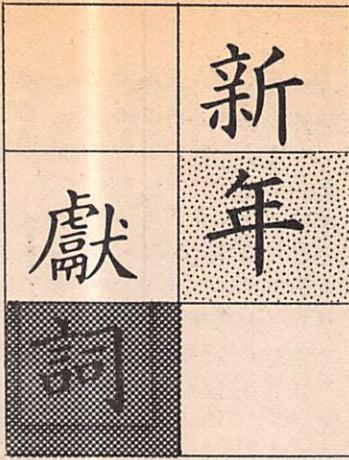
同學們，快放假了，今年的假期對於我們這一批將回國探親的人來說，心情格外激動，預校畢業匆匆回家和家人團聚過後，又是整整二年過去了。

一想到家，心裏不由得是酸又是喜，我們出國在海外的游子們，又有哪一天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不在思念自己國內的親人。可我們又怕回國，不忍看到滿目創傷的她及目光呆滯

，畏縮，想說又不敢言的親友。我們從日本帶回去的大件禮物，醫治不了他們心靈的創傷，更填補不了我們無限的惆悵，心頭壓力重萬斤，我們也不知該如何說好。

總之，待我們回日本後，一定會投身到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中去，為十億同胞，也為自己。

（轉載自大陸留日學生自辦刊物「春雷」  
創刊號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地球繞太陽又轉了一圈，這在時間和空間上是極少差異的循環，但在地球上的人類活動却經歷着萬千的變化，差不多每件事都是「史無前例」的，非獨「文革」所獨享。

中國在過去的一九八二年也經歷着變化，變化的總方向是匯合到世界民主的潮流中去。

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上，由於在去年召開了黨的十二大，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設立了顧問委員會，又完成了國務院及中央直屬機構的精簡和新的人事任命，在中國的上層政治結構上基本上完成了鄧氏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上層政治結構經歷了多個階段的演變。如以第一號人物的姓氏作非精確的表述，可分為集體化、劉氏化、毛氏化、林氏化、江氏化、華氏化、鄧氏化這幾個階段。集權制的時間變化曲線由解放初至一九六九年是上升曲線。一九六九年的九大是集權制的極大值。自九大以後又變為下降曲線，目前集權制又回到解放初的最低點。三十三年在民主的過程中只是走了一個循環，這是可悲的事件，雖然比起文革時的集權制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歸根到底是民主的力量使然。

目前政治結構變化，不但表現在姓氏上，還表現在輩代上。無論毛氏、劉氏、林氏、江氏、華氏和鄧氏都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代老人。而解放初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幹部，則以胡耀邦為首大批進入新的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二代人將主宰中國的政壇。

政治結構在八二年所表現的兩個特色—鄧氏化和年輕化為民主性的相對增加提供了一個條件。但僅是一個條件而已，並不是民主化的實現。

我們民主戰士從不否認鄧氏化對華氏化、江氏化、毛氏化來說是一個進步，亦不是對劉氏化的一個簡單還原。這可能是背負着沉重包袱的中國走上艱辛的民主大道的一個必經的小道。但我們也從不諱言（就是在警察的大棒之

下也從不諱言！）鄧氏化或胡氏化本身不是民主化。不但本身不是民主化，且在他們的引導下也絕不可能走上民主化。他們目前的政績，已是他們作為共產黨人所能走到的離民主最近的距離了。只要看看他們去年四月下達的取締民刊逮捕民運份子的九號文件就可知道。繼著名的民運份子魏京生、劉青、路林等相繼被捕監禁後，今年五月，另兩位民運戰士王希哲和何求亦被廣州市人民法院分別判處十四年和十五年的徒刑。這些違反人權的反民主措施，對最近五屆五次人大通過的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權利是一個尖銳的諷刺。

正是基於這種現實的認識，也基於我們對民主的執著，對人權價值的覺醒，對中華民族的責任。我們決心不顧一切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正當鄧小平的改良派把中國徘徊在民主大道和專制古道之間而又標榜這是民主大道之時，我們的責任是指出這不是民主的大道，而是極易退回到專制古道的危險小道。

我們的工作是把中國推向民主大道。作為這種工作的具體體現，我們在去年十一月份不顧九號文件的禁令，衝破重重障礙出版了「野草」的地下刊物，至今已是第三期與讀者見面了，我們相信這是新年對人民最好的禮物。只要專制的水泥板有裂縫，我們的野草就必然會冒出。在水泥板之下的人民沃土是我們野草充滿生機的保證，我們決不會辜負沃土的栽培。

在新的一年，我們不僅要把「野草」變成為人民大聲疾呼的喉舌，而更重要更深遠的任務是我們應對以往的民運思想作一理性昇華。我們這些新中國的第二代民運戰士，深知自己學識膚淺，對更廣闊的世界背景範圍內思潮缺乏了解，更主要的是我們是在毛澤東主義薰陶下成長的，或多或少帶有平等的空想，泛政治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如何使我們的民主思想建立在中國現實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之上？如何使民主思想成為一種制度並與人們自覺價值觀念自然融合？以何種手段和何種可行的道路達到中國民主化目標？這些論題都是需要一番冷靜的沉思，熱烈的辯論。參照世界和歷史的先例，結合中國現實國情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沒有這個理性的昇華，就不能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達到八十年代水平的民主理論。而沒有這個理論就不能產生有組織的全國民運的核心，就沒有帶動人民推毀專制制度的正確路線和策略，就不會有民主運動的再一次高潮。

是時候了！是產生一套與毛澤東思想體系、與馬列主義理論完全不同的創新的理論體系的時候了。舊理論體系的蛋殼已經破裂，新生的雞雛正在作最後的突破。

理論昇華是我們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工作，在民運運動處於暫時低潮的情況下，在民運份子處於地下的狀態下，也不能不這樣。我們第二代民運戰士將要完全改變往昔紅衛兵式的猛衝猛打的盲目而缺乏理性的現象，我們將會變成智勇雙全的戰士而受到世人的稱許。這種理性昇華的相對沉靜階段，實質是對專制制度反抗而積聚能量的階段，因為在這種沉默的積聚下，隨時都有可能作火山爆發。在四人幫極盛的恐怖年代尚可發生天安門的四五運動，而在今天相對自由的環境下，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必將會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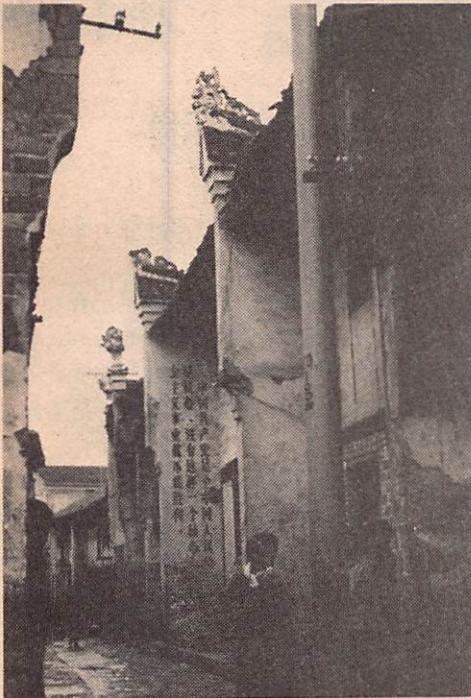
理性昇華與思想輻射是並不排斥的，經理性昇華後的思想輻射將是高能輻射，而不是擴音器所播放的喧鬧噪雜之聲。它不僅向國內人

民輻射，求得人民的共鳴和反應，同時還向海外輻射，求得世人的認同和反饋。經過多次輻射和反饋，這種加強的激光必將點燃民主運動的熊熊烈火。

在新的一年裡，我們願和全國各地及散佈在海外所有民運戰士共同合作，以各種形式推動中國民主化，奮力使嚴寒的冬天「解凍」，迎接春天的到來。

對未來，我們充滿信心，二十世紀之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二十世紀末將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的滅亡。二十世紀初是孫中山先生民主思想的創立，二十世紀末將是中國民主社會的確立。

(轉載自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一月份第三期)



中共十大曾以冒出了一個原上海棉紡廠保衛幹部王洪文為黨的副主席而震驚政壇，這是毛式的坐直升飛機的幹部典型。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重演，在十二大，原任第二汽車廠黨委副書記的王兆國被選為黨中央委員，並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與王洪文任接班人的副主席一樣，這種從政壇上的竄升也是令人愕然的。雖然王兆國並不是副主席，現時也沒有了這個職位，但從胡耀邦從團中央第一書記的官位騰升階梯，以及目下特別強調的幹部年輕化，可以看到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位置是接班人的位置。

以打砸搶起家的小丑人物王洪文，當年的

辛迪

副部長王照華的一段講話

★評中國共產黨組織部

三百兩

此地無銀

竄升自然引起了人們的輕蔑。直升飛機式幹部便是送給他的帽子。今天的王兆國騰達亦毫無例外地引起人們的譏諷。「火箭書記」乃是贈給他的雅號。雖然王兆國也是大學畢業出身，不像王洪文只有初中程度，而且王兆國也是從搞經濟工作開始的，不像王洪文從抗美援朝到

保衛幹部直到打、砸、搶。但王兆國現在鑽進政治這個臭水坑，其前景便可想而知了。

如果人們只是譏諷王兆國本人，那麼還不至動用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照華對這一突然的任命作解釋和澄清。中央的任命從來都不需解釋的，需要的只是執行，這是共產黨三十多年的傳統。這次之所以有史無前例的解釋，不僅是因為社會上嘲諷厲害，更重要的是關係到鄧大人的毛氏獨裁遺風。可能是鄧大人親自命令王副部長出來改變輿論和抹去自己形象的污點，也可能是對反對派攻擊的一種反擊。

都怪包括『瞭望』雜誌在內的新聞報導幫了倒忙。本來旨在宣揚鄧大人有伯樂之才，能深入基層發現有奇才的年輕人，但可惜人們的思路已經發展到不會再按新聞記者牽引的路子去思索。人們從另一思路去想，鄧大人到湖北走馬觀花，順道經過汽車廠，只見了王一面便心血來潮，回到中央後，為了配合其全面奪權的需要，以年輕化來掩蓋鄧氏化的進程，提名王氏便當上了中央委員，跟着便是團中央第一書記。這樣不是把黨代會的民主外衣撕破了嗎？這不是暴露了鄧大人專權獨裁和任人唯親了嗎？這對於鄧氏苦心在世界上樹立的改革和民主形象是一個很大的損害，所以才會有副部長出面作解釋性補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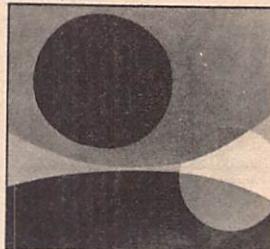
所以王照華說：「……有的報紙發表了文章，造成了誤會，似乎是誰和主要領導接觸了，他這個人才就被發現了。實際上不是這回事。」他又說：「黨的領導同志可以推薦人才，黨員、普通群衆也可以推薦。所以大家都可以推薦幹部，推薦各種人才。」前一句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越是辯護越是使人們更加懷疑和證實以前的想法。後一句是偉大的空話，單位領導人壓制人才的事例天天在報上有所聞，一個普通群衆推薦人才又有什麼可能呢？八〇年各地大學生所以掀起競選區人民代表的風潮，尤其是長沙市大學生絕食示威和上北京請願，各地民主選舉車間主任和廠長流於形式及不能推廣，却說明了民主在現時的中國只是一句空話而不是現實。王照華的辯護是徒勞的。

辯護不頂用，這種不以官方的事非標準為標準的輿論普遍化，令官方大為驚恐，於是于燕南在『紅旗』廿二期上發表文章，對群衆恐嚇，企圖把這種溫和的異見由合法化變為非法化，說：「打擊先進要追究法律責任」，說：「孤立、打擊先進的歪風，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必須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切實加以解決。其中情節嚴重的、觸犯刑律的要追究法律責任。」

這，大概才是王照華為王國兆辯護的真正的潛台詞吧？■

（由於各種原因，我們出版的『野草』印數是非常有限的，敬請讀者互相傳閱，並通過各種辦法向我們的刊物投稿，增進我們之間的了解。）

（轉載自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三年一月份第四期）



## 來信 摘編

### 申請歸隊

各位同志們： 你們好！

收到王炳章代表大家發來的信，非常高興。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我完全贊成你們的事業，並早已在心中向你們認同。對我來說，投入你們的行列，不是基於光榮或興趣，實在是無可推卸的責任。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不為中國的繁榮昌盛盡力？

幾年前，我們幾個朋友曾辦過一份雜誌，實在說，當時大家都頗為絕望，幾乎不相信我們的作為能對中國發揮什麼作用。幹！也不過是向世人表示尚有不滿現制度的人存在而已。正因為立點不高，雜誌無法堅持下來。雜誌垮了，人員也就散了一分散於香港、法國、北美各地。在巴黎，實際上只有我一個人。兩年多來頗感孤獨，今天，正式向你們申請歸隊，盼接納。

緊握你們的手！

煥林 三月

### 我的看法

春運諸編輯：

你們好！謝謝三月十日的來信。原打算把一些想法寫成比較正式的文章寄你們的，但因為忙，目前不可能靜下心來細細去寫。所以，

決定先寫這封比較隨便的信。重要的是希望我的意見和建議於春運能有所裨益。

### (一) 請堅持祖國與人民的利益第一。

「四個堅持」實質上是一個堅持，即理論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實踐上是堅持一小撮決策者的獨裁。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句空話，從來沒有實行過，現在和將來也無意去實行，也不知如何去實行；也弄不清如今中國誰是無產階級，誰不是無產階級，清楚的是，它是專政者用來鎮壓異己的幌子。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對自稱走這條道路的人來說，也一直沒有弄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什麼是非社會主義的。卅多年來，道路幾經搖擺，何「堅持」之有？明白的是，得勢的當權者所走的路即「社會主義」的，失勢者的則可斥之為非社會主義，它需要或定為修正主義的或定名為資本主義的。堅持毛澤東思想是件虛偽、滑稽之事。思想已經重新定義，何「堅持」可談？據說這個新定義的毛澤東思想只含有毛澤東的思想的正確部分。豈知正確與錯誤經歷史檢驗，將不斷變化，要立於不敗之地，不妨提「堅持不斷重新定義毛澤東思想」。可是事實上，所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扼殺一切可能對黨的領導造成威脅的思想因素，是為了治以思想犯罪提供法律依據。總起來把四個堅持翻譯一下，就明瞭得多：堅持要服從一小撮決策人的領導，堅持這一小撮人和由於他們的政策而得到好處的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堅持走這一小撮人在某一時期想走的路，堅持有利於而不是絲毫有害於這一撮人利益的主義與思想。一句話，中共不要國家、不要民族、不要人民。國民黨雖沒系統目的地推出幾個堅持來，但頭腦中、行動上也是在大堅持而特堅持的。目前的春運和正着手成立的組織，是否也要來幾個「堅持」呢？希望春運在對國共兩黨的批判中能領悟到更深的道理，中國並不需要在觀點上有別於國共的第三個黨，需要的是一個嶄新的生機勃勃的，以祖國與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的，因而隨時準備為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或發展成修正或放棄自己的觀點和目標，而沒有自身利益的黨。「堅持」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一切都認死下來，如何發展如何進步？

### (二) 請號召熱愛中國、關心中國的人們，團結起來。

中國之春做為一個雜誌、一個組織，可以也應該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但做為一個運動，

是否不宜強調觀點的統一與一致。中國的事情怎麼才能弄好？什麼是目標？什麼是達到目標的正確途徑？目前這些仍是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國內沒有民主自由，這種研究和探討進行得非常艱難。所以大家支持在國外展開一個與國內配合的春運。這或許有違各位春運發起人的原意。如是，是否應考慮把建立一個有綱領的組織和創造一個研究探討的民主園地，分成兩個方面的工作。

對於在外要求政治避難的人，由於不捨國外生活而不願回國的人，或去台灣的人，不宜有所責難。某些人把他們斥為「敗類」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那些人永遠也不願意好好反省一下，是誰造就了這些「敗類」？何況，「敗類」者，既非國內的待業青年，亦非背了政治黑鍋的人，乃民族的優秀演員與運動員等。對他們個人抉擇的褒貶是無濟於事的，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個不得人心的黨和它建立的不得人心的制度。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去當政治英雄的路可走。我們應該是最能理解他們的抉擇的人。我們只是為祖國失去優秀人材而心痛，加倍痛恨那個腐朽的制度，而更加奮發起來去建立一個美好的未來。

某些春運人員表示不加入外籍，堅持中國國籍，這精神極是難能可貴的，然而各人的個人情形不至相同，故依同理，這些事上，也不必有所褒貶。

### (三) 對國內的形勢應有實事求是的估計。

民運沒有熄火，對的；人民對官僚特權的仇恨日增，是的；很多人開始對鄧不滿，不錯。但同時必須看到，很多老百姓還是支持鄧的。很多人雖對現實不滿，但更關心的是多弄點錢和財，多撈點個人的利益。民運在國內遭到鎮壓後，活動分子面臨非常艱難的形勢。封建思想的慣性，逆來順受，按苟活偷安的哲學處世，三十多年來接受共產黨主政等等已成為生活上的習慣。居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像王紹光那樣的信，不宜認為是惡毒的，恐怕持他那樣觀點的人，比比皆是。他身為專學政治的，又大呼中國的病是封建主義思想在作怪，而他自己却跳不出這封建主義的思想框框——因為中國人的事情很複雜、很難辦，所以，不准去想、不准去研究、不准去探索，現存的就是好的，慢慢就會越來越好，否則天下大亂，事情更糟。這是王紹光的基本出發點。與他討論辯駁是大有好處的。但與他同樣一類的人仍應歸於「熱愛中國、關心中國、希望中國强大、人民幸福的人們」之列。請勿追求觀點上的純

而又純。請寬容不善意的指責與措詞。

我跟你們一樣，都是大陸出來的公費留學生，正集中精力做博士論文，功課多，時間又緊。匆匆寫下的幾條意見，又亂，字又潦草，請見諒。

祝

好！

大陸留學生 小健 三月十五日

## 上海來鴻

「中國之春」王炳章同志及各位編輯同志們：

欣悉「中國之春」能克服重重困難，排除萬難，在一九八二年底創刊，與全世界廣大讀者見面，儘管我們在國內由於政治環境限制，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從特殊而又十分隱秘的傳遞管道中得以窺見貴刊的全貌與全部內容，但我們相信，只要你們真正站穩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堅定為民主自由和正義真理而奮鬥的決心，那怕你們傳來的是一點一滴的訊息，對一切倒懸待救的國內同胞來說，都是向黑暗投射進來的一線黎明的曙光，也是復甦大地的陣陣春雷。

照「中國之春」的計劃，它將繼承「北京之春」刊物「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爭民主法治、爭自由人權的光榮傳統，負擔起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歷史任務」，又要「作為一個新的中國問題論壇，要對中國現在的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進行揭露和批判，也要對中國社會的過去和未來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同時還要介紹當代社會科學學說和人文思想、世界各國政經制度的特點，以及各國人民在爭取自己國家的政治民主的鬥爭所取得的經驗，為改造中國

社會積累更豐富的經驗」，這一目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我們相信，理論如能配合行動，則這項運動必將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其方向目標也將更為廣大群衆所共觀共信。

舉例來說：魏京生、王希哲、傅申奇、劉青等大批民運先鋒他們在理論和批判上積極為爭取民主自由作滔滔雄辯和下筆萬言的鼓吹工作，而且也以「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的大無畏精神，置身於極權統治者的天牢地窖之中，他們不怕殺頭以無比的勇氣來犧牲自己，作這個民主自由運動的神聖祭品，何等令人欽佩，正由於他們這種實際行動，使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從悲憤中、潛伏下更強韌有力的新生力量。具體的說：他們從容赴難的精神感召，已遠遠超過同一時期（即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蓬勃興起時期）所發表的言論相積相乘的總和。

基於這一個體認，我們認為「中國之春」要從「北京之春」被砍倒後伸延到國外的一棵新的枝芽，再回到國內深深紮根，就不但要繼承所有民運先鋒志士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等光榮傳統，而更必要的是：「中國之春」要在全世界言論可達、文字可通的地方發起廣泛的輿論，團結和動員一切可以獲得支援的力量，共同為營救魏京生、王希哲、傅申奇、劉青等大批被投入牢獄的民運先鋒志士而奮鬥，只有這樣，「中國之春」爭取民主法治、爭取自由人權的旗幟就更鮮明。而在國內，這種實際具體的行動，也更能產生深遠的共鳴迴響，並將成為這一運動的重大推動力，使之再萌芽、生根、茁壯以至於蓬勃地發展起來。

宗北 於上海

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

## 評「中國之春」的編輯工作

「中國之春」由王炳章等大陸留學生在海外創刊以來，頗為轟動一時；使海外文化出版界發生一次不算小的震動，主要原因就是這份完全由大陸留學生主辦主寫的刊物，直接自稱為大陸民主運動的喉舌。因此第一期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之後，數小時之內在紐約的報攤上便銷售一空。雖然內容並不豐富，篇幅也

少（僅三十六頁），但在一般知識份子讀者中，却獲得很大的反響，數家紐約中文報紙還互相競相轉載。因此，該刊的傳佈，可謂近來海外刊物中少有的現象。從印刷與編排的技巧來說，他却很難與其他香港出版的同性質的刊物競爭，特別是以打字方式印刷，其活動性基本上就有很多限制，事實上不夠美觀。

現在，「中國之春」的第二期又出版了。它的封面除了由藍底紅字變成綠底紅字之外，便祇有時間和定價（由美金一元增至二元伍角）的改變。設計和圖形兩期都是一樣。在內容上，當然就大大不同了。篇幅頁數也較第一期增加很多（七十六頁）。作者方面除了大陸留學生和國內的投稿外，還有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等地的作者，甚至還有台灣讀者的投書，其稿源的範圍可說擴大了很多。不過從文字的水平和編排、印刷上來看，似乎並沒有什麼進步。由於插圖和照片的減少，在吸引力方面，嚴格地說，還不如第一期。

內容上，第二期的「中國之春」有以下兩個優點：第一，它代表民主運動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與行動。譬如署名「本刊評論員」的一篇「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中便有這樣的話：「怎樣才能實現民主政治現代化？——必須改革思想、主義、社會體制。……我們以為，不要光說，而要去做。怎樣做？先做第一步：曰開黨禁、開言禁、釋放政治犯。」由於它被放在首篇顯著的地位，也可以算是一篇正式的社論。另外，在該刊的最後兩頁，也刊有「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的第一、二號公告，除了正式說明運動的宗旨及立場外，還開列十二處（包括北美各大城市及香港）聯絡站的地址和電話，以便使贊助人和有意參加者直接採取行動。以上這些，都是中國之春與其他海外華文刊物最主要的區別之一。

其次，中國之春第二期刊出了十五封讀者投書，正反意見都有，顯出她的編輯政策，對於讀者的意見是很重視的。這些讀者來信幾占該刊總篇幅百分之十五（即十五頁），編者按語中並指出，凡有一定代表性的信件，儘量刊出，持反對意見的信件，全部發表，不加刪節……。這如果不只是暫時定的原則，而是該刊將來固定的編輯方針，而且能夠鼓勵並多刊載讀者意見，則她本身即代表一種民主作風，使讀者的意見得以反映出來，不像其他華人政論性刊物或官辦刊物，只刊一面之辭，或肯定自己立場的言論，對於反對文章或讀者意見隻字不登的作風也要好得多（當然香港刊物中如「明報月刊」、「爭鳴」、「七十年代」等，也都闢有讀者來信欄，而且，選載的信都頗有補充或參考價值）。也是很值得其他刊物參考比較的。

至於「中國之春」的缺點，是很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會一致的。筆者僅就個人主觀的感想，提出兩點供大家參考：

第一、編輯態度不夠理性化。一個政論性

刊物（徵稿啟事：「本刊文字以政論為主」。），文字上必須強調理性，不能太「感情用事」，否則，不僅使讀者起反感，而且根本缺乏說服力。從「中國之春」第二期中，讀者會發現至少有兩篇代表編輯部發言的文章，充滿了「火藥味」。其中一篇是主編李林「對一些問題的澄清與回答」，固然是名正言順的反駁外界對「中國之春」運動的誤解，或用作者的話，「不負責任的粗暴攻擊和造謠」；但行文時，却不一定需要用挖苦的或極盡諷刺的語氣（例：「對這個簡單事實的分辨，那些動筆做文章的人還不至於搞不清楚吧！」），使當事人或客觀讀者，都激起一種感情上的反效果，不但不同情而且會引起厭惡感，因而失去作者的本意。另外一篇由「中國留學生李浩然」署名，「答王紹光同學來信」的長達萬字的反駁信，也是採用了類似的態度和語氣，（譬如：「在此，我不想給你開一張論及民主和自由的書單子——你的教授們大概已經做了。我只建議你花一個星期六時間讀一位古典的馬克斯主義大師——羅沙·盧森堡的一本書，『論俄國革命』。」）本來是一篇頗有立論根據，而且理直氣壯的文章，但由於採用了這種傷人感情的態度和語氣，以致使作者的努力，不能達到任何說服或影響力。這種作法，不適宜於理智的辯論問題，筆者認為是「中國之春」的編輯先生們應該注意避免的。

第二、理論性與文藝性的文章，文字上不夠精練，不能「深入淺出」。當然單從一期的文章是不能對「中國之春」作這種評語的。也許是初創，缺乏編輯經驗，不能使死文字變活，而必須「文責自負」，任作者自己去發揮，而不作編輯上的「文飾」或大幅度修改。但為了使刊物保持相當的水平，為了使讀者不致於「望文生畏」，編者的責任是不能推辭的。筆者在這裏不能詳細舉例說明，祇不過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希望「中國之春」的編輯先生們參考：首先，文句太長的應該可以減短，或分成短句。譬如有一篇文章的開頭，便有這樣一個長句子：「本文的意圖旨在運用比較分析法，通盤考察幾個主要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以便從中獲得某些啟迪，作為分析我國經濟制度的參考。」如果編輯願意花點時間，把這個句子改寫得簡單一些，譬如說，「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比較分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以為研究我國經濟制度的參考。」讀者豈不更能一目瞭然？在意義上，筆者相信，並沒有損害原意，或有誤解之嫌。但對讀者來說，却要易讀

多了，以此類推，編輯的任務是很艱巨的，對文字的修養，也是需要相當磨練的。相信「中國之春」和其他海外華文刊物的編輯先生們，也都能同意筆者的淺見吧。

最後，筆者必須說明，寫這篇短文的目的

並不是為批評而批評。相反地，這些思想是為了希望所有海外華文刊物（包括「中國之春」）都能為強調理性辯論與改進文字的表達技巧，共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一九八三年三月卅二日）

# 新聞獨立是

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之一

• 姜敬寬

(一)

現代文明的進步，促成大眾傳播工具的日新月異。傳統的報紙和雜誌本身的編排和印刷的改進之外，廣播電視等更迅速、更直接的聲音與影象，在傳播新聞與形成輿論方面，都是過去任何時代所望塵莫及的。

由於這種傳播工具的普遍被採用，於是更證明中國俗語所說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正確。加上文化教育的一般普及，和交通工具的進步，整個世界的距離因此縮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照理也應該相對減少，甚至完全消失才對。但是，事實確不如此。

這一方面固然說明工具的使用在人，另一方面，也表示人的思想是極為複雜的，沒有一

定的定律可循。由思想而表現出來的行為，更是千變萬化，絕不是哲學家或心理學家的理論所能輕易規範的。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人都不可以理喻。根據一般觀察，這祇是說明人的行為與思想，絕不能用法律或固定的規律而加以嚴格地限制。縱使限制可以成功一時，也絕不會長久。這是人性的自由，也是自然的規律。

大眾傳播工具的重要，在於它能影響大眾的思想和行為。美國犯罪率之高，堪稱世界之冠。社會道德之敗壞固然是主因之一，而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上的所謂「暴力」節目之多，也很顯然是造成罪犯模仿的最大動力。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美國近幾年的大選，電視廣告的好壞，往往也可以決定候選人的成功與失敗。傳統的印刷品，反而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種現象倒並不是工具本身的好壞問題，而是使用的主觀與客觀問題。單以報紙和電視而言，美國的報紙對候選人均採客觀態度，詳細介紹其個人背景，以及對有關問題的立場和解決辦法，然後分別在社論裏判斷其能力和可行性，最後祇提出建議，讓投票的公民自由選擇決定。而電視上由候選人自己或其助選團體所做的宣傳廣告則是主觀的自我表揚，有時對政敵還加以攻擊，其效果是很容易引起觀眾或投票的公民在感情上，造成先入為主的印象，因而比較容易達到其爭取選票的目的。

由此可見，大眾傳播與民主政治是有極密切關係的。

(二)

民主與不民主的基本區別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大眾傳播工具是否真正可以獨立超然於統治者的掌握而定。如果大眾傳播工具完全操縱在統治者手裏，成為統治者的宣傳工具或傳聲筒，凡是與統治者意見相左或對立者，皆被取締，那麼，這個國家便不可能有民意自由發揮的餘地，便不會有反對黨或團體的存在，因此，便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以此類推，相反地，任何一個國家，其大眾傳播工具，越是自由超然，不受政府控制，這個國家的民主水平便越高，它所實行的民主制度，便越激

底。

舉幾個最明顯的例子：美國的大眾傳播工具，可謂世界上最發達最自由的。其影響力遍及世界。有些國家的知識份子，不明真象之前，總以為銷行世界的「時代週刊」和「讀者文摘」，上面刊載的文字一定是代表美國政府立場的。然而，凡是在美國住過一段時期或對美國的大眾傳播，稍有了解的人，便知道這完全不合事實。再以最有權威性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來說，它們的報導和言論，確實會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的，但它們也都絕不直接或間接受執政者的控制。電視廣播界的情況，稍有不同。由於電訊波長有限，國會立法，對此種傳播機構是有特設的國家委員會與特定的法律加以約束的。但這種約束僅限於非政治性的技術問題，特別的要求是每個經此委員會登記的合法廣播機構，必須在節目之中包括對大眾福利有幫助的項目，即所謂 *Public Interest Programs*。否則，它們佔用了公共的時空，而不能為大眾服務，便要遭受法律限制，予以不延期的處分。

一般來說，美國的大眾傳播工具，祇有事後違法的依法起訴，絕無事前加以嚴格限制的。這是美國新聞界的自由，也是代表真正民主的試金石。至於新聞或大眾傳播對社會有許多不合道德的影響，譬如少年犯罪、性犯罪、謀殺罪等之普遍，雖然常為人所追病，但這也正是美國真正民主的特性。如果一般人民對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加以安排和保護的自由，那麼這種自由便附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責任，不必由別人強制或越俎代庖。如果一般人民對某種社會需要能夠達成協議，他們也有權利共同決定最合乎公眾利益的處理辦法，譬如選舉代表、製訂法律、徵稅、維持治安，等等。由下而上，民意上達，官員真正為人民服務，不得高高在上，「作賤人民」，這才是「民主」的具體實現。

當然，美國的大眾傳播工具中，也有不少是專為某種集團服務的。譬如「華爾街日報」是以工商業的經理們為主要對象的，因此它的言論多反映工商業的利益；「國家論壇」（*National Review*）是共和黨內極保守的人士主辦的，它的言論更是很明顯地代表這一黨派人的觀點。其他屬於各行專業的報刊雜誌，以及區域性（如 *New York, Chicago, Los Angeles, Connecticut, California* 等），學術性（*Scientific American, Science,*

*Foreign Affai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等），社會性（*New Women, Atlantic Monthly, Esquire* 等），都有其特別的讀者對象，因此對某種問題，它們也都會代表與讀者利益相附的特殊立場。但是，却很難在五花八門的報攤上找到一份代表美國官方的政府刊物。這是為什麼呢？很簡單的回答，就是美國的政府在言論方面，祇能反映人民的意見，而不能把執政者的言論強制性的迫使人民接受，因此它們祇有各部會及國會的報告或紀錄，而沒有專門代表政府發號施令的機關報或刊物。

美國之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自稱民主的國家。據筆者的了解，法國、英國、意大利、西德、日本等，雖然都有黨報的存在，但也都有一兩家全國性的報刊，是完全私人經營，在政治上是佔在超然立場的。法國最著名的「世界日報」（*Le Monde*），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London Times*），意大利的 *La Stampa*，西德的 *Die Welt*，以及日本的「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等，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經濟和政治都能獨立超然，不因黨派的鬥爭而存在，更不因政府的政策而動搖，因此它們能夠站在讀者即大眾的立場而監督政府，批評國家的政策，更重要的就是爭取人民的權益和利益，促使執政者不得為所欲為。

### (三)

反觀我們的中國，以及其他施行民主不夠徹底的國家，它們的共同特點豈不是缺乏獨立超然的全國性的報刊嗎？筆者並不否認，在國內和海外，甚至在台灣海峽兩岸，也經常有自稱為「獨立超然」的刊物存在。特別是近年來，在台灣、香港和美國，都有這類刊物的出現。但是，它們是否真正為全體華人的利益為基本立論的出發點呢？還是為了要達到少數人的政治目的呢？它們是否本身具有容納「不同政見」的風度呢？還是「自己就是對的，別人就是錯的」觀點居多呢？更進一步地說，它們是否真正能夠在經濟和政治上採取超然的立場呢？

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反省。特別是海外的知識份子，以及國內的領導階層，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向民主的方向發展則已，否則，對這項民主與大眾傳播的關係，就應該重視，對如何建立獨立超然的傳播工具，也就必須研究和努力了。根據國際上現實的例子，沒有真正獨立超然的大眾傳播，便不可能實行真正的

民主政治。這個道理很簡單，也很明顯：大眾傳播工具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數的人民執行監督政府，維護大多數人民利益，單靠少數所謂的「人民代表」是不足以發揮作用的，更何況這些「代表」，在選舉制度不夠完美，政治風氣沒有真正民主化的今天，根本就「有名無實」，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呢？

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傳統，國內的大眾傳播工具，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操縱在執政者的手裏，千篇一律地代表執政者向人民宣傳，尚且情有可原。台灣的「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中央發言是名正言順的。大陸的所謂「人民日報」，變象地專為共產黨的官方喉舌，經常與「人民」站在對立的立場，却不應該。最不能使人了解的就是目前在紐約的許多華文報紙，為什麼還不能利用這個新聞極度自由的機會，發展一個真正為讀者，獨立超然的輿論機構？尤其更不能使人理解的就是最近筆者在洛山磯的一次經驗——竟有書店祇賣右派或祇賣左派的報紙，而完全排斥中間立場的報紙的現象！難道美國的華人，都必須要依國內的政治鬥爭而自我「劃清界限」嗎？難道海外的華人都必須要把一隻眼睛閉起來，祇用一隻眼睛來看中國的問題嗎？這樣的片面觀察和了解，怎能對問題作全部的研究與探討呢？知識份子尚且如此（特別是海外的知識份子），中國的統一還有什麼希望呢？大眾傳播工具，常此下去，中國的民主政治，也是絕不可能的。

#### （四）

民主政治的條件當然不限於僅有獨立超然

的大眾傳播；它還需要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憲法和制度，以及政治家互相容忍不同政見的風度與社會風氣。但筆者認為，大眾傳播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具體條件，因為憲法和制度是要人去執行遵守的，如果沒有客觀的監督者，破壞憲法和制度的人，便可無所顧忌。同樣的，容忍的風度和社會風氣，也是需要大眾傳播的工具加以培養才能奏效，而且不是短時間可以成功的。因此，目前海內外知識份子，如果真心誠意地希望為國家（或祖國）盡一分力量，真正希望中國將來成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國家，筆者淺見以為，最實際、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吸取西方民主國家在大眾傳播方面所表現的精神和教訓，進而在可能範圍內，推動並支持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獨立超然報紙或雜誌，使其言論不偏不倚，使其真正為大多數的華人爭取利益，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反映讀者各方面的興趣和意見，不為某人或某團體的小利益而忽視大眾的利益。

在海外如果能夠建立這樣理想而確有影響力的傳播工具之後，這裏的經驗和精神，更可進一步向國內發揚，協助並支持同樣獨立超然的傳播工具，祇要是為公而不為私，相信執政當局會逐漸由了解而認同的，於是這種理想中的報刊，便可能在國內生存下去，中國的民主前途，便可因此而更有基礎，更能達到徹底實現的目的。

總之，這是筆者的一點淺見和感想，疏漏之處，尚希讀者指正。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於紐約）

###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NAME

地址：

ADDRESS

中文

零售：每本 \$2.0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每期另加郵費

航空：\$2.00

平郵：\$0.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加拿大） P. 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 一九八〇年大連

·張明·

## 水產學院罷課記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早晨，遼寧省大連市水產學院的食堂附近一堵大牆上，醒目地貼着兩張大紅紙，墨跡未乾，題目是“致全院師生的一封公開信”，下面落款是“養殖系、漁機系、港工系、捕撈系八〇級四個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於無聲處

一九八〇年是風起雲湧的一年，全國各高等院校藉着選舉活動鬧起了特大風潮，反官僚爭民主的鬭爭此起彼伏，但是，處在渤海灣的大連，却似無動於衷，同學們仍然每天來往於宿舍、教室、圖書館、食堂、彷彿這裡與世隔絕一般，但是，人們在私下傳說、討論，他們

對於學校領導的不滿情緒正漸漸滋長起來。

學校在房屋方面早就存在不少問題，有些教師還住着簡易房。住在樓房的教師，也是一家擠在十平方公尺的房間裡，房間放不下一張桌子，就以床為桌來備課。教師要求學校解決困難，學校領導就以某處正在建房來敷衍。

再看看學校辦的工廠，現在已處於半停工狀態，人們不會忘記，在一年多前，不懂經營管理的學校領導人也搞起了獎金制度，說是如果工人生產超過指標，以百分之三十的利潤作為獎金。於是工人賣力地幹起來了。然而到發工資時領導人却食言。工人超產了，却不發給獎金。工人發怒了，他們眼看辛辛苦苦地拼命生產却依然得不到獎金，就實行怠工。

(轉後頁)

### “禾冂有制”是錯誤的嗎？

(上接 37 頁)

向，像目前改革所開的頭，也馬上使社會有了生氣和活力。

這便是從宏觀上總結目前世界不同類型經濟狀況而得出的公理，也是目前改革為人們忽視的深蘊的哲學意義。這也是我們理論體系的

出發點。本文只是結合目前改革的實際籠統地淺說一下這個出發點。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所依賴的公理，還需要嚴謹和精確的概念化和抽象化。但願我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學校的食堂也令人反胃，那被稱為學校“名菜”的白菜粉條，人們常常能從中挑出被叫做“大連特產”的蒼蠅來，師生為了逃避這些“名產”、“特產”，不得不到附近的餐館吃飯。

學校宿舍怎麼樣？也是令人望而生畏，因為學校安排一些家屬戶住在學生宿舍底層，一走進去，就看見煤餅、煤球，和成堆的堆積一起，又是養雞養鴨養兔子，飼料和糞到處都是，弄得宿舍樓臭氣沖天，同學們走進宿舍只能掩着鼻子而過。

學校領導面對這些問題，只是敷衍塞責，互相踢皮球，你推我擋，於是問題愈積愈多，師生怨氣也愈積愈大。

#### ● 開事前夕

進入冬天，按國家規定應是十一月十三日開始供應暖氣，然而與家屬戶同住一宿舍樓的港工系、漁機系、養殖系、捕撈系等八〇級四個班的住房，却沒有暖氣，同學們凍得難以入睡。

學校領導是早知道這些情況的，同學們曾三番五次找領導人，得到的答案是“研究研究”，有一次找到院長，他却乾脆地說：“這有什麼關係，現在你們條件已好很多了，想當初我們幹革命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可是在狂風呼呼作聲的夜晚，冷風從窗戶縫吹進來，整個房間就像冰窟一樣，有些同學凍得受不住，就只好兩人一起合睡擠着取暖，但是有的還是凍得徹夜難眠，白天上課就不免打瞌睡，身體健康和功課都受到很大影響。

#### ● 忍無可忍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研究」還是沒有結果，十二月初的一個夜晚，有些同學睡不着，就敲起了門窗。這聲音似鬪爭號角，一時各個房間都呼應起來，整個宿舍樓的學生都走出來同時敲擊門窗，震撼了校園，有些同學喊：“要罷課！”立刻得到許多同學響應。

住在宿舍樓底層的學校黨委書記，聽到了敲擊聲和呼喊聲，便慌張地趕上樓去察看。有的同學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待他作自我介紹後，突然間學生人群都湧向前把他重重包圍。站在最前面的學生質問他，罵他，站在後面見不到他的學生則齊聲高呼口號要罷課，把他嚇得直冒冷汗，大家問他準備怎麼解決？他最後答應：“明天中午一定解決問題”。

第二天上午，許多教師都來看望這些學生

，他們對學生的處境都表示同情和支持，而且期望問題能得到合理解決。

中午已到了，暖氣還是沒有來，學生們商討了罷課事項，消息很快傳到了學校領導層，幾個副院長副書記便趕來“訊問”，然而學生們已經再忍不下去了，他們覺得不以實際行動對校方施加壓力，問題是會繼續拖延，況且要解決的還有食堂問題，教師的住房困難問題，他們認為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舉行罷課。

晚上，經全體同學討論和修改，通過了罷課聲明，向全校師生陳述他們的困難境況和要求，向校方提出復課的條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深夜，冷風依然使人凍得發抖，但是同學們滿懷着希望。不過他們也知道，一旦罷課失敗，後果也是難料的。幾年前也是在這個學院，學生們為了要求改善伙食，曾經進行集體絕食，最後不幸鬭爭失敗，許多同學受到了處分。

第二天清晨，學生宿舍樓擁出一大群人來，他們匆匆走到食堂附近的一堵大牆前，七手八腳地把罷課的告示貼上去。

早飯時刻，告示前面擠滿了人，有的看到學生挨凍受寒的苦境，讀到“請院領導們想想，如果你們的子女在千里之外求學，得到這樣的待遇，你們會怎樣想？……”不禁流出同情的淚來。

不多久，告示旁邊貼滿了許多班級同學的聲援書，都表示支持他們的聯合罷課。

當天上午，院領導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過後不久，一位副院長出來會見學生罷課代表，表示答應學生的全部要求。

#### ● 鬥爭得勝

校方答應這四個罷課班級的學生全部搬到有暖氣的教師辦公樓去暫住，並將調整教師的住房和整頓食堂，由學生進行監督。同時保證任何同學以後不會因罷課行動而受到任何報復，和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罷課持續了兩天，終於校方全部接受復課條件。

幾個月後，院長和黨委書記受到了處分，都被調離該院了。

罷課的勝利，使得一些無能的學校領導者下台，在大連市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在全國也不多見。人的權利是靠鬥爭爭取來的，民主也是靠鬥爭爭取來的，這次小小的罷課，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 新疆上海知青鬧事記 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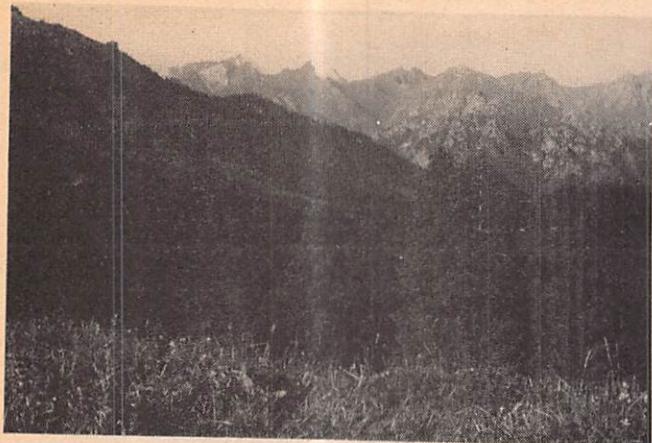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新疆阿克蘇地區上海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鬧事時，我是個目睹者。事情鬧大後，中央一夜翻臉，宣佈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在烏魯木齊市及五四次列車沿途追捕鬧事青年，有一個同事的弟弟就藏匿在我們房中，更使我深入一點地了解到事件的來龍去脈。但願我的記敍于外面的新聞界有所幫助。

## (一)

早在一九六二年到六六年期間，上海市用動員的方式，以中學老師、里街幹部，以及新疆征兵人員三方面配合，在四、五年間大約總共動員了十幾萬上海知青到新疆軍墾農場安家落戶。記得當時有個十分流行的電影，叫「軍獵戰歌」，在上海各地，尤其是學校到處上映。

拍的是烏魯木齊市內各種蘇式房子，頗有異國的洋味。還有石河子（靠近烏魯木齊市的另一小城市）一帶的綠洲，兩邊筆直楊柳樹的公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西北大草原，廣闊無垠的大田，一台台拖拉機，康拜因聯合收割機，還配著「邊疆處處賽江南」的動人歌聲。這對當時從未離開過大城市的上海青年，是多麼的吸引呵！報章雜誌上流行著一句十分時髦的革命話：「青年人，你既然如此地熱愛大上海，那就更應該離開它到邊疆去，用自己的雙手，親自將邊疆建設得比大上海更繁榮，更美麗！」

於是數十萬計的十幾二十歲的上海知識青年，一個個滿懷熱情，穿上了草綠色的兵團軍服，高唱著革命歌曲，辭別了父母兄妹，出發



青年們實在太年幼無知了，火車一開過西安，窗外就漸漸看不到綠色的東西，一片片盡是黃土高原，再過了蘭州，茫茫無邊的戈壁荒灘，沒有水，沒有了人煙，也消失了生命，火車整天在這沙漠上奔馳，有的人就隨著車廂的一顫一簸抽泣了起來，越到後來聲音越來越大，可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從全疆來講，北疆沿著天山山脈北邊，南疆沿著塔里木盆地，東疆在哈密一帶，分散著從農一師到農八師各個師級農墾兵團。師下設有團，團下設有連隊，這連隊才是一個實際的生產單位。知青們一到烏魯木齊，就被各團場幹部用車拉回自己團裏，再分配到各個連隊，鑼鼓歡迎，大會表決心。上海青年們從此結束了大城市的生活，在這荒蕪無際的戈壁沙灘，開始了漫無盡頭的，最最原始的生產勞動。用知青自謔的話來說，就是天天修理地球。住的是用土塊（用土拌麥草，打在方格樣的木框裏，晒乾，取出即成）和樹幹草皮築成的房子，離團場遠的地方，只有用煤油燈。離開小小綠洲方圓幾十里內荒無人煙，無水也無生命。一切起居宿食，勞動工作，全部聽從一字不識，或只識幾個字的，自稱大老粗的軍人幹部。一天辛辛苦苦的勞動之後，接著晚上就是以自責方式的政治洗腦，在將一切奉獻給革命的口號下，那怕就是想一點自己私事都是資產階級思想，都是犯罪表現，就得拿到會上來自責，而當官的永遠是天生的純潔者，天生的訓導者。眼看著青春一年年毫無價值地過去了，汗水和著血水都灑在了這塊貧瘠透頂的土地上，人們

一無所得，好不容易熬了幾年才回到上海探親一次，上海社會上却將知青看成最低層者，稱呼為「新疆戶頭」、「倒霉貨」。看看當初死賴不走的同學，反倒找到了工作，雖說工作不太理想，但到底比自己神氣多了。於是兵團裏的姑娘千方百計找外邊對象，只要是在城裏當工人，西北也行，西南也行，難看點也行，老頭也行，只求藉此離開兵團這個苦海。

大批大批的知青的幻想徹底破滅了。知青們編了一首歌唱道：「天茫茫，地蒼蒼，風吹草低見不到牛羊，想爹娘，想家鄉，就是不讓我離開團場回故鄉。」

## （二）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新疆的知青也紛紛響應，起來造反。可是軍隊不同地方，有自己的法規、刑警、牢房。於是一個個抓了起來打得遍體鱗傷，送入連隊的勞改隊，手帶幾十斤鐐銬，一天五個窩窩頭（又硬又黑），還要每天打一千塊土塊，以示懲罰。

打倒四人幫之後，新上台的鄧派當權者，為了鞏固地位，一筆賬全部算到了四人幫頭上，也實行了一點讓步政策。讓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回城，於是能夠回城的知青興高采烈，而那些尚未回去的，或可能回不去的知青，就紛紛上街遊行，集體到市委、市勞動局請願了。

看到比自己遲來却先走的文革知青，那十幾萬已經受苦受了十五、六年的老知青們，當然萌發出一股強烈的回城願望。但是當局早已把大門關上，宣佈：「回城政策一概不適用文革以前上山下鄉及支邊的人員。」原因也十分簡單，文革期間上山下鄉是四人幫搞的，文革前的就不是。而文革之前一系列政策，今天重新上台的人當然有份制訂，那就不可能有錯，也就決不需改正。

既然這樣，雙方矛盾的尖銳衝突就不可避免了。早在八〇年初，阿克蘇地區就開始有上海知青起來鬧事，訴說自己的上當受騙，指責當政者的殘暴無人性，要求政府容允自己返回故鄉。可是剛開始，為首者就立即被抓走，並且不知去向，於是鬧事的情緒漫延開去。

八〇年夏，部分上海知青，跑回上海市組織示威遊行，婦女都抱上或牽著小孩，高呼上當受騙。參加了上海街市的示威隊伍，不少旁觀的老工人當場落淚。後來事情鬧大，集體在上海北火車站臥軌示威，至使津浦線停達廿小時。結果抓走三人，用鬧事為名判了三年徒刑，以殺一儆百。

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農場兵團裏出了一個「模範共青團員」叫楊彥青，她給團中央寫了一封公開信，內容大意說：她也是上海支邊青年，到邊疆後十多年來堅決跟黨走，熱愛邊疆建設。如今她丈夫復員內地城市，她本可調離邊疆，但是她願意放棄這個機會，並且爭取其丈夫同來邊疆，紮根邊疆，幹一輩子革命。最後她代表十幾萬上海支邊青年，對一小撮鬧事的知青表示憤慨，並堅決同他們鬥爭。

登時全國各地報刊雜誌、廣播電台、電視台大肆渲染，其實這是卅年來大陸當政者一貫用的手法，誰知這次很不靈，反更加劇烈地激怒了廣大上海知青。

### (三)

鬧事終於爆發了。鬧事的為首者（第一號勤務員）姓歐陽，文革前的上海高中畢業生。公開地喊出了壓抑在人們心中幾十年的呼聲：人們不能在美麗的口號下，像牛馬一樣的聽話，像機器一樣毫無慾求。人們要自由、要民主、要像一個人樣的生活下去！

振臂一呼，萬衆雲集，各團、各連隊的知青行動起來了。

鬧事的上海青年首先成立「打狗隊」，對一些背後專向領導打小報告的人進行教訓。接著成立了鬧事的領導核心小組，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出數名勤務員。跟著扣留師團連隊一些領導幹部，為他們開辦學習班。最後全體知青集中在州府阿克蘇鎮開萬人誓師大會。知青走出團場一到州府就宣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盡一切可能爭取群衆同情，決不騷擾群衆絲毫。為當地居民做好人好事，大肆宣傳他們支邊十幾年來的不幸遭遇和領導的極端官僚。

開誓師大會那天，幾位勤務員個個都將木頭棺材一口口抬在主席台跟前，以表示他們向官僚封建勢力宣戰的決心。

誓師大會上有很多群衆代表發言。一位鐵路工人在發言中說，他是新疆居民，十五、六年前，他是個小學生，參加過歡迎上海知青來邊疆參加建設的大會，到如今他都成了鐵路工人，工資七、八十元，當了二個孩子的父親，可是上海知青仍只有工資每月四十幾，不少男青年至今無法建立家庭。另一位維吾爾族代表發言說：在邊疆的許多幹部官僚透頂，只顧自己抓權，要名要利，不顧老百姓死活。口口聲聲來幫助我們建設，讓新疆的少數民族過好日子，可是經過卅年了，以前我們牛羊肉隨便吃，不吃雜糧，到如今，牛肉沒有，羊肉每月才壹斤。不要說吃白麪，有時雜糧還不夠吃。他

們欺壓了我們少數民族，也欺壓了上海支邊青年，所以今天我們支持你們起來鬧事，向當權派討還真理。

有一個知青在會上表示，當初他們完全是被欺騙到邊疆來的，十五、六年來他們已無法忍受這種牛馬似的生活。他們堅決要求當局合法讓他們歸回上海，即使是上海附近的農村當一輩子農民也行。最後，誓師大會當場成立了敢死隊，如果當權派出兵捕人，立即由敢死隊抱炸藥奔進那些拘留團場幹部的房間與人質同歸于盡。

誓師大會之後，知青們派出大批人馬到烏魯木齊市去進行宣傳、請願、要求和自治區黨委談判。在社會上廣造輿論，向黨委施加壓力。我親眼看到這些上海知青在市委、市黨委跟前靜坐示威，以及在那些廣場前都刷的許許多多大字報。

其中有張大字報寫自己到了兵團農場之後，由於不滿連隊領導的官僚，和連長發生衝突爭吵，就為了這一點小事被打成反革命，打得周身傷痕，被關入勞改隊，強迫勞動服苦役達好幾年。

令人流下同情之淚的是一位上海女青年寫的一張大字報。她當初進疆時才十八歲，由於年輕貌不揚，為一個連隊幹部看上，（他已是帶有妻室兒女的中年人），所以儘管多次百般調戲，軟硬兼施，都被她嚴正拒絕。後來分派到連隊邊緣的一個養雞場去工作，並且經常讓她夜間單獨值班。就在一天大風暴、漆黑之夜，這個幹部就深夜將她強暴了，之後還多次糾纏不休，至使她懷了孕。她忍無可忍，就跑到團部去告狀，上邊反說是她用美色去引誘幹部，是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女青年完全絕望了，去尋短見，被一位以前早已默默愛著她的一個上海青年救了，並且願意同她結成夫婦，承擔起這個孩子的父親責任。他們後來生了一個女孩子。可是結婚以後十多年来，夫婦倆一直受到這個幹部的百般刁難，度著暗無天日、擔驚受怕的生活。

不少人提出要求與楊彥青公開展開辯論，到底誰真正代表了十幾萬上海知青的心願。（她早就不在團場參加勞動，升調到烏魯木齊市的團委辦公室工作。）知青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門去，她避而不見。

最後，自治區黨委終於作出了讓步。自治區黨委書記汪峰，親自批准，發給上海知青戶糧關係、通行證，讓他們回城。並且據說當時新疆方面還派人到上海勞動局聯繫，答應這批

知青回來之後，安排在上海近郊的長興島和崇明島農場。

八〇年十一月前後，上海知青在自己團場紛紛領取戶糧關係、通行證，開始離開農場兵團，直奔上海。走前紛紛將十多年來苦心經營，靠一塊一塊木材積起來做成的一些簡陋家具拍賣掉，由於走的人多，都急著要賣給當地居民，價格很低。十幾年所積，全部賣光才正好湊足一家四口回上海的路費。於是席捲全家財產（才二、三個帆布旅行袋），傾巢而出，雖說一無所有，滿臉的風塵撲撲，但我看到他們在烏魯木齊車站時的面容，一個個都掛著微笑。

大概陸續走了百分之二、三左右，突然，一夜之間，中央軍委緊急通令下達，宣佈：新疆阿克蘇上海知青鬧事事件，為一個受社會上一小撮階級異己分子操縱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通令禁止任何知青離開團場，並命令軍隊在烏魯木齊市，及五四次列車沿途搜查，發現可疑上海知青行踪，立即押送回團場。烏市及沿途居民不

准私自窩藏知青，私藏者要究查責任。

由於考慮到當地居民和部隊對於上海知青的同情，特地從甘肅調來軍隊，直奔阿克蘇地區鎮壓。閭事青年正陶醉在「勝利」當中，一下子被打個措手不及，一個個束手被擒。一號勤務員歐陽當場被打斷了腿，逮捕入獄。於是乎一場轟轟烈烈反官僚、爭人權的知青閭事就這樣用暴力給鎮壓了下去。

（四）

即使那些少數已取得了戶糧關係、通行證給回到了上海的那批知青，上海方面也根本不予承認。居委會、里街幹部天天找上門來，知青們走頭無路，也就又一個個給歡送了回去。

好幾個月內，報紙上就天天刊登：王××、張××怎樣在里街幹部的教育和幫助下，才真正認清了自己確實上當受騙，為社會上一小撮階級敵人所煽動利用，如今迷途知返，認清革命一片大好形勢，又發出了新的「將一生貢獻給邊疆」的豪邁革命誓言，閭家欣然重返邊疆。云云。這些新聞報導，也就算這次閭事的最後尾聲了。■

## •中國人的法治觀念•

蒲公英（加拿大）



中國近世紀以來不能進步的原因很多，多人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對法治這個重要的觀念缺乏足夠的認識與重視。一般來說，在我們社會中太少人了解一個國家政治上的修明，司法上的獨立，以及整個社會的進步均與法治的建立具有息息相關的道理。「法律至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公開與公平的審判」以及其他重要法治原則如果

沒有被建立起來，那麼，當權者對國家法律的尊嚴便不會維護，人民對法律的保障也不會具有信心，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的法律就很容易變成壓迫人民的工具。政治暴力也會取代法律而成為統治者唯一有效的工具了，專制、獨裁乃至踐踏人權就是必然的後果！

中國人對法治的基本觀念究竟認識到了一種什麼程度？這是個不容易答覆的問題。不過，從下列兩個事例，我們多少可以看出整個中

國社會在這方面短缺的一班。

#### ■(+)「黨高於一切」的法制：

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過去以後，鄧小平強調法治，下令草擬中共掌權卅年以來的第一套刑法。因為多年來對法律人材栽培與訓練的忽視，以致缺乏這方面的專才，不得不借重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協助此項工作。據哈佛法律專家在此項工作中與中國法政界人士討論，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處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雖然他們對中國同僚指出「法律至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等重要原則，可是，最後在中國黨政要員的堅持下，中國共產黨仍被置於整個國家法律體系之上。由此，我們可以猜想得到：中國即使編制了一套很好的民刑法典來約束和規範人民的一切行爲，但它的約束力量及範圍將不包括，也不能觸及號稱「人民公僕」的中國共產黨。換言之，法律之前人人並不平等。

一個國家的法律經由全民代表討論而擬定後，它就代表了整個國家與人民的總意志，是至高無上的。「法律至上」這個原則在一二一五年英國簽署的「大憲章」（MAGNA C A R T A）中就已創立。在這原則下，不僅普通老百姓得服從法律，國王也同樣地要受法律的約束。可是在中國，這個原則却被中國共產黨爲了黨的私利與權益而被否認了。因此，不論中國的法典編制得怎樣齊全，它都不能克服這個致命的弱點：人民違法就得受處罰，黨做壞事却不會受到相似的處分。俗語說：「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怎能使人民心服？怎能使人民對國家法律有所尊重而又具有信心？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表現正與封建帝制中的皇帝如出一轍，都是凌駕一切法律之上。中共從共產主義理論中找出來的任何花招都遮掩不了這個封建帝皇習尚的事實。

我們知道中國的立法機構是完全由黨控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橡皮圖章」，它不可能制定任何對黨不利或不方便的條文。萬一某些法律規條在實施時，發現對黨有所不利更改起來亦是易如反掌。因此，我們不明白中共既然對國家立法機構有絕對的控制權，爲什麼還要堅持在國家法律體系中佔據超越一切的地位。

#### ■(+)苛法重疊與雙重標準：

如果司法是獨立的話，那麼，裁判法官就應該超然於起訴與被控兩方之上。這樣，審訊

才會公平，判決才會公允。否則，法官偏袒控方，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套法典來鑑定被告一方的行爲時，被告一方怎能不敗輸呢？

國民黨政府遷移台灣也有卅年了，它的穩定與繁榮衆人皆知，誰也不會同意台灣現在仍舊處於「戰亂時期」。可是，國民黨政權一直無意把「非常時期」應用的軍事戒嚴與戡亂條款撤銷。台灣因此「官定地」（O F F I C I A L L Y）一直還是在戒嚴之中，任何人犯了法，都可以由軍事法庭依戡亂條款治罪處刑。軍事法雖然苛嚴異常，但是如果只引用這一套法律，至少不會產生混淆的情況。不過，卅多年來，普通刑法與軍事法庭却又在「平行」的情形下，同時存在而被應用。這種兩套法令與審判法庭並存的現象，使人民對法令感到混淆與不安。沒有人能肯定地知道什麼行爲會犯那一種法；犯了法以後又會在那一種法庭，依據那一套來審判。同樣的行爲，可能在兩個法庭中依不同的法令而有大不相同的判決。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當權的國民黨及其官員才能知道上述諸問題的答案。這種法制賦予國民黨一種自由選擇任何一套法令的專斷特權（A R B I T R A R Y P O W E R）有了此權，假公濟私便是必然的了。與我友善者，可在普通法院受審，與我不友善者，由軍事法庭判審。兩三年前的「美麗島事件」便證實了這一點。

兩套法令，兩種法庭同時並用，對統治者來說是很大的方便，但它却失去了法治的真諦，違反了公平與正義的原則。

從上述兩件爲政治權宜而犧牲公理的事項看來，缺乏法治觀念不限於某一個地區，或某一黨派的中國人。「難兄難弟」不分彼此。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筆者相信是我們對許多外來的政治價值持懷疑與敵視的態度，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些「洋玩意」！許多人對這些「洋玩意」抱有懷疑及敵視的態度，民族尊嚴與中華文化的優越感使他們不願對這些外來的觀念去作深入的認識。某些當權者甚至認爲在中國現今的歷史階段中引進這些西洋觀念會阻礙中國的穩定與強盛。這樣可以使人民在愛國意識的推動下，接受反對建立法治；容忍極權式的政制；寬恕當權者濫權的行爲。在這種思想形態普遍地存在的時候，要求建立法治的努力會敵不過強大的反抗力量，因此，只要在我們社會中繼續有相當數量的人認爲中國現今還是處於危難之中，願意接受並且支持當權者的宣傳認爲非利用極端手法不能救國的話，法治是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怎樣才有希望在中國建立法治呢？我們應該從何處著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或許可以考慮下列幾點：

(一)促進對法治的認識：

由於無知而產生懷疑與畏懼的心理，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當權者用來反對法治的建立，因此，必須首先促進對法治的認識與研究，以各國法治的成果為實例去消除畏懼與敵視的心理，在思想與心理領域奠下有利的基礎。

(二)給中國人帶來一種新的愛國意識：

以往中國人在愛國的名義下，盲目地接受政府的濫權措施，對國共兩黨在同胞權利、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諸多蹂躪，抱著一種諒解的態度，這幾十年的經驗已經證實了這種態度使國家和人民付出了無比的代價。真正的愛國意識

是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應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它應該強調國家、政府和政黨三者間的區別。在這種新的愛國意識下去掀起一股類似以往推翻滿清，打倒軍閥，抗日等的強烈愛國力量，來促使當權者逐步地推行法治、民主和自由。

(三)強調中國已不再處於危亡之中：

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權皆已穩定和鞏固，可以拒絕接受當權者繼續對愛國熱誠的戲弄。國共兩黨許多暴虐的措施沒有繼續使用的理由與必要。現在是建設的階段，可以使用合乎人性和文明的手法去處理各種問題。呼籲國人制止中國仍然停留在專制、獨裁和無法無天的境地中。■

# 『中庸』

◆ 小楓

要麼啃白飯，  
要麼燉燕窩，  
誰知天天大鍋青菜湯。

下身喇叭褲，  
上身毛服裝，  
不土不洋多窩囊。

要不進門來，  
否則拔腿走，  
壞在商店樹前空彷徨。

不聽爵士音樂，  
就去看『海港』，  
最怕外國電影砍了一半放。

不肯當婊子，  
就去立牌坊，  
不學晴雯含冤把命喪。

愛要愛得發瘋，

恨要恨得發狂，  
誰想不理不睬悶得慌。

做官要做大，  
做賊要稱王，  
最後當個小職員吊兒郎當。

不能去竊國，  
就該去勤王，  
料不到偷個鈎兒坐牢房。

或者是沉默，  
或者是激昂，  
爲何話到嘴邊不敢講？

不是歌功頌德，  
就是小說反黨，  
落得個寫「中間人物」被上綱。

要麼人權平等，  
要麼全體殺光，  
否則不死不活還要「報上當」！

去！……去！  
去！  
去他媽的什麼亂七八糟，  
去他奶奶的什麼瞎扯荒唐！

各位同志注意，  
在下今晚什麼都沒講。  
你別看我現在，  
舉杯浪蕩。  
明天一上班嘛，  
我還是正經八兒地——  
冠冕堂皇，  
無愧於這祖祖輩輩的一——  
中庸之邦。

(原載廣州民間刊物『未來』  
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像一股春風正從中國大地的田野吹向城市。這種發紳於人心的改革浪潮終將淹沒公有制的頑固堡壘——城市的公營企業。這場已表面化的改革背後所深蘊的哲學意義是什麼呢？這是一個鮮為人注意和研究的論題。但對於早已懷疑和批判共產黨正統的理論體系，並積極創立新的理論體系的有志之士，這正是一個難得的「公理」檢驗的機會。我們無必要意氣用事地反對舊理論，也不必耿耿於懷於我們理論的出發點似曾相識於另一世界的資產階級理論的基礎。我們只是冷靜地服從事實和實踐這一最高法庭的裁決。我們願把我們理論所賴的公理和馬列主義所賴的公理，一同放在這場改革中受檢驗而決定我們的取捨。

### 一、公有制“公”理

共產黨的正統理論體系是馬列主義。馬列主義視為最終目標的是共產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一個“公”字。作為其極端形式之一的毛澤東思想更把平均視為其學說的最高原則。他為其未來理想社會描繪的藍圖——五、七公社——是平均主義的代表作。故可以說馬列主義

體系所憑藉的公理是公有化和平均主義。目前存在的社會主義集體和全民所有制是此公理的“物化”。而在形式上與之相反的政治上的權力私有化也是此公理的必然產物，並不矛盾。

馬列主義把“公”有化視為公理，自有它的理由。它的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的私有制，尤其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有它的弊病。普通勞動人民在貧困下生活。公有化和平均主義投合受苦受難的普羅大眾的生存欲望，亦投合追求盡善盡美的未入世的知識份子的幻想。這是心理學上的投合。

但是，公理的證明應不受時空限制而“放之四海而皆准”。離開了俄國和舊中國及類似的環境，在西歐、美洲和日本，公有制不能樹立，相反私有制却顯示其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它在科技、經濟和人民福利這最主要社會特徵方面比公有制有長足的進展。在時間上，當代的全民福利國家比上兩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又有極大的改善。馬列主義受到了空間和時間的否定。

這種現實和發展趨向，使馬列主義的公理失去了“哲學上”的支持。而心理學的支持也由於勞動人民嘗過了“主人翁”的滋味；受過

“共產風”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之苦；挨過文革推行“五、七指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和“割私有制尾巴”等平均主義之苦而失去了。知識份子的幻想也破滅在五七年反右和五七幹校中了。蔓延全國的三信危機是“公”型公理在心理學上的反證。

## 第二、“私”有制公理

雖然人們早已懷疑馬列主義及其公理，但由於這教義的多年傳道，大多數人似乎不敢公開降下公有制的紅旗而扯上私有制的白旗。人們仍不敢把私有的原理作為一個公理接受下來，也不敢創立以私有制為公理的新理論體系。在人們由於反覆宣傳洗腦的教育下，在潛意識中總把“公”字與道德、高尚、完善、合理、革命、進步聯繫起來，而把“私”字與爾虞我詐、道德淪落、市儈、殘忍、剝削、反動等聯繫起來。他們錯誤地把人民的“私”有與僅僅佔人類少數的地主、資本家或共產官僚的私有等同起來，却看不到在地球現存的“公”有只能是官僚以國家名義佔有的公有制。這不單是一般的民衆有着這種潛意識，就是標榜革命的不少民運份子也有以上的偏見。正在震蕩着中國的改革實踐是沖洗這些偏見的時候了。

首先要對私字和以私字為基礎的公理的涵義作一確切闡述。“私”是意味着在自然和社會的制約下，承認每一個人作為人的權利，即人權。這個人權絕不能被某些人和階層以“公”的名義去壓抑。也絕不能抹殺他們必然存在的差異去強求平均和一律化。人權體現在人的自由上（受自然和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這個生活的自由又體現在人對私有財產的權利上。以前校園內民運份子所闡述的自由往往只偏重於言論自由，而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在物質方面的自由。而只有確保個人對私有財產的權利，才可保障其他的自由——生活自由、選擇職業自由、遷徙自由、言論和思想自由等等。

民運份子的奮鬥目標，大多數的人，如魏京生所明確而公開說出的是政治民主化。但是比這一目標更深一層次的應是人權的自由。因為政治民主化所追求的應是保障人的自由，而再深一層次的則是財產的私有權。只有掌握財產私有權，在這物質的社會裡，人才能真正自由。中國農民和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下的普通人都視為常識。現時給中國農民以選舉權，他們並不感多大興趣。但實行包產到戶，他們都熱烈歡迎。給予他們個人的使用土地的權力，佔有土地的產品的權力（扣去相當以前的地租的“上繳任務”給國家，“集體提成”以養活幹部後），這對他們才是較實惠的解放。只有這樣他們才有一點自由。所以萬里副總理在十

一月五日於農業書記會議和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所說的：“農民最高興兩件事：一個是實惠，一個是自由”。單於形式的有限度的私有制兩者都給予他們了。

結論是，我們應理直氣壯地徹底掙脫以“公”型公理為基礎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的羈絆，打出“私”型公理旗幟。

## 第三、公理的檢驗

“私”有制公理的反面證明，看來不是一個邏輯推論問題，而是人們經歷的回憶和現實的感覺問題。受“公有制”指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其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是有目共睹的，毋需贅言。共產黨統治中國卅餘年，文革前，當說到一些陰暗面時，總可以“爛攤子”作遁辭。人民也樂於接受或原諒。但統治卅餘年後就無法以此藉口了，於是又有“文革浩劫”之說。彷彿四人幫，甚至毛澤東都與中國共產黨無關似的。而也竟有一些受過落實政策和平反恩澤的人患了健忘症，忘記了傷痕。受“公”有制指導最久的蘇聯社會，其農業狀況的糟糕，波蘭瀕臨崩潰的經濟等等事實都是極好的反證。

至於“私”型公理的正面證明，這等效於“公”型公理的反面證明，已在本文的第一部份有所闡述。它所列舉的只是完全以“私”型公理指導的歐美和日本社會。這是“私”型公理的直接證明，雖然直接，但畢竟這些社會遠離我們，除開留學生外，我們並未親歷其境，我們耳聞目睹的却是“私”型公理的間接證明。即“私”型公理在“公”型公理限制下的作用，也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的修正改革過程。在我國迄今發生過兩次修正或改革。即六十年代初和目前的改革。“私”型公理只要有一點發揮，其效果也是相當顯著的。上一次“私”型公理的貫徹，即在農村由公社一級所有制降為生產隊之級所有制，包產到戶，三自一包，等，結果醫治了嚴重的由大躍進引致的經濟危機。避免了經濟崩潰和結束了一次大飢荒。目前“私”型公理的貫徹，即農村包乾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私人販賣、商店、診所的允許等，也把凝滯的經濟拖離崩潰的邊緣。這是“私”型公理的正面證明。

## 第四、人性的證明

這次改革風朝着私有化方向突進，它從私有化最頑固的農村開始，吹向公有制的頑固堡壘——城市。在城市，由個體的小販和手工業者推展至商業、醫院、文藝團體直至國營企業。大鍋飯——平均主義在中國的形象說法從農村開始“爛”，經過獎金制和以稅代收而在工礦

企業部份“爛”，目前已擴展至衙門式行政機構。連官僚拖拉作風最嚴重的行政人員也要實行浮動工資制。其中有聯責記分考評辦法，浮動工資加利潤提成，技術承包責任制等多種形式。“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多篇社論論述大鍋飯。

為什麼自認革命原則性最堅決的共產黨，對其最高原則的公有制也肯作出讓步呢？為什麼以反私有制作號召起家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反而要為私有制鳴鑼開道呢？這不是一反初衷的歷史諷刺嗎？當然，我們不要冤枉共產黨人的堅定性，不要污蔑鄧小平的覺性原則，事實上這不是他們自願採取的，而是被逼的。這是一種根植於人心的深厚強大力量在起作用。它超越了這些權勢人物的意志和利益激發的力量。事實上，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今後還會謹慎和千方百計地限制私有化的“過份”發展，拼命維護公有制的基礎，因為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之果是在這棵公有制之樹上結出的。

但是，什麼因素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使掌有十億人口的國家大權的大人物被逼違心地作出反其根本利益的私有化措施呢？這種神奇的力量不但在中國顯靈，還是跨越空間的。所有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只是時間先後和程度不同地發生私有化演變，即修正主義過程。如蘇聯始於赫魯曉夫上台反斯大林之時，熾熱於勃列日列夫執政與柯西金推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南斯拉夫則早於五十年代初，六十年代末則有捷克、波蘭的激烈改革，七十年代則有匈牙利的溫和漸進改革。所有這些發生在僵硬和絕對排他性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私有化的演變，其背後是一種什麼因素呢？從哲學的廣角鏡下看，它就是人性。

以上已就“公”型公理和“私”型公理的物化——社會主義陣營與自由世界的歷史和現況的對比，以事實證明了“私”型公理的正確。但是一個理論體系僅依賴於過去和眼前的事實和現象，並不能在歷史的潮流的衝擊下屹立不倒。因為馬克思理論體系在十九世紀中葉也有其事實和現象的支持，只是被時空的變動所推倒。

在歷史的潮流中，人永遠是一個中心。公理如符合人的本性，也就能在人類歷史的潮流變遷中屹立不倒，而不會只是被一個波浪推上巔位後又陷落於無盡的深淵而消逝。所以公理的更深一層次證明就不是事實和現象羅列，而是人性的證明。

人有其動物和生物的“前史”，也受着自然的制約。人性的證明、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證明，追溯到底，便是生物學上的證明。生物學上證明生物具有遺傳和變異的兩特性。此特性的物質基礎由著名的生物學家孟德爾和摩爾根

分別假設為因子和基因。而近世的生物化學家已證明是去氧核糖核酸，其分子的立體結構已開始弄清楚。由於自然界環境的不停變化，在這種變化的作用下，生物微小的變異是經常發生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則認為自然界使各向性的變異，通過遺傳的積累，在自然選擇下，向單一方向“進化”。在這裡進化的原動力源於變異。而變異又因自然界的永恒變化。由自然界的變化，經變異和遺傳作中介，演變為生物的進化。

生物無時無刻的變異，說明了作為高等生物的人不是一個“同一”的抽象概念，而是具有千差萬異的具體的個人的總和。在這人性最底層上，“人是生而不平等的”。這是事實。而馬列主義理論的最初出發點則是“人是應該平等的”。這只是希望。由於出發點不同，故“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是追蹤兩種理論體系在最遠點上，即在源頭上的分歧。我們是依據自然和生物學上知識，有最現代生物化學知識支持，得出人是生而有差別的。他們則是在書齋中空想人是應該平等的。一個是“是”，一個是“應該”。前者的研究是作為一個探求真理的普通知識份子，後者的研究是作為一個萬能的上帝頒佈真理。兩種理論體系所依據的公理，那一個堅實地立點於大地，那一個懸浮於白雲之中，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馬克思主義由於在人性這一最深層次上一開始便錯了，所以鑄成近百年來的大錯以及人類的災難。共產黨人把千萬億人納於他們認為“應該”和“合理”的同一社會模式內而塑造之（即教育群衆，改造群衆），完全抹殺了人本來存在的差異。就像磚瓦廠燒磚瓦，鑄造廠按模鑄造機械一樣，造成了毫無生氣，千人一面，萬人一口，億人一腦的藍色的蟻群。這蟻群組成的社會必然是停滯的社會。這個抹殺人性，人民只是領袖指示被動執行者的社會自然也就沒有人權、自由和民主可言。它只能靠權力所維繫。

共產世界生產發展停滯和人民生活貧困其根本的原因是把人最活躍的特性，即變異，否定了。只有在自由的社會內，人有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權，各人的“各向性”差異，經社會的選擇（按有利於社會和各人生存的選擇方向）變成社會繁榮和進步的單一方向。這與生物的“各向性”差異在自然選擇下變成單一的生物進化的原理是一樣的。平等和共產，抹殺了差異，也就失去了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這個社會就趨向死寂。自由和私有，承認了差異，在這個不竭的原動力推動下，社會便繁榮。而在公型模式之下，滲進一點私型模式，即從中央集權到地方自主權直到工廠企業和生產隊自主權，最後到私人的自主權，這種私有化的演變方

（轉27頁）

# 關於「四個堅持」的爭論

士心（波士頓）

《爭鳴》主編溫輝先生大作《評「四大堅持」》引起中共大興伐罪之師。編者在該刊的64期把《評「四個堅持」》的文章提出來，讓持有各種不同見解的人去展開研究、探索、爭鳴。我說的這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十億中國人民命運的大事。

由此，牛虻先生大作《評「四個堅持」亦有探索之必要》（下簡稱《必要》）在《爭鳴》第65期刊出，這更引起我對這一問題的關心。

中共為何要「堅持」四項原則？別人為什麼會反對？能不能反對？反對了應不應判罪？

如果中共作為一個黨的信念或理論來「堅持」，是黨的權利，應受到國家法律的承認和保護，甚至個人「堅持」也一樣，別人不得干涉，也不存在反對別人要堅持己見的信念或理論問題。

之所以產生「反對」和「判罪」，是有直接聯繫的。原因是，中共並不是單把它們作為一個黨的信念或理論來「堅持」，而是把這個「堅持」終於塞入國家的憲法中，強迫全國人民遵守，如有違反者論罪。憲法已經執行，有人被捕、拘留、判刑。對遠離憲法權力的香港或海外，也要來個隔岸聲討「罪狀」。這就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安危與權利問題了，「反對」由此而生，能不能反對也從此而生，我主張從這方面去探索與研究。

但是也有人不是從這方面去探索、研究。而是孤立地對「四項原作學術性的探索、研究」「應不應」「堅持」的問題。這種「探索」和「研究」的本身，就值得探索與研究了。

溫輝先生的《評「四個堅持」》（下簡稱《評文》），是「隔岸犯法」，所以才有「罪狀」，還不致於拘捕判刑。如果中共不是把「四項原則」塞入憲法中，在憲法的「言論自由」的保護下，誰都可以提出「堅持」什麼信念與理論，但誰也可以反對什麼信念與理論。溫輝先生無論在「隔岸」與「岸裏」提出反對的或探索的意見，就不存在「罪狀」了。所以，之所以存在這個問題，就說明中國大陸沒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一切問題從此而生。

「四項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堅持黨的領導」。

第一、「社會主義」是一種思想信仰，是一種理論。同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信念和理論。信念和理論，不論正確與否，不論好壞與否；也不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在遵守基本人權的原則下，絕對不能把那一種信念和理論強迫該國人民去信奉與執行。這是反理性的。是超出常理、違反人道、是野蠻的表現。

第二、「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種學說，是馬恩列的學說，學說也是理論。信仰、信念、理論、學說、都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意識形態的東西，不論正確與否，好壞與否，同樣不能強迫別人接受和信奉執行的。否則也是野蠻的表現。

第三、「黨的領導」。黨是社會的一個政治組織，也是國家裏的一個政治集團。這個集團能否領導國家，行使國家權力，不是由這個政治集團自己來決定。因為國家是全國人民的事，應該根據全國人民的利益與要求，來決定那一個政黨適合領導這個國家。這是由該國人民選舉來決定的。不管這個政黨自認為「正確」與否。都無權強迫國家與人民接受他的領導。否則還要人民代表大會和選舉幹什麼？中共提出「黨的領導」，還把「黨的領導」塞入國家的憲法中的目的是什麼呢？也就是宣佈：無論我是好是壞，我要永遠領導中國。也就等於取消了人民代表大會和選舉了。大家想一想是否合情理？

由此可知，中共的「四項原則」，並非提出來叫黨員遵守與信奉，或執行黨內的決議。而是超出黨外強迫全國人民信仰與執行，否則就治罪。試想，黨員犯了黨章最大也不過開除黨籍的處分。可是中國人民被強迫接受遵守「黨章」的某些原則，反而變成了犯了國家的大法，給以重刑。難怪中國人民堅決反對！

由此可見，中共並非作為學術探討向黨外人士提出來研究研究那樣輕鬆的事。而是十分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們也就不能那麼「輕鬆」的去「探索」和「研究」了。

誰也清楚，中共獨攬國家大權的程度是大得驚人的。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在座衆議

君，誰能、誰敢不唯命是從？中共也知道，人大的戲不是做給中國大陸的人民看的，很多人民早就不會相信這些戲。是演給外國人看的。急於把它塞入憲法中去，那是因為看到三信危機的發展，對內對外都憂患，心中虛弱起來，為了保住這個執政黨的權力，明知「非法」也要「狗急跳牆」了。反正老子權力最大，普天之下，誰敢反抗？

歸根結底，對四個「堅持」的爭論，今後還會是海內外中國人民的爭論焦點，我們不得不引起嚴重的注意。■

一個記者

「中國之春」編輯部：

從香港親戚帶回來的八三年第一期的「爭鳴」上，獲悉「中國之春」在北美創刊。中國民主運動的海外化，與目前國內民刊的地下化一樣，同是官僚特權階級對民主運動的高壓政策的必然反應。我感到興奮。你們拋棄異國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或回國的特權生活而投身充滿危險的民主運動，我們國內民運戰士也不惧公安局的手銬而秘密地堅持民主運動，而官僚特權階級堅持的專制制度却要依賴國家機器的專政和思想的禁制。

在這寒冬季節，從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傳來了驚雷，你們可以想像仍生活在專制的冰封下的人們會感到多麼的振奮。在專制的冰封重壓

下，大地似乎窒息了，生命似乎凝固了，我不否認自己有時也有短暫的脆弱心理，因為十五年民運歷程的挫折，環境加於心靈的負荷太重了。但驚蟄之雷，又使近於冬眠的生命催生，我願以傷痕累累的身心，與你們一道再作生命的新冲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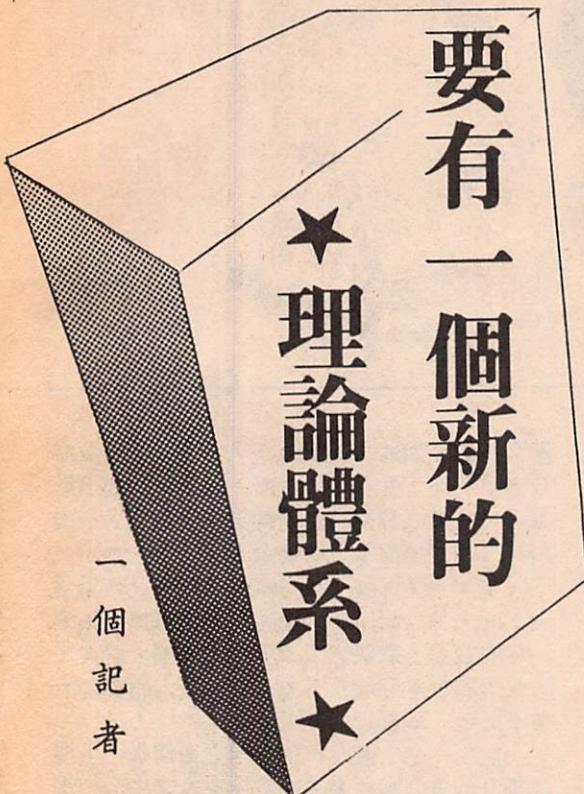
我與炳章同志一樣文革爆發時在校的大學生，與大多數第二代的民運戰士一樣，也有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投入社會的出發點，但我所學的專業——數學使我保持最低限度的邏輯推理能力，而沒有捲入破四舊的兒戲，武鬥的狂熱和派性的無謂糾纏，我借串連之便曾遊歷和考察過祖國各地實況，曾以理性分析支持過劉少奇的路線和宣揚過以唯生產力論為中心的早期馬克思主義，並極欣賞蘇聯和東歐的修正主義改革，這是在當時封閉環境下一個中國青年思維所能達到的極限，為此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以後的經歷自然是農村、幹校、監獄、平反、民刊……。對外開放後，西方民主思潮的湧入，使我的思維軌跡又有了另外一個拐點而提升。蘇聯、東歐和南斯拉夫的改革與西方資本主義自身改革相比又相形見拙，馬克思主義也不見得是我唯一的思想出發點了。思想的原動力汲取了多元化的精神養料。清除了排他性的狹隘觀念。

十多年的民運的經驗，使我深感中國革命需要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通過群衆性大字報所揭露的陰暗面已使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陷於危機，十年後揭批四人幫的第二次大揭陰暗面更使共產主義理論體系瀕臨破產。如果說文革初期還是少數知識份子意識到這一點，那麼經過十年文革後的三信危機則顯示了全民性的共同意識。這說明歷來作為人類思想前導的知識份子的失職！也說明創立新理論體系的刻不容緩和我們知識份子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新理論體系應該與中國近代革命理論的純政治性有所區別。不但具有政治性，還應具有經濟性和人性。人性在激進共產主義理論家眼下是資產階級的和可以忽略不計的，經濟性是市儈的庸俗表現。其實經濟性和人性最關係到民生。而我們唯一的職責是服務於人民。

新理論體系的思想源泉應是多元化的兼蓄並收而加以揚棄。她必然要冲破馬列主義的小天地和四項原則的圍牆，而新理論體系的源泉則是中國的實情和人民的願望和利益。

中國人歷史因襲的包袱是最沉重的，難道我們注定要在權貴劃下的框框內鬥來鬥去嗎？難道我們不能衝出小天地去開創屬於我們這一



# 我們寄希望於今日的覺醒



「中國之春」的「告海內外同胞書」中寫得何其好啊！它極為簡潔地歸納總結了祖國大陸的現狀，指出各類危機的存在。說明了「祖國積重難返的困境」。我們完全同意「告海內外同胞書」的觀點和見解。它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鄧胡體制的虛偽和虛弱性；認清了祖國「國運」之可憂！危機深重之可悲！一切對新當權者的幻想和希望都徹底破滅了，我們只有寄希望於明天。

我們說寄希望於明天，首先，要寄希望於今天的覺醒和努力。

鄧、胡體制既然無法解決國內外錯綜複雜的矛盾和政治經濟問題，又不得不對軍中的“極左勢力”、對葉老帥的保守頑固、對「四人幫」的餘孽抱姑息、妥協的態度。已年近歲暮的葉、鄧、李……等人既不肯讓出自己手中的權柄，又妄圖用「三年整黨」的清洗運動整肅異己，鞏固自己的統治。官僚特權階級內部的權力爭奪，看來是永無停息之日！

放眼世界，曾被吹捧為「歐洲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變成了罵大街的「潑婦」！霍查「同志」罵中共和當年蘇共的赫魯曉夫叛徒集團一樣，指斥停止一切援助、合作是「背信棄義」。「海內知己」成了冤家。這種反目相向，得不償失的事，發生在越南、老撾，發生在非洲的坦、贊……等國；今天趙紫

陽又把成億元的貸款無償送人，而不顧國內財政赤字的巨大和人民的貧困。數百億元的援助甚至流血犧牲換得的不是友誼而是仇恨。一場對越「自衛反擊戰」將會遺恨幾代人！

當年玩美國牌，對付蘇修，如今又玩蘇聯牌，謀求新的出路……總之，當權者以小集團一時的喜怒，來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置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於不顧；造成巨大的混亂，種下更多、更嚴重的危機。

想到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之命運被一小撮當權者的貪婪和狂妄，玩弄於股掌之中……那難言的悲哀更激發了我們的覺醒和責任！中華大地，神州萬里！這是全體中國人的中國，不是個別政黨或統治集團的私人之物！一旦新的權貴去世，「寶座」之爭又會導致新的爭鬥！國家又會大亂；政策又會大變，人民又會遭受大難……滿目瘡痍的祖國大陸還能經受得了多少次這樣的折騰和浩劫呢？！

我們身處亂世，但絕不是「亂」世之人！我們奮起高舉民運的大旗與海內外的同志們共同奮鬥，正是為了結束祖國大陸的苦難，讓人民有權選出真正忠於祖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世之能臣」來加速社會變革。

「四·五」運動戰士委員會  
「小草」編輯部 1983.2.

代的新生活嗎？當代民運的教訓使我們覺得有必要把民運作一理性的升華，升華的結晶物便是新的理論體系。我覺得你們的行動正是朝這一方向努力。作為投身民運十幾年的老戰士，我也願為此獻出自己的一點微力，如貴刊不嫌

，本人願就中國近代歷史的評價和現實分析。未來社會的發展籃圖，經濟原則和人性原則在新理論中的地位諸問題提供拙作。

一九八三年二月於廣州

## 「梁山」和「南山」

◆ 台灣 陳永峰

「中國之春」首席發言人王炳章博士，宣稱「要再造一座現代梁山」；此一新聞曾見諸國內民營大報，並引起高級知識份子們的注意。

用傳統眼光看，「梁山」代表「造反」；而造反乃武夫之事，讀書人如果造反，八成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中國讀書人，亦即所謂「知識份子」，在壯志難酬的情勢下，多半學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於是，「南山」在後世讀書人的心目中，象徵着「歸隱」或「遁世」。

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變遷，農業社會型態尚未全部消逝，而工業社會又未完全形成，因此，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無法充分建立。再加上近百年來，西方文明的刺激，以及西方文化的衝擊，中國人，尤其高級知識份子，因嚮往與憂懼西方文明，以致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造成「思想沒歸位，價值無座標」的局面。

「文化是文明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參閱拙著：「人性的探索」一〇二頁）中國人有中國人「自己一套」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假如它已全部不適用，則中國早就作了列強的附庸。筆者個人謬見以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必須與中國文化相「融合」（*integration*）；換言之，應適合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基於此一觀點，所以我一直堅決反對「全盤西化派」。但願中國之春的編輯們，不要步上一些「香蕉學人」的後塵。他們皮是「黃」的，心却是「白」的；衡量中國文化，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全用西方（尤其美國）的標準。

當然，中國文化的「毛病」是不少的，誠如中國之春宣言中所指出的「專制、獨裁、官僚」。這種看法，既符合孟子所揭示的「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尤其孫中山先生「棄醫從政（命）」的原旨，不謀而合。這也正是筆者支持民運的基因。王炳章與我都出身醫界，自比一般人更能體會出孫逸仙醫生當年「改行」，醫人醫國的意識型態。所不同的，我個人是「棄醫從哲（學）」，王君則是「棄醫從（民）運」。他的辦法比較快，我的方法比較慢，起碼要再等一世紀，後世始能理解我的「恒穩」思想。恒穩（*homeostasis*）是生理解剖學中的術語，用之於經濟，可稱之為「經濟恒穩論」（*Economic Homeostasis*）。（參閱「人性的探索」二二〇頁）實言之任何哲學、思想、制度、尚不能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便無法使社會恒穩。社會秩序不穩，或穩的時間不長（恒），那麼，即令把刀架在人民的脖子上，依舊不能使他們「安份守己」口服心服。何況先哲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之春的編輯們要再造梁山，顯然是被「逼急」了。鄧小平是留法學生，當知民主與自由皆源自法蘭西。法國大哲伏爾泰有名言：「你講的話，我一句也不贊同，但我仍要拼命維護你講話的權利。」我認為，「北京之春」的編輯魏京生等，應該放掉。諺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主、自由乃世界潮流所趨，中山先生曾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先生推翻滿清，應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終點；把「秀才」逼成「草莽英雄」，那是十分不智的。

下面附「臨江仙」乙闋，請轉給王炳章博士，他可將此詞，「印證」一下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觀點。

「何處覓桃源，暫把身安。狂風暴雨浪連天。船到中流行不得，民命堪憐。廻首兩千年，代代奪權。書生無用若寒蟬。安得萬鍤翻凍土，再造梁山。」■

# 大陸的知識份子能抬頭嗎

二樹人

知識份子是社會的中堅，也是推動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動力。一個社會如果忽視這一層意義，甚至鄙棄知識，打擊知識份子，那麼，無論如何也是難以進步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多年，迄今仍然不能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這與中共長期歧視、迫害知識份子實在有很大的關係。而大陸知識份子始終與中共存在着對立，也完全是由於中共不斷的摧殘與壓制所造成的。

近年來，中共領導階層看到「四個現代化」沒有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從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出發，一方面把過去種種迫害知識份子的罪責歸之於「四人幫」身上，一方面強調「四化」要以科技為關鍵，教育為基礎，要把知識份子列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九七八年三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就宣稱：「無論拿經濟地位，服務對象和世界觀等方面來看，現有的二千五百萬知識份子，絕大多數理所當然的是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份」。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中，也說到要清除長期存在、而在「文革」期間特別嚴重的那種歧視知識份子的錯誤觀念；認為「沒有文化和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又確定「政治上高度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適當照顧」作為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主要內容。目的也就在製造重視知識份子的空氣，進而爭取知識份子，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四化」建設中發揮作用。

我們說：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不在說的多麼動聽，而在實際上做了多少，兌現多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我們即以此一標準來審視一下中共過去所說所做的情況，以及當前知識份子實際的處境，就能做出一客觀的結論。

毛澤東以知識份子為敵

毛澤東一向鄙薄知識份子，早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著作中就曾說：知識份

子「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份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份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要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一九四二年毛發動延安整風時，更直指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就形成中共初期對知識份子採取「團結、教育、改造」重點在「改造」的政策，認為知識份子有「積極、進步、革命」可資利用的一面，同時又有「消極、落後、反動」的一面，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是更強調後者。

儘管中共基本上並不信任知識份子，但為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物質技術力量，知道光靠「大老粗」和「土幹部」是不成的。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開關於知識份子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長篇報告，決定改善對知識份子的使用和安排，給以信任和支持，改善知識份子的工作條件和待遇，藉能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份子的力量。會議提出的三項措施是：

(1)改善對知識份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其專長，克服有的地方還存在着的「用非所學」的情形。

(2)給知識份子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同時對黨外知識份子除了給予信任外，還需要給予應得的支持。讓他們有職有權，尊重他們的意見，重視他們的業務研究和工作成果。

(3)給知識份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保證他們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業務上。適當地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調整他們的工資，改善他們的政治待遇。

但是，這些冠冕堂皇的言辭，不過是毛澤東放下了手中的大棒，揮舞了一下胡蘿蔔而已，而這種胡蘿蔔的揮舞也只是曇花一現。知識份子的政治、工作、生活地位非但未得到改善，反而在次年毛澤東所設計的「大鳴大放」的

「陽謀」中，遭到了幾乎是滅頂之災。當時知識份子基於不能浪滅的良知，紛紛站出來要求中共開放政權，實行民主；要求改變知識領域「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要求解除思想上的專制，和給予知識份子以學術自由。結果却上了毛澤東「讓那些牛鬼蛇神烏龜王八蛋都出來」的大當，而在「反右派鬭爭」中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有幾十萬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絕大部份「右派」都被下放到農村去進行勞動改造（如章伯鈞、羅隆基、丁玲、艾青）；更有許多人被關進牢獄（如葛佩琦、林希翎），甚至被迫害至死（如林昭）。

到了文革期間，毛澤東聲言要批倒批臭學術界的「權威」，和摧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一統天下」，知識份子遂又成為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於是，被批鬥、遊街、下放、勞改，或被迫害至死的不計其數。可以說完全把知識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他們真是永世也難以翻身了。

這些情況，一如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所說：「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為什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事實上，如果不取消八億個大腦，特別是許多知識份子的大腦，毛澤東那顆被神化得近乎荒唐的大腦，又怎麼能夠突出來呢？

#### 「四人幫」後的知識份子政策

雷聲大 雨點稀

「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共在宣傳上雖然不斷支持知識份子，並經常要求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但是實際情形如何，我們不妨根據《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的報導，來做一個摘要的回顧。

從政治方面來說，一年多前，《人民日報》曾發表北京市知識份子現狀的調查，其中指出「有些部門和單位的領導對知識份子仍然抱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偏見，總認為他們政治上不大可靠，思想上問題很多，不把他們當做自己人」。又說：「有些單位的領導對知識份子總是百般挑剔，知識份子提點意見，就說他們『翹尾巴』。說話說多了就說他們『誇誇其談』；話說少了，又說他們『陰』。至於不注意照



顧知識份子，不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更是極普遍的現象。」北京市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情況尚且如此，外地就更可想而知。由此可見，知識份子尚未得到「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從工作方面來說，中共報紙承認有些部門和單位仍然存在輕視知識和打擊知識份子的現象，知識份子的勞動成果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尊重。特別是「有的領導幹部長期以“大老粗”自居，在科學問題或專業管理知識上，自己不懂，又不去請教專家，亂作決定，搞瞎指揮」。「這些“大老粗”以沒有知識為榮，對有知識的人看不起。有的人私心作怪，深怕依靠知識份子使自己失去高人一頭的優越感，自己的“長官意志”遭到損害，因而排斥知識份子」。由此可見，知識份子尚未得到「工作上的放手使用」。

從生活方面來說，據一九八二年上半年中共派出調查組到大陸各地調查知識份子實況的匯報指出，知識份子有四個問題，極為突出，一是工資過低，不足以養家活口，連保持最低生活水平也有困難；二是居住條件差，住房擁擠，要安放一張普通辦公桌都無能為力；三是健康情況普遍不良；四是缺乏進修機會，一般都靠過去學生時代的一點「老本」吃飯。六月間，《光明日報》也刊出一名幹部的來信，說「由於住房擁擠，在知識份子的宿舍裏，常常出現兒子和老子“搶地盤”，妻子同丈夫“爭板櫈”的現象，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生活條件如此的低下，顯示知識份子在生活上尚未得到「適當照顧」。

一直到現在，中共各級政工幹部仍然習慣於把知識份子看成是缺乏思想覺悟、缺乏勞動

觀點、脫離政治、不知進步，驕傲自大和喜歡「翹尾巴」的一群。因此說知識份子「只能作為團結的對象，不能作為依靠的力量」。在此根深蒂固的歧視之下，知識份子要想抬頭，實在也難。

### 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再來一次反復？

中共過去的表現，全沒有客觀的是非標準。毛澤東在世時，喜歡使用簡單的兩分法去判斷思想觀點的階級屬性，并以其個人之好惡做為是非之標準。所謂：金口玉牙，說啥是啥。從發動「反右派鬭爭」到文化大革命，無不出於毛個人的偏執狂，使知識份子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并造成了「知識無用論」以及「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等種種謬論的甚囂上。

一方面，中共的政策反覆無常，對待知識份子始終不脫「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的老手法，例如一年多前中共大張旗鼓圍攻軍中作家白樺，批他的電影劇本「苦戀」不但反對

毛澤東思想，而且否定愛國主義，違背「四項原則」，拒絕黨的領導。

另外就是一大批官僚階層的特權思想作祟，他們為了保有既得利益，是決不願意知識份子真正站起來的，那樣將會導致他們的權力的削弱甚或喪失，因此他們始終抱着一種排斥，抵制，甚至仇視知識份子的心態。中共的高層領導能否約束住這部份特權階層的興風作浪，將決定着現行知識份子政策的成敗。

從歷史上看，中共每逢其極「左」政策失靈，和政治上經濟上遭受挫折之際，常常會倡言實行比較寬容的知識份子政策。一九五六年周恩來的「知識份子問題報告」，和一九六二年初陳毅在廣州知識份子會議上的講話，就都是這樣的例子。但後來的情況表明，這只是中共的一種權宜之計。知識份子每次的信以為真和抱有幻想，所換來的都是愚弄和懲罰。

今天中共重新從地上撿起來的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再來一次反覆，知識份子是否真個能抬頭，對歷史保有記憶的人們，對此是不能不存有幾分疑慮的。■

1983. 3. 13

### 憂國是 鄭保羅 作詞

一年復去又秋風，葉凋零，  
風吹落葉萬馬鳴，風嘯萬馬鳴，國是積心中。  
心平氣和論國是，智理清，客觀正，  
攜手合作建中華，人民福，國家幸，  
奈何雙方框框打不通，志士憂國痛。

作者——關微宏



# 社會主義各國計劃經濟的比較

(續第二期)

## 結語

從我們的簡扼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到，除了毛澤東模式之外（這一模式的建立完全是一種歷史倒退），其他四個經濟模式都有其一定的長處。不言而喻，這四個模式的產生與發展取決於這些國家具體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國際條件的綜合。在這些條件下，這些模式也起過或者還在起着某種積極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四個模式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或「歷史地位」。但是，「凡是現存合理的一切，隨着時間的流逝，都會變成不合理」（黑格爾）。這種歷史的不合理性至少在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更為重要的是，歷史的合理性（當然是暫時的）遠遠不足以說明這些模式的性質。換言之，這種歷史的合理性遠遠不足以說明這些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

這裡，我們尚且不提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上述幾種模式的分析，評價，而只是依據「古典的」（不是「官方的」或「御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來簡要地評論一下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注一）

### 第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在「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裡，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的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率是劃分和區別不同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基本標準

。這是「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對「古典的」馬克思來說，比資本主義更發達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應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最重要標準。唯此，才談得上歷史的進步與發展。唯此，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任何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都應該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更迅速，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其經濟上的浪費也應更小；生產力的各要素也應被更有效地利用；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也應該更迅速。其結果，人民的普遍生活水平也應該更高。這樣，才談得上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與高度發展的生產力之間的一致性。

但是，在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沒有一個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國家達到上述幾點中的任何一點。恰恰相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落後于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次，雖然斯大林模式能保持一個高于西方國家的投資率（以犧牲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為前提），其投資效率都遠遠低于西方國家。第三，在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永遠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點。其結果，農業、輕工業、運輸業、商業和服務業一直處于半萎縮狀態之中，造成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不平衡。這是這些國家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甚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由於沒有競爭和沒有市場機制的壓力，企業

缺乏研究、吸收、運用和推廣新技術、新工藝的動力。其結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在世界市場上也缺乏競爭能力。

產生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的官僚特權階級為了維護其特權利益和制度，視真正的企業自治為洪水猛獸，拒絕導入機制，頑固地堅持高度中央集權的指令性計劃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要實現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

### 第二，工人是否仍在受剝削

「古典的」馬克思們反覆強調要廢除剝削關係。他們從來不認為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直接等於生產資料的人民所有。恰恰相反，他們十分重視分析國家的性質及其與人民的關係（如果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的話）而且強調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決定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與西方國家相比，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的收入兩極分化要嚴重得多。（即一方面一小撮國家官僚享有幾乎是無限制的特權，另一方面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一直很低，甚至處於飢餓狀態之中）。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古典的」馬克思們曾經認為在生產資料社會化革命後，經過較短的過渡時期，要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使國家消亡。作為從人民中異化出來的權力機關的國家，作為擁有官僚機構、警察、監獄等其他鎮壓機關的國家應逐步消亡，讓位給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共同體。這個希望，馬克思是在這樣一段話中表示的，即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產品的分配當然也要花費不是用於直接生產中的一般的行政費用。但是，「與現在的社會相比較，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個部分將是極少的。而且將以與新社會的發展的同一程度減少下去」。

但在東方集團，馬克思的這個希望根本沒有實現。國家機構非但沒有像希望那樣逐步縮小直至消亡，相反，却在逐年變大。黨的機構也在變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黨的統治地位。在這些國家，官僚機構膨脹的規模比西方國家更大。不言而喻，這個龐大的國家機構是靠社會剩餘產品來維持的。人民不但不能控制和判斷這個國家機構，相反，却完全被這個機構所統治和鎮壓。因此，為了這個目的而被利用的社會剩餘產品是與工人們的利益毫不相干的。由此，必須認爲，（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對勞動者的剝削依然存在。

由於官僚體制的保密措施，我們無法獲得確切的統計資料，因而也無法確切地算出這種剩餘價值量。但是，反對官僚體制的經濟學家們仍然對此作了研究。其結果，發現這種剩餘產品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剩餘價值更大。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經濟學家奧塔·希在他的《第三條道路》中，已經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的剩餘價值率要比法國、奧地利和挪威更高。希克的結論是，(1)東方國家的積累率比西方國家高，但由于技術發展落後、官僚體制浪費大、經濟效率低、比例始終失調等原因，生產發展反而落後於西方國家。(2)東方國家犧牲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却負擔着龐大的、低效率的、壓迫的國家機構。(3)在東方國家，由於沒有自由、民主地進行討論的可能性，只有官僚才能決定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剩餘產品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由官僚們獲得和處理剩餘產品的過程就是一個剝削過程。被馬克思主義的古典派所批判過的資本主義剝削只是由國家官僚的剝削取代了一—這決不意味着勞動的社會主義解放！

### 第三，人的異化。

對「古典的」馬克思們來說，克服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人的異化，是一個與廢除剝削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並且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的判斷標準之一。但是，這一點在斯大林體制和蘇聯體制內却毫無踪影。不言而喻，人的異化是有各種形式和階段的。必須認爲，依靠革命的社會變革來一舉克服人的異化的觀點是不現實的。從另一方面看，這也就是異化現象能否完全排除的問題。但是，對社會主義社會而言，這一最基本的要求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哲學問題，而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現實問題！完全排除因分工的發展而產生的勞動上的異化現象，恐怕在今天的發展階段上是困難的。這是因為人們的基本欲望還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裡，連飢餓也不能被克服。因此，要廢除分工、克服異化，只能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其結果，其結果，只能是飢餓狀況更進一步嚴重。但是，即使在這個領域裡，也能進行某些試驗和嘗試在獨立的勞動集體內部，國家應該支持、發展、推廣以擴大所謂職務擴大、職務充實為目的的勞動交換制。

但是，在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不存在這種試驗。因為在那裡，並不是人把他的勞動當作樂趣的問題，而是勞動者在官僚的統治和壓力下必須完成計劃的問題。其原因首先在於

官僚體制本身根本不重視人，人的利益和人的發展。其次，在西方國家，人們還多少抱有對消費的幻想，但在東方國家，連這種幻想也被壓抑了。因為官僚們自己要拼命追求其物質享受，因為對官僚體制來說，追求物質幸福的人民也是危險的。

當然，人民中的憤怒和有組織的反抗也在變得激烈。這種狀況潛伏於人民的各階層中。冷漠和憤怒、鑽進自己狹小的世界和進行抵抗，絕望和反抗，這種兩極關係作為人民各階層的分裂傾向不僅都存在，而且都是在不斷變化的關係。今天是對一切都漠不關心，把自己的全部興趣都投入菜園的人，明天會因為一點真正打開希望之窗的新聞而成為社會變革的鬥士。因為不僅不支持而且強烈反對官僚體制的人太多，人民只要給以一個極小的機會就會成為一個積極的體制反對者。波蘭「團結工會」的鬭爭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但是，因為鎮壓和迫害在各方面都加強了，能積極地進行政治抵抗的人只是一部分。懂得這個體制對反體制派或反對派實行壓制政策，有政治抵抗的決心並想進一步組織起來的人，必須是道義上有極大勇氣的人。

#### 四、國家壟斷體制包含的矛盾。

一個不能以比現代化資本主義體制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發展生產力的體制；因而，一個不能保證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的體制；一個不能廢除剝削制度，而只是將其變形的體制；一個歸根結底比迄今為止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更嚴重地使人異化的體制，決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體制。

蘇聯的國家壟斷體制的權力掌握在官僚們手中。這個官僚制度是因歷史的特殊條件而發展起來的政治體制。官僚們從人們中異化出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對國外，都以強化自身權力、地位為主要目的。這個體制用一切方法來加強情報工作，建立嚴密檢查，審查一切出版物的制度，力圖壟斷教育，控制科學，藝術，並且進一步利用國家組織來宣傳教條主義，和極權主義，極為罕見地將輿論導入錯誤的方向。官僚們在經濟上的權力是因為國家壟斷一切生產資料和產品而產生的。國家機關完全由黨的官僚所壟斷，所操縱。

根據上述事實，如果用「古典的」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劃分的理論作個結論的話，M·德熱拉斯把黨的官僚規定為一個新階級和A·

卡里略以生產資料掌握在官僚們手中而認為蘇聯有一個壟斷一切的新的特權階級的觀點是對的。E·蒙代爾認為，因為即使打倒蘇聯的官僚體制，維護真正的社會主義體制，也不會出現和目前不同的生產方法，所以蘇聯的官僚不是一個階級。但是，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它實際上是說這個體制還是社會主義體制，只不過暴露了一點官僚體制的弱點而已。E·蒙代爾還認為俄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因而，革命後是應該沒有階級的。這種觀點的產生，是因為他根本不理解蘇聯的現狀。第一，在歷史上有過這種統治階級，它作為以前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階級是不存在了，但却在新的社會體制中存在着。第二，即使歷史上沒有先例，也不能否認這種事實，即官僚們在空前地壟斷地控制和管理着生產資料，生產過程和產品分配，並且暴力地排除人民對此提出異議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變革體制的可能性。以人民鬭爭的手段從這個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實現體制的民主化及政治、經濟等一切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經濟上應該是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或共同所有，——才能夠不僅結束這個特殊的階級的統治、並結束一切形式的官僚體制的統治。這才是最終解決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弊病和建立真正民主的和多元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必要前提。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這樣做過，現在波蘭人民正在這樣做。將來，我國人民也一定會這樣做！在此，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模式進行討論，有二個原因。第一，近二、三年來，我國許多「官方」經濟學家們都在津津樂道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的經濟政策的正確性，稱之為「建國以來的黃金時期」。但是，很少有人指出這一時期的基本經濟政策、戰略以至整個體制（也許農業中有所不同）是全盤照抄斯大林體制的。第二，如果將中國目前的經濟調整戰略（農業政策與外貿政策除外）與蘇聯政府在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失敗之後所採取的經濟戰略作一個比較的話，人們是不難發現其中的許多共同之處的。為《中報》寫稿的路楊先生不知為什麼想方設法地極力否認這一點（見《中報》83年1月17日第二版）。但是，他却忘記，他的大作（與大多數中國「官方」經濟學家們論及中國當前經濟調整戰略的文章一樣）所提及的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是與蘇共二十三和二十四大所談的蘇聯當時的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是雷同的。（續完）■

# 芝加哥中國民主化座談會

·良友·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和中華人權協會芝加哥分會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在美國芝加哥市聯合舉辦了「中國民主化問題」座談會。座談會由中華人權協會理事、伊里諾州理工學院電機系主任、著名小說家張系國教授主持，到會的聽眾達三百多人。

座談會的主要發言人有：

李歐梵：芝加哥大學遠東系教授，海外研究魯迅的著名專家。

林孝信：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主席。

丘廷亮：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台灣留學生。

王炳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言人，大陸留學生。

汪岷：中國之春雜誌主編，大陸留學生。

張鶴飛：中國大陸西北工業大學七系副教授，中國大陸政府派往伊里諾理工學院的公費訪問學者。

周曉青：鄱陽發動機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大陸派往伊里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公費訪問學者，即將返國。

座談會分四個專題進行討論，先由各主要發言人就四項專題進行專題發言，然後自由發問和討論。四個專題是：1 民主的涵意；2 對中國大陸人民民主專政之剖析；3 民主化與四個現代化之關係和4 對台灣民主化進程之分析。

李歐梵教授認為，民主不僅是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目的。民主要保障人的自由。中國之春發言人王炳章博士表示同意李歐梵教授的觀點。他說，民主應包括下述幾方面的內容：第一，權力屬於人民；第二，在政治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權與自由；第三，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人的意志能夠表達並行使。但是，少數人，甚至個人的意志也能表達並受到尊重。第四，一方面，民主是手段，在於調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民主也是目的。人類追求民主，就是追求人性的解放和尊嚴；第五，民主

的實施須以法治予以保障，不能用人治、黨治或「專政」來保障。

在討論民主化與四個現代化的關係時，中國之春主編汪岷說，不能先搞四化，後搞民主。要搞好經濟，就要提倡民主，讓大家出主意、提意見。人們提意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主義和體制問題。例如，可能有人提出學習蘇聯方法，有人提出學習台灣方法等。一提就越了「線」，出了「軌」，就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對付，誰還敢提？在國內不允許討論。今天這種討論會，能在北京舉行嗎？中國之春只好在海外以公開方式搞。

即將返國的中國公費訪問學者張鶴飛教授和周曉青研究員等在討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問題時，強調指出：1 民主有階級性；2 民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3 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只有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才能談得上人民享有民主。他們提出的兩個觀點特別引人注意，第一，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後，消滅了剝削，給實施民主真正創造了條件；第二，美國也是個專政國家，美國的軍隊、警察即是行使專政的，只不過沒有公開承認而已。只有中國共產黨敢公開表露自己的觀點。汪岷當即提出異議說，美國不是專制國家，美國的軍隊是不干政的。

會後，不少聽眾議論道，怎麼能講美國是個專政國家呢？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個聽衆更有趣，他說，如果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大陸於光天化日之下攻擊中共政府，恐怕要遇到麻煩。今天的會上，大陸訪問學者公然宣傳美國是專政的國家，這種宣傳實際上有攻擊之嫌，然而，大陸訪問學者並不會遇到麻煩。這就是美國民主政體下的言論自由。他們是否能夠體會到這兩個國家的區別呢？

王炳章列舉中共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和最近逮捕民運人士的事實後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黨內一派人鎮壓異己的工具，是壓制人民不同意見的工具。由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已普遍引起人們的反感，最近中國共產黨改提人民民主專政。但是，連黨的權威理論家都不能解釋改成了這種提法的

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

張鶴飛教授等指出，中國共產黨過去確實犯過錯誤，這已由「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結論，無須糾纏過去。現在中國已在實行民主，搞民主運動是想把國家搞亂。張系國教授發問道：「你們提到中國已在實行民主，那究竟在民主化上做了些什麼？如何一步一步地實施？」張鶴飛教授等無言以對，迴避了這一問題。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主席林孝信先生從「二、二八」事件談到「美麗島」事件。他說，台灣民主化近年有所發展，是人民不斷爭取得的。林孝信認為，民主受社會經濟的影響。他有一句名言是，民主要大家來。

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丘延亮回顧了民主概念的歷史發展。他指出，有人認為民主是西方的產物，在中國根本尚未發展，這是不正確的。也有人認為從民國以來，共和本身就是對民主的保障，這完全是限制在狹隘的政治民主特別是政體方面。目前所說的民主都太重形式。很少涉及實質，民主也不能只看政治上的民主，

還要看經濟及生產領域過程的民主，故它的實質比形式重要。

李歐梵教授強調法治與民主的關係。他提出中國有數千年的封建包袱，民主的實行需要一段時間。但統治者不能以此為藉口，要為中國人民想一想，加速民主化的進程。

自由討論時，討論會氣氛十分熱烈。發問者爭先恐後。座談會從下午二點半一直持續到五點半，聽衆及講演者均興致勃勃。在會上，丘延亮先生和王炳章博士呼籲海峽兩岸當政者在民主化方面來一個競賽，比賽放人，不要比賽抓人。呼籲雙方釋放政治犯。

會議主席張系國教授最後總結。他說，中國問題很複雜，解決問題要破與立。「立」的工作是艱巨的、是寂寞的，沒有掌聲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這次座談會，持各種意見的人士能坐在一起，各抒己見，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正像汪岷先生所希望的，如果這種暢所欲言座談會能在中國大陸舉行，那就標誌著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有相當的進步了。■

## 大使館應對中國之春策略之改變

金林森

開始的驚慌失措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之春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中國之春雜誌在海外創刊，一群留學生將發起一場新的民主運動。

記者會後，中國之春發言人王炳章及中國之春工作人員先後數次打電話給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希望他們向中國政府轉達如下要求：①要求中國之春雜誌能在國內註冊、登記、出版和發行；②要求釋放魏京生、王希哲與被捕民運人士；③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吊銷參與中國之春活動的中國留學生的護照；④一旦中國政府允許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發行，並釋放一切被捕的民運人士，中國之春人員將返回國內。⑤中國之春願與中國政府代表隨時舉行談判。希望中國政府能給予答覆。一開始，中國駐加拿大使館人員互相推托，不敢接中國之春電話。最後由有關負責人勉強接了電話，但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打了數次電話後，中國駐加使館均說未接

到北京政府的「指示」。以後中國之春再打電話時，中國駐加使館一聽說是中國之春，便將電話掛掉，不再接聽。

指令中國留學生不參加中國之春的講演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同學會舉辦講演會，邀請王炳章講演《我為什麼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講演會中途休息時，王炳章在休息室巧遇到一位大陸公費留學生，問他為什麼不去參加會議。他說：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正式通知了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准參加講演會。可是，在會場裏，的確也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座。這幾位留學生是被授與「特權」，去進行「監視」呢？還是置領事館的指示於不顧呢？或是根本沒有聽到這一指示呢？真是難以找到答案。王炳章先生也是中國公費留學生，而且在記者會上公布了聯絡電話，他就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 駐 加 大 使 親 自 出 馬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下旬，中國駐加拿大渥太華大使館大概從最初的震撼中鎮靜下來了吧？王棟大使親自出馬，指揮對中國之春的攻擊。大使館派幾個小組，分赴蒙特利爾、多倫多等地。王棟大使親率其中一個小組出動。他們召集了各地中國留學生的緊急會議，做了如下統一口徑的指示：①中國之春是背叛祖國的行動；②中國之春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干擾四個現代化；③中國之春是台灣特務泡制出來的。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領事接到大使館的指示，馬上進行傳達。一位參加會議、聽取傳達的留學生說：他為王棟大使捏了一把汗，怕他因此事受到處分。其實，中國之春的出現與王棟大使是不大相干的，該留學生真正擔心的是，王大使說中國之春是台灣特務泡制的，不知是否有確實證據。如果是中央發出的「口徑」，問題還不算太大。如果北京並無此「指示」，大使下了這個結論，北京必會向他索取證據。那時，大使交不了差，又該怎麼辦呢？做中國的外交官實在太難了。

兩份內容一樣，屬名不同的「嚴正聲明」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言人王炳章和中國之春雜誌執行編輯黃立赴美國南部重鎮休斯敦進行講演。二月四日上午，在休斯敦的中國公費留學生接到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的通知，讓他們參加在休斯敦大學的講演會，與王炳章進行「辯論」。但在晚上，又被告知不許參加了，搞得大家無所適從。

五日下午的講演會前，領事館派人在會場散發了一份「嚴正聲明」，指責王炳章「赤裸裸的叛國」，屬名為「休斯敦中國留美學人」。簽署日期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衆所周知，「嚴正聲明」是文化大革命時群衆組織慣用的字眼，沒有想到，這種「嚴正聲明」竟然在美國找到了用場。

無獨有偶。二月七日晚在德州大學城農工大學，中國之春舉行講演時，會場上也散發了一份「嚴正聲明」，內容與二月五日在休斯敦大學散發的一字不差。區別之處僅有三點：一是署名為「德州農工大學中國留美學人」；二是簽署日期為「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三是抄寫字跡改變了。二份聲明內容相同，同是領事館派人散發。其中奧妙，不辨自明。

二月七日晚的講演會上，聽眾席中坐有廿幾位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不時向

王炳章進行發問。細一察看，原來，一位身着中國式西裝的休斯敦領事館負責留學生事務的官員就坐在中國訪問學者人群當中。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王炳章與黃立在美國首都喬治華盛頓大學講演時，中國駐美大使館文教處處長亦在聽眾席中。終於，官方從幕後走到幕前了。

## 匹茲堡的怪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六日，王炳章與中國之春雜誌主編汪岷赴美國工業都市匹茲堡進行宣講活動。講演會前，發生了幾件咄咄怪事。

其一，主持中國之春匹茲堡聯絡站的中國留學生為了配合這講演活動，在匹茲堡大學張貼了很多宣傳布告，可是，貼在匹茲堡大學主樓的宣傳布告一經貼出，很快就被撕掉，以致不得不重新張貼數次。

儘管如此，出席講演會的人數仍達二百多人，擠滿了整個教室。須知整個匹茲堡市不過九千華人，這麼多華人參加座談會，在匹茲堡市還是首次，可見僑胞和留學生對中國前途之關心。

其二，三月廿五日，三位中國大陸服裝的訪問學者一齊到一家中國雜貨店「東亞食品店」「買東西」。該雜貨店之所以引人注意，除了該市中國店較少之外，主要原因是它代售中國之春雜誌（匹茲堡無中文書店）。三位學者在店裏逛了半天，繞了好幾圈，既沒買什麼東西，也沒有說什麼，大概是無人願出第一口吧。臨走時，想想實在交不了差，一位領頭的才向店老板威脅道：「請你們不要賣中國之春雜誌，否則，我們將叫所有中國留學生不到你們店買東西。」

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禁止民刑的法律，竟然越境影響到出版自由的美國來了，你說怪不怪？中國之春雜誌已在該店出售了很久，為何偏偏在中國之春人員赴匹茲堡的前夕發生這種怪事呢？另外，又是誰指使他們做的呢？這只好在將來有人寫回憶錄時將謎底揭穿了。

## 洛杉磯的巧遇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中國之春洛杉磯聯絡站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同學會聯合舉辦《中國之春講演會》。會前二天，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人員就趕到洛杉磯策劃應對措施。

領事館首先讓中國公費留學生們寫一個類

## 嚴正聲明

一、原中國派赴加拿大留學生王炳章是由人民以血汗哺育成人的，自中學到大學一直享受人民助學金，“文革”期間畢業，打倒“四人幫”後不久又由政府公費資助出國留學。祖國和人民對王炳章的恩情不可謂不重，對王炳章的期望不可謂不大。王在留學獲博士之後，至今不但未能無毫報效國家和人民，反而叛絕四國，在海外肆意攻擊養育他的政府和人民，採取恣意誹謗、顛倒是非的卑劣手法，把十億同胞千辛萬苦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事業說得一團漆黑，全然抹煞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在工業生產、科學、教育和國防建設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圖討好反動勢力，賣身投靠。這種赤裸裸的叛國行為實為一切正義有識之士所不齒。古人云：無信不立，無義自斃。就是這樣一個毫無信義和人格之徒，

竟然還在大談什麼民主、自由的空話；他所要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叛國的自由。就是這樣一個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偽君子，竟然還在不知廉耻地高唱什麼法制和人權的贊歌；他所爭的人權，質實上，就是踐踏別人的權利。不知人間還有羞耻事；王炳章自從聲明叛國至今，時不過兩月餘，在北美東西兩岸，已是名聲狼藉，渾身真面自己完全暴露。老實說，今天的所謂座談會是欺騙不了任何人的。王炳章自絕於祖國和親人之後，又被人利用，充當了反對十億人民實現未來的前鋒。但是，我們還是奉勸王炳章放明白些，你被別人利用的價值是很有限的。看看蔣家小朝廷豢養的那些所謂“反共義士”的下場吧！<sup>2.</sup>

二、我們堅決和廣大海外僑胞、來自大陸和台灣省的中國留美學人一道，為振興中華、實現偉大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宏圖，為十億炎黃子孫的前途和幸福而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堅決擁護我國政府的正確政策。我們對偉大祖國的未來完全充滿信心。

休斯頓中國留美學人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 「休斯頓中國留美學人」的「嚴正聲明」

簽署日期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 嚴正聲明

一、原中國派赴加拿大留學生王炳章是由人民以血汗哺育成人的，自中學到大學一直享受人民助學金，“文革”期間畢業，打倒“四人幫”後不久又由政府公費資助出國留學。祖國和人民對王炳章的恩情不可謂不重，對王炳章的期望不可謂不大。王在留學獲博士之後，至今不但未報效國家和人民，反而叛離四國，在海外肆意攻擊養育他的政府和人民，採取恣意誹謗、顛倒是非的卑劣手法，把十億同胞千辛萬苦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事業說得一團漆黑，全然抹煞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在工業生產、科學、教育和國防建設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圖討好反動勢力，賣身投靠。這種赤裸裸的叛國行為實為一切正義有識之士所不齒。古人云：無信不立，無義自斃。就是這樣一個毫無信義和人格之徒，

竟然還在大談什麼民主、自由的空話；他所要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叛國的自由、重擔的自由、出爾反爾的自由。他所爭取的人權，質實上，就是濫用別人的權利。不知人間還有羞耻事；王炳章自從聲明叛國至今，時不過兩月餘，在北美東西兩岸，已是名聲狼藉，渾身真面目已完全暴露。老實說，今天的座談會是欺騙不了任何人的。王炳章自絕於祖國和親人之後，又被人利用，充當了反對十億人民實現未來的前鋒。但是，我們還是奉勸王炳章放明白些，你被別人利用的價值是很有限的。看看蔣家小朝廷豢養的那些所謂“反共義士”的下場吧！

二、王炳章的審諭是與中國當今的事實不符的，王炳章於國家此極短時間是堅決反對的。我們堅決和廣大海外僑胞、來自大陸和台灣的中國留美學人一道，為振興中華、實現偉大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宏圖，為十億炎黃子孫的前途和幸福而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堅決擁護我國政府的正確政策，我們對偉大祖國的未來完全充滿信心。

德州農工大學中國留美學人  
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

內容相同的「德州農工大學中國留美學人」  
「嚴正聲明」日期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六日 在匹茲堡大學  
左：汪岷 中：王炳章

似於休斯敦式的《嚴正聲明》。據說，草擬這份聲明時，還發生了分歧。不少人不同意《聲明》附帶對王炳章進行人身攻擊的材料，以免引起廣大聽眾的反感。不知為什麼，《聲明》在十日會場散發時，還是把人生攻擊的材料附上了。

十日下午講演會，有四百多人參加。無巧不成書，領事館派去坐陣的人員正好坐在一位中國之春成員的旁邊。兩人閒談時，領事館官員聽說坐在旁邊的人是從北京來的，便自報身分地說：「我是領事館的，以後有事可以找我。」我們這位中國之春成員亦不示弱，嚴肅指出領事館不應派人擾亂會場。一下子把領事館人員嚇呆了，鬧了半天，沒想到中國之春就在身旁。

順便提一下，中國派往洛杉磯分校的公費生達一百多名，領事館認識的為數不多，平時也不知怎麼關心大家。留學生們當然對頂頭上司也是敬而遠之。象安排對付中國之春這種保密性很強的事，也不是全部留學生都有幸參與會議的。

那天，由於領事館臨場坐陣。講演會確實不夠順利。一兩位「積極份子」在講演中途大聲喧嘩，致使講演中頓。最後，不得不由校警出面穩住場面。幾位公費訪問學者還「憤然

離場」，以示「立場堅定」。當時，中國之春王炳章走下講台，和朋友們一起請「憤然離場」的同志回來參加討論，有話好說，不必動火。妙就妙在領事館的人員也親自出馬，勸解中國學者的歸場。道理很明白，大家都走了，任務完不成。自由發言時，誰和中國之春辯論呢？怎麼能看着中國之春「放毒」而不「消毒」呢？這種拋頭露面的事，領事館官員沒有留學生那麼「方便」。幸好，大部分同志都回來了，自由討論時，氣氛還是和諧的。

#### 結語

顯然，中國使館已改變了初期對中國之春的迴避策略，採取了正面交鋒的戰法。這無疑是一大進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加強相互了解，有助於雙方民主精神的培養。然而，僅這種背後的小動作是遠遠不夠的。大使館應再向北京政府請示，要他們答應中國之春開始時的要求，派出代表與中國之春正式對話和談判，公開的不好意思，先從秘密開始嘛。中共與台灣國民黨還搞統戰，為什麼不與持獨立立場的中國之春搞統戰呢？中國之春手無寸鐵，身無分文，擁有幾百萬大軍的共產黨怕什麼？■

# 他為什麼要申請政治避難

(續第二期)

——木木(加拿大)

長途汽車在渥太華——蒙特利爾的高速公路上飛馳著，把一片片夜幕籠罩的楓樹林拋在後面。車上，坐滿了人，大多數旅客歪歪扭扭地半躺在座椅上，閉著眼，有的還打著鼾。車子最後一排，坐著一個特殊的人，他前傾著身子，頭下垂著，深深地埋在兩個乾瘦的手掌裏，弱小的軀體形成一個問號「？」隨著車子無意地左右搖擺著。他，就是從中國大使館懵懵懂懂地走出來，返回蒙特利爾的許先生。

許先生雙手抱著頭，極力想忘記剛才發生的一切。有時，他甚至用雙手抓起頭髮，恨不得一下子將自己拔離這個世界。可是，他的耳朵始終拋不開大使館胡參贊那句有意無意、然而又是重若千鈞的話：「老許啊！誰叫你是個右派份子呢？國內要你馬上回去，還不是因為這個老問題嘛！」

「右派，右派，老問題，老問題，老問題……」這幾個字，鑄成了一個攬拌機，不停地攬著他的腦漿，使他的思緒越來越亂。

「老許啊！你的問題徹底解決了。雖然五七年反右大方向是正確的，使你被錯劃為右派。這次，黨主動給你徹底平了反。聽明白了嗎？這是徹底平反，不是半截子平反。今後，你的檔案上沒有任何歷史問題了。」這是一九七八年，學校的系黨總支書記在給許先生平反的前一天晚上親口對他講的一番「知心話」。

「老許啊！從此你的歷史永遠清白了。不要像以前那樣，總是死氣沉沉的，被右派的包袱壓著。要甩掉它，輕裝上陣嘛。五七年反右還是必要的，但是搞擴大化了。你就是被擴大的一個。現在把範圍再縮小，把搞錯的糾正過來，就好了嘛。黨目前動員一切力量搞四化建設，需要你們這些知識份子。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這次出國考試，為的是發現人材，培養人材。黨委根據陝西省委和輕工業部的指示，說服你去參加出國考試。你外文有基礎，業務也不錯，應該站出來讓黨挑選。不要有顧慮，黨委決定動員你去參加出國考試，就是樹個樣版，讓全校知識份子都看看，連你這樣過去的右派份子，黨都是信任的。好好準備準備，別辜負了黨的希望。」這是一九七八年七月

學院黨委書記在動員許先生參加出國考試的個

別談話中，代表上級傳達的精神。許先生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院黨委傳達教育部關於出國考試的文件時，他自己只是聽聽熱鬧而已，出國的事，似乎和他無關。廿年來的經驗告訴他，找到他頭上的，不是檢討，就是批鬥，從來沒什麼好運。像參加出國考試這類光彩的事，他有什麼權利問津呢？可是，不知道老天爺開了什麼恩，自己的右派問題平反沒有幾多時日，竟由院黨委書記親自出面談話，動員自己報名，還在群衆中做疏通工作。「也許好運輪到我們這些倒霉人的頭上了，也不妨去碰碰。」他這樣想道。但他從來沒把這些想法告訴任何人。在黨委一再勸說和教研組的鼓勵下，最後他填了出國考試報名表。

「老許啊！恭喜恭喜。考上出國不容易，可謂百裏挑一，要珍惜這個機會。輕工業部所管的幾個學校和研究所，總共只考取幾名。你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我們的黨現在明確要把工作重點移到建設方面來，這是我們黨英明的決策。黨雖然也出現過林彪、四人幫這樣的敗類，但整個黨是偉大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例如，拿反右鬥爭來說，五七年黨有能力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鞏固了政權。今天，黨也有魄力糾正五七年擴大化的錯誤，把你這樣受冤枉的好同志解放出來，並動員你參加出國考試，最後審查通過，批准你的出國。世界上哪有一個政黨能像我們黨這樣光明磊落地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呢？你的情況，我們已上報教育部，並準備非正式地傳達給部屬機關單位。我們相信，你的典型材料，會感動大批知識份子，會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次你參加出國前外語培訓，是學校黨委和部黨組完全同意的。集訓期間，暫時脫離了集體，但要和原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多聯繫，有事多請示。」上面這段指示，是一九七九年元月輕工業部負責外事的領導對許先生作出的。許先生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有生以來自己單獨會見的最高級首長。當時，許先生真有點受寵若驚。他不但通過了公費出國考試，得到了黨委的批准，而且，在出國外文集訓前，還榮幸地受到了部領導的接見和鼓勵。

「老許啊！你已被批准為第一批赴加訪問

學者，這次出發的卅多位學者，都是根據七九年六月中、加兩國政府教育代表團的協議，加拿大方面安排的。你被安排在蒙特利爾大學，該大學為法語學校，語言方面可能會遇到某些困難。但據說指導教師是國際有名的權威。到了加拿大後，大使館會安排好一切，大家分組政治學習，好知道國內的形勢發展。你在這批訪問學者中，是唯一的五七年右派份子。教育部黨組和留管司對你都很重視，專門研究過輕工業部送來的材料。可以說，你的出國，是黨的政策的勝利，是黨不咎既往的具體體現。出國後，除積極參加留學生小組的政治學習外，還要向外國朋友宣傳我國的大好形勢，宣傳我們黨、我們國家新的政策，尤其是知識份子政策。但你沒有必要向外國朋友講你是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別人要問五七年反右鬥爭的話，就說大方向是正確的，但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現在，打錯了的同志都平反了。這是小平同志和中央定的調子，領導同志讓我轉達你，就按這個調子講。總之，到了外國，一切都變了，要慎重，注意檢點。二年後你回國我們再談，也可能在你出國進修期間，我會到加拿大看望你們。」這一席諄諄告誡，是一九七九年底出國前，教育部留管司的一位同志對許先生的臨別贈言。

車子，飛馳電掣地向前行駛著，前面，一片燈火通明。皇家山上的十字架，已隱約可見。蒙特利爾市就要到了。乘客們紛紛向外瞭望，不時互相交談幾句，讚賞著蒙市的夜景。若是平常，許先生肯定會和大家一樣，著迷於窗外的景色。可是今天，他始終搭拉著腦袋，儘量排除著「右派」和「老問題」的干擾，想理出一個頭緒來。他追憶著出國前後的經過，追憶著每位首長的諄諄教導。他忽然意識到，自從自己降臨到這個世界，就一直被動地讓一種力量驅使著。尤其成了「右派」之後，完全失去了自我，被時代的「囚車」拖拉著，一會兒拉向南，一會兒拉向北，一會兒拖到陝西，一會兒又被拖回到北京。最後，被人驅使到國外。在這一時代的囚車上，有時他被揪出來示衆；有時又被打扮成穿上華麗衣服的模特兒，用以兜售某種貨物。無論如何，他始終看不到時代囚車的司機，也從來無權過問自己會被帶到什麼地方。因為，在世人眼裏（有時連他自己也認為），他始終是一個囚犯，他無權決定自己的一切。他的權力只有一個，那就是規規矩矩的服從。

來到海外，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餘，他偶然也偷閒單獨到聖·凱瑟琳的鬧市區，逛一逛。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偶有一種自由人的感

覺。「我在這裏，誰能發現我呢？大使館管得了那麼多嗎？」可是，當他意識到，晚上可能有人會打電話找他，有人會常常向使館匯報留學生的情況時，他就會不自主地立即返回自己的住處。每次回到屋裏，他總是深深感到，自己雖然已成為放出去的風箏，但風箏的線仍然控制在人家手裏。他，始終覺得被一隻無形的魔爪控制著。

車子即將進入市區，許先生的思緒也漸漸理出了一個頭緒。「右派——老問題」的攬機把出國前後一系列首長的講話融匯在一起，最後又經過加工處理，首長講話的精髓終於抽出來了——「五七年反右鬥爭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這是每位首長強調的共同點。一想起五七年，他不自主地痙攣了一下。從那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批鬥會，一次又一次的檢查過關……疊又疊的檢討紙，還是說他不老實。最後主持批鬥的人都疲倦了，允許他暫時過關，還讓他感謝黨，說這是黨挽救了他……。

進入市區，長途汽車突然在十字路口被紅燈截住了。他一楞，抬頭向外張望了一下，下意識地摸了摸身邊的手提包。「是蒙特利爾嗎？」他想道：「我又胡思亂想了，汽車拉我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把我重新拉到監獄，我才大夢初醒，那就完了。我一輩子沒有掌握過汽車的方向盤，更確切一點說，沒掌握過自己人生道路的方向盤……。」他暗暗下了決心：「我要第一次決定我要走的道路，我要從今天開始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我要結束任人隨意擺佈的命運……。」

下了長途汽車，已是夜裏八點鐘了，他立即叫了一輛出租汽車。「蒙特利爾大學，有急事，要快！」

出租汽車飛快地駛向蒙特利爾大學，這是許先生出國後第一次坐出租汽車。平時去大使館，獲得批准後，須乘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往返，出租汽車費是不予報銷的。凡辦個人的事情，更捨不得多花一分錢。他省吃儉用，攢下了一小筆錢，買了一架收錄兩用機和一個小照像機，最大的一筆開支，是前些日子通過使館訂購的十八吋日立彩色電視。總之，該買的，他都買了，他做好了一切回國的準備。如果今天胡參贊不向他無意透露真情的話，如果剛才在長途汽車不下定最後決心的話，他肯定會繼續節省每一個銅板，爭取多買一些洋貨帶回去。可是，他現在什麼也顧不上了，他知道，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將會決定他的前途，「快一點，我有急事！」他不停地催促著出租汽車司機。

一進宿舍，他立即拿起電話機，直撥到他的指導教授家裏。「克里吉安教授，我處境危

險，請火速來車接我……」。

×            ×            ×

大使館的晚餐是一流的。兩個現炒大菜和幾個小菜，配有花捲、米飯，使館的人每天二圓，吃得舒舒服服。

今天的晚餐沒什麼特殊，只是花捲換成了饅頭。胡參贊盛了菜，撿了兩個饅頭，坐到了程處長的對面。

「老程，剛才你送老許回蒙特利爾，他又跟你說了些什麼？」

「我剛回來坐在這裏。老許臨走時什麼也沒說，只是神情有些異常，握手告別時覺得他手有些發抖。」

「神情異常？」胡參贊停止了咀嚼，急切地問道。

「他前幾次和我告別時，總是苦苦地說個不停，希望組織信任他、體諒他。今天，他和我告別時，眼睛直直地盯了我半天，想說什麼，可又什麼也說不出來。」程處長漫不經心地回答完了，往嘴裏扒了一口米飯。

「噢？」胡參贊憑著多年的外事工作經驗，覺察到事情有些不大對勁。「老程，我覺得你有點大意，既然發現老許神情異常，為何不早點匯報，商量對策呢？」

「老胡，你是說老許可能……，不像吧，他早就訂購了電視機了。」老程嘴裏否定，心裏却發慌了，萬一事情發生，吃不了可要兜著走。老程立即補充了一句「吃完了飯，我們碰個頭吧。」

還是胡參贊外事工作經驗多。在緊急碰頭會上，胡參贊反復強調採取預防性措施的必要，並責成程處長立即動手。程處長看了看錶，時間已近晚八點。開車再追是來不及了，他馬上打了個長途給蒙特利爾大學的留學生組組長，誰知，撥了半天，對方無人答話。老程又撥了蒙特利爾市麥吉爾大學留學生組組長的電話，亦無人接聽。顯然，多數人吃完飯，去實驗室或圖書館忙業務去了。

「怎麼辦，老胡？」程處長請示道。

「此事不宜驚動一般群衆，而且，僅是採取預防性措施而已。我們現在也拿不準，只是往最壞處打算。依我的意思，迅速通知蒙市兩個黨員，把基本精神告訴他們，讓他們把老許接到某個黨員的家裏，反正飛機票已經買好了，過不了幾天就完成任務了。」胡參贊說完猛吸了一口牡丹煙。

程處長遵旨又撥起了電話，好不容易找到兩位黨員。不巧的是，他們離得較遠。老程讓他們一塊租個車，快一些趕到許先生的住處。並且指示他們，事情辦妥後，回個電話給使館。電話打完，胡參贊鬆了口氣，叨著香煙打撲

克去了。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的電話急促地響了，程處長拿起電話，只聽見對方結結巴巴的說道：「他…他…他失蹤了……」，老程頓時覺得頭轟轟作響，額頭上的冷汗也冒了出來……。「唉！真讓老胡算中了。當初為什麼不把他扣在大使館？……」

×            ×            ×

索利爾是一座美麗的小城，距蒙特利爾大約一個小時的汽車路程。蒙特利爾很多法語居民將別墅選建在這裏。

在一個向陽的小山坡上，有一座灰白色的小樓房。山坡上滿是楓樹，山脚下一溪流水。別墅建在這樣的環境裏，可謂再合適不過了。一輛小汽車由蒙特利爾市的方向駛來，經過楓林間的小路，最後停在這座灰白色的小閣樓前。

克里吉安教授下車走到別墅門前，按了一下門鈴。門剛一打開，教授就爽朗地笑著對開門的人說：「許先生，兩星期前，你就是這幢房子的主人了，我這個客人每週拜訪兩次。怎麼樣，一切都習慣了嗎？」

「還可以，就是寂寞些。」不會開玩笑的許先生小聲地回答。

他倆來到客廳。許先生將事先燒好的咖啡端到指導教授面前。

教授左手端起咖啡，右手順便從手提包裏抽出幾個紙袋。「這裏面有我們魁北省幾個教授聯名寫的信件，已送交省政府和聯邦政府的移民局。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我又和律師見了面。他告訴我，根據你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遭受批鬥和強迫勞改的情況，根據你文革中的遭遇，你在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的理由是充分的。案子正在順利進行之中。律師告訴我，唯一的一點複雜問題是，中國大使館已正式照會加拿大政府，說根據兩國政府關於中國派遣留學人員的協議，中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學成後，不准留在加拿大尋求職業。因此，中國大使館要求加方將你遣返。」

「什麼？」聽到這裏，許先生有些緊張。

教授喝了口咖啡，鎮靜地說：「沒什麼，根據人道主義精神，加拿大政府是絕對不會遣返你的。加拿大皇家騎警不是已對你實行保護了嗎？兩國政府的協議是指不得尋求職業，你是尋求人身的安全，尋求政治庇護，這完全是兩碼事。你是中國政府派出公費留學者中，要求政治庇護的第二人。律師告訴我，第一位很快就會獲得批准。我們一批教授已聯名寫了信，支持你的合理要求，因為，我最清楚你的情況，中國大使館停止你的研究生學業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還想換一個人來替代你接受獎學

金，我帶研究生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從來沒聽說有這樣的事情。沒有合法的理由中斷你的學業，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在我們這樣一個講究人權，尊重人權的國度裏，這類事情最不能令人容忍。許先生，你放心好了，有我們的支持，有加拿大移民法的保障，你的問題一定會得到圓滿解決。」

「聽說，這裏請律師，要花很多錢。」許先生仍是不安地問道。

「放心吧，許先生，這點錢我們幾位教授是出得起的。來，我們吃點東西填填肚子。」克里吉安教授說話是那樣的輕鬆，一切問題在這位數學權威手裏，就好像小學生的算術題一樣，不費吹灰之力似的。

吃過了晚飯，許先生告訴教授，他在這僻靜的鄉下實在有些寂寞，除了看看電視，聽聽音樂，看看業務書之外，難以打發時光。教授臨走時告訴他，不久就把他接到教研組去，做些研究工作，並把初步擬訂的研究課題告訴了他。

×            ×            ×

同樣也是一個週末，在蒙特利爾市哈撤森街的一間公寓裏，公費留學生們被召集起來，聽取留學生管理處程處長傳達教育部留學生會議精神。在講述留學生中存在的問題時，程處長激動地說：「大家可能都聽說了，我們到加拿大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也出了一、兩個叛國的敗類。問題的發生與出國審查不嚴有關。以後，要加強對出國人員的審查。有些人來到西方，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很大，今後，也要加強對留學人員的思想教育工作。至於那一、兩個要求留在西方，申請庇護的人，是絕對達不到目的的。我們已通過外交途徑，向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要求把人交給中國政府。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弄回去，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弄回去。」當時，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擠滿了屋子，聽了程處長慷慨激昂的陳詞，無一人吭聲……。

×            ×            ×

幾個月後的某一天，許先生在蒙特利爾市一條街上碰到筆者。在一間咖啡館坐定後，筆者詢問了一下許先生的近況。他滿目淒涼地向我訴說：「現在我已跟著教授做正常的研究工作。我很少跟中國人交往，我不願連累任何人，我只想默默渡過我的餘生。」

「將來呢？前途呢？」我關心地問他。

「前途？」許先生苦笑了一下。「四十五歲的人了，還有什麼前途。十幾歲上大學時，

還充滿了幻想，打成右派後廿多年的遭遇告訴我，我是沒有個人前途的人。我唯一所求的，是不再受任何的批鬥，我要安靜地、默默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還可以唸完博士學位，西方還是允許個人發展的。」我啟發他。

許先生吸了口氣說：「唸完了博士又有何用。聽說最好的職業是當中學數學教師。這二年魁北克教育不景氣，中學紛紛關門，教師失業很多。即使有了工作，咱們英文不好，法文又不會，還能輪到你的份兒？看看這裏的唐人街，看看這裏的中國人，多數人還不是做三等公民，混口飯吃。我說過了，我也不想有什麼發展，只求不要虐待我就行了，可能外國人會從心理上歧視我，但他們表面上還是尊重我的，只這一點，我就夠了。」

「您人生的路還很長，可以考慮建立個家庭嘛。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同情地向他說。

「家庭？」許先生又苦笑了一下。「自從成了右派那一天起，女孩子就和我絕了緣。你想想，誰肯和一個右派份子接近呢？再說，我也不想坑害任何一個女孩子。廿多年的獨身生活過慣了，如今是向五十奔的人了，也沒有心思考慮那些，我需要的是平靜。」

我好奇地問他：「許先生，你申請留在加拿大後，台灣方面有沒有爭取你。」

「他們沒有直接找過我，但間接地試探過。我斷然拒絕了。我剛才一再強調，我只謀求平靜地渡過我的一生。」他喝了一口涼茶，又感慨地向我說：「我來這裏兩年多了，又經過了這幾個月的特殊時間。我從內心感到，我們中國人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人家給你辦居留，帶有一種恩賜感，我真不想吃這種『嗟來之食』，可又不願回去挨自己的同胞『整』。先跟著教授混口飯吃。等將來國家真正的安定了，不追究我們這些老右派，不追究我們這些『叛國者』，我就回去。」

我們分手了。他低著頭，朝自己的臨時住處走去。我望著他瘦小的身體消失在高大魁梧的外國人群中，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

「是誰把這樣一個老實人打成右派，剝奪了他一生的黃金時代呢？」

「是誰出的好主意，把這樣一個『右派』派到國外留學呢？」

「是誰又獨斷專行，強令他中斷學習，中途回國呢？」

「是誰把他逼到做『三等公民』的道路上來呢？」

一連串的問號使我迷惘了。（續完）

CHINA SPRING

TABLE OF CONTENTS

Vol. 1 No. 3, May, 1983

EDITORIAL

Togather, let us sketch the future of China.

DOMESTIC COMMUNICATION

An abstract of Deng Xiao-Ping's speech of the enlarged session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ome comments on the February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stories of t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Chinese Army.

A Selection OF RECENT UNOFFICIAL PUBLICATIONS

"CUNLEI" (Spring Thunder), a journal published by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joins in the democracy struggle.  
-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Introducing "YECAO" (Wild Grass), a new underground publication in China.....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Some words before saying good-by..Reprinted from CUNLEI

What has our embassy done?.....Reprinted from CUNLEI

We entrust in today's awakening...Reprinted from XIAOCDAO

New Year's Message.....Reprinted from YECAO

A case of superstition in the IngDe County of Guangdong.  
-Reprinted from YECAO

The Fly and the Tiger.....a review of Zao Ziyang's talk concerning the clean up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s at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printed from YECAO

Reflections on the growing practice of gambling.

-Reprinted from YECAO

"Domestic shame should not be made to public".....after thoughts on the arrest of Dai Zhen.

-Reprinted from YECAO

"No 300 taels of silver buried here".....a review of the recent speech given by Wang Shao Hwa, the deputy minister of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CCP.

-Reprinted from YECAO

### SPECIAL REPORTS

An account of a successful students strike at Dalian, 1980  
-Zhangming-

The riot of Shanghai school leavers in Xinjiang.  
-Zhao Ming-

A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Systems of various "Socialist" countries(Part 2).  
-Guan Weihong-

### ISSUES

Press independence is one aspect of political democracy.  
-Oscar Chiang, U.S.

### PUBLIC FORUM

Rule by Law, Chinese Style....Dandelion, Manitoba, Canada.

Is private ownership wrong?....Gu Shan, Guangzhou, China.

Controversies over the "Four Insistances".

-Shi Xin, Boston, U.S.-

"Liangshan" and "Nanshan".....Chen Yongzheng, Taiwan

Can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Be awarded recognition?

-Shu Ren, Chicago, U.S.-

### COMMUNICATIONS

Democratizing of China, A panel discussion held in Chicago April, 1983.....Liang You

"Solemn Declaration".....The Chinese Embassy employs new dispostion in dealing with "China Spring". -Jin Linsen

LETTER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rom Paris, Shanghai, Guan-zhou and U.S. presenting criticisms,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 LITERATURE

Why did he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Part 2)....MuMu

## 名譽編輯簡介（三）

★ 鄭玉林

溫州民辦刊物「吶喊」的負責人。

在 1980 年初，他組織了一次上訪，爭取房屋的權利。同年九月十五日在南下途中，為公安人員拘捕，使他不能參加籌備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會議，被拘禁一個月左右才獲釋放。此次再被拘捕，顯然與上訪有關。

★ 鍾粵秋

23 歲，出身幹部家庭，係韶關廣東冶煉廠的硫酸車間工人。

在 1978 年她參加了民主運動。1979 年在其工廠創辦民刊「庶聲」，並於 80 年創辦另一份民刊「北江」，宣傳民主、反對官僚主義。

去年底，工人推薦她候選韶關人民代表，她貼出了自己的競選宣言，提出要為工人解決卅多個生活難題。為此該廠領導立即召開選委會議，私定六名候選人，剝奪鍾粵秋的競選權利。她在去年 8 月赴穗，與其他三位華南地區的民刊負責人商討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於 8 月 31 日被廣州公安局逮捕。

★ 楊再行

36 歲，貴州「啓蒙社」負責人。他在 1964 年參加建築分公司工作至今，他在 1978 年 11 月創辦「啓蒙社」，為中國民主運動公開結社的先河。后被判五年。

★ 王潭源

天津民刊「評論」負責人，在四人幫時期，曾因反對批鄧及悼周而被公局關進「精神醫院」扣押。他在 1979 年創辦「評論」。在四月底被公安局勒令停刊。同年 9 月復刊，至 1980 年又被逼停刊。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成立後，「評論」復刊了。中央九號文件下達後，被拘捕。

★ 王榮清

38 歲，杭州民刊「之江」負責人，初中畢業後，在 1958 年進工廠工作至今，1978 年參加民主運動，1979 年參加「四五」雜誌。於翌年 9 月與朋友創辦了民刊「之江」。中央九號文件下達後，被拘捕。

★ 秦永敏

28 歲，武漢鋼鐵廠工人，很早便參加武漢市「民主牆」活動，後與朱建斌創辦民刊「鐘聲」，並主辦四五學社。在 1979 年 11 月因售賣民刊被公安人員拘捕，後秦氏被釋放。

★ 劉力平

長沙民刊「理想通訊」負責人，在長沙市基礎大學圖書館工作，現年二十四歲，父親是幹部，與張京生同在今年四月廿二日被捕。

（續完）

# ★中國之春進行曲

D = |

中國之春進行曲 (日本)黎 音詞  
(新澤西州)明 樂曲

1 5 1 ||: 3 - . 3 1 3 | 5 - . 5 3 5 | 1 7 6 5 4 3 2 5 | 1 0 1 1 1 1 0 0 |  
1 5 1 3 1 3 | 5 5 6 5 0 | 6 6 5 3 3 1 | 2 2 2 3 2 0 |

沸騰的熱血 忠誠的心，我們是中國的一代青年人，  
青春的年華 激盪的心，我們是覺醒的一代青年人，

3 3 2 1 1 1 | 4 1 4 5 6 0 | 1 5 6 5 | 3 1 2 3 1 0 5 5 |

眼望着奔騰的長江黃河，胸中裝着億萬人民，振興  
炎黃的子孫 永遠不忘本，人民的囑託牢牢記在心，爲了

5 5 3 6 6 6 | 6 6 0 7 7 | 7 7 5 i i i | i i o 5 5 |

中華是我們的目標，改造中國是我們的重任，奮鬥  
民主法治爲了自由人權，前赴後繼貢獻終身，

> > > >  
1 - 7 5 | 6 - 3 3 | 6 - 5 4 | 3 - 3 | 2 1 7 6 6 |

呵 同志 們！前進 呵 同志 們！接過“民運”先鋒的

5 5 5 0 | 6 6 5 3 3 1 | 2 2 2 3 2 0 | 3 3 2 1 1 | 4 1 4 5 6 - |

火 炬，發揚光輝的“四五”精 神，團結五洲四海同 胞，

5 1 1 5 4 | 3 1 1 2 3 1 0 | 3 3 3 2 1 7 6 0 | 2 2 2 1 7 6 5 0 |

傳播真理正義的聲 音，何懼道路崎 嶇，哪怕黑夜沉 沉，

5 5 5 6 6 5 | 3 2 3 5 6 0 | 1 1 5 6 5 5 | 3 1 2 3 1 ( 1 5 1 : )

冲破那嚴寒的冰封大 地，迎來那燦爛的中國之 春。

3 1 2 3 2 5 5 | 1 - 7 5 | 6 - 3 3 | 6 - 5 4 | 3 - - 0 |

中國之 春奮鬥 呵 同志 們！前進 呵 同志 們！

i i i i i i | 7 5 6 6 0 | 5 5 5 5 5 5 | 2 2 2 1 0 ||

冲破那嚴寒的冰封大地 迎來那燦爛的中國之春。

小毛  
祖生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通訊處：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電話：(212)507-1914

定價（零售）

美國：2.00 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